



我的奋斗

阿道夫·希特勒

目录

我的奋斗原序

上篇 一、我的家庭

上篇 二、在维也纳苦学

上篇 三、在维也纳所得的政见

上篇 四、在慕尼黑

上篇 五、世界大战

上篇 六、战争宣传

上篇 七、革命

上篇 八、我政治生活的开始

上篇 九、德国工人党

上篇 十、旧帝国崩溃的征兆

上篇 十一、民族和种族

上篇 十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下篇 一、世界观和政党

下篇 二、国家

下篇 三、公民和国民

下篇 四、人格和民族国家的观念

下篇 五、世界观和组织

下篇 六、初期的奋斗——演说的功效

下篇 七、和共产党的奋斗

下篇 八、强者的独裁便成为最强者

下篇 九、党卫队的意义和组织

下篇 十、虚伪的联邦主义

下篇 十一、宣传和组织

下篇 十二、工会问题

下篇 十三、德国在大战的联盟政策

下篇 十四、东方政策

下篇 十五、紧急防卫权

我的奋斗原序

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我受慕尼黑法庭判决，被囚于勒希河畔兰支尔堡要塞的监狱里。

早就想写些关于我对于本党的计划和意见，给诸位希望知道一些个中情形的同志们。

只因连年公私奔波，一直无暇握笔，现在既然有了这样一个间暇机会，便乘此写下这本共分两卷的小册子，读者从这本小册子里当然不难窥见本党发展的经过和目的所在了。

当然，我也知道，要使一种主义获得人们热烈信仰和拥护，口头阐述远文字宣传有效得多，世界许多次运动的成功，大都归功于一般能干的演说家，而不是许多有名的著作家。

但是，为了想把我的主义揭示得更加详细，更易使人了解，我觉得非写这本小册子来不可。

因此，本书也可说是我日后行动指南针，同时也是本党活动的一个基础。

著者写于勒希河畔兰支贝尔克要塞狱中

上篇 一、我的家庭

我幸运地生长在茵（Inn）河边岸的普勃诺镇（Braunau）上，这市镇太美丽了。

而且正当是两个日耳曼国的交接之处，天生给了我一个奋斗的机会。

奥地利——这日耳曼民族的支派，早应该归到祖国大日耳曼的图版上了。

这并非经济关系，而正是血统的关系。

纵使二个国家的拥抱于经济上是蒙受不利，我也可以武断地说：如果日耳曼的子孙们一天不合并统治，便一天不得安宁。

必至日耳曼人民繁殖到人口膨胀时，才伸出手去向外掠取领土。

那时候大众为了面包和牛油，当然不惜用锄头代替了刀剑，去揭开战争的序幕。

为了这，我生在边陲小镇上，便负有神圣伟大的使命。

“我是日耳曼人。但为什么我们要和其他日耳曼人分裂？我们不是同一种族吗？”

我年轻时代，这个问题便在我头脑里打滚。

我挥着铁拳：为什么日耳曼人民都不一致投到俾斯帝国（Bismarck's Empire）的怀抱里呢？我嫉妒着。

做官的生活我并不贪婪。根本我愿闷死在那边理文牍的案头。

蹈了我父亲所说官场失败的覆辙。这是我的决心，任外界加给了我最大的诱惑，我都不变初衷。

我了解历史的意义，我是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

少年时代，我记得在奥地利民族斗争运动的范畴里，早有了我这一颗种子。

我曾经拉拢南疆协会（Sudmark）以及学联会，献呈黑、红、黄、三色花旗；不唱奥地利的皇歌（Kaiserlied）而独高吭着德意志优于一切（Deutsch—ist's alles）

的歌曲，即是受到威胁也不怕。

我们这伙青年原先已受了政治的训练，虽然那时仅懂得一些国语，还不知道启发“民族性”的责任。

总之，我少年时已不是一个头脑冷静的人，而是个热烈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Deutschthumist）。

我的思想捷快发展着，十五岁那年，我便能把效君王的“爱国主义”和“人民立场的”民族主义“分析得很明白。

我始终爱好民族主义的观念。不中万料不到会有今日这个党的组织！

奥地利对我们日耳曼人民是不知忠诚爱护的。这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每听见奥地利赫倍塞轧朝（Habsburgerhaus）过去统治的方略。

我们知道身体中已染上了毒素，同时那股毒焰在奥国的南北两部的天空弥漫着。

瞧，那奥京维也纳城中，日耳曼人民是到那里去了啊？

奥国皇家做着捷克化的美梦，但是法兰西斯。腓第南大公（Archduke Farncis Ferdinand）——这位奥境内日耳曼的敌人，后来终被枪杀。

如果天道不公，怎么会毁灭了这个要想使奥国形成捷克斯拉夫化的主要角色呢？

世界未来大战的第一颗炮弹，也许藏在德奥联盟后的德意志的一尊炮口里吧。

总之大战和德国崩溃的种子，早已潜伏在这个联盟中。

关于这一问题我在后文自有交待。姑且再说到我的本身。我早认为要保持日耳曼民族的安全必须先将奥地利摧毁。

原因在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两者间政治距离太远；而赫倍塞轧皇室的存在，又是日耳曼人民的一个障碍。

为了我对于这些的认识太清楚，使我非常痛恨着奥国！

但是德奥边陲上我的家庭，我是多么的爱护啊！

我从小生长在贫困的环境中，家里原有的薄产被我母亲一场大病用倾，因此不是维持生活。

我决心在这时候起自食其力，便搭了一间简陋的衣箱奔到维也纳。

我希望艰苦地和自己命运搏斗一场，战胜之后就能成为一个世界杰出人物；但我不将做官看作一生最高的目标！

上篇 二、在维也纳苦学

在维也纳的城中，贫富的悬殊，真有天壤之别。

帝国的人口是五千二百万，其间民族繁杂，实为帝国的一大隐患，我们可尽于京邑的中区，觐知奥国的命脉。

宫廷的煊赫的有如磁石一般，吸收全国各地的财富与智能。而哈普斯堡皇室又厉行中央集权的政策。以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因此一切的威权完全集中在首都。

维也纳不单是古老的多瑙皇室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是经济的中心。

除了多数的将帅、官吏、艺术家、教授之外，还有更多的工人和贫民，他们和贵族富商共同的生存在其间。

失业者徬徨在临街(Rinsstrassr)的宫殿四周，数以千计；而凯旋路(Via triumphalis)上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都应集于沟渠污多的中间。如果要研究社会问题，在德意志的任何城市中，再也没有比维也纳更适合的了。

不过这种研究，不能仅从表面上去做的，局外人又只能说一些漠不关心的空话，或佯示感慨，犹之示遭毒蛇蟠绕过的，不能得知毒蛇的毒涎。

那引起幸运者和自矜成功者，则昧于社会需要；而华装贵妇则又有慈悲而缺乏才能。

我不知道这两者的为害孰浅孰深！后者的罪行在于而缺乏警诧，以为这是民众忘恩的佐征。

实则社会事业的不易完成，他的症结所在，不在施行小惠，而在恢复民众的权利，故实不应望而感德，这是她们所不能了解的。

我觉得这种事情惟有两种方法可以改进：一是对于社会责任应有深挚的情感，方能确立一良好的原则以为我们发展的途径；一是须痛下决心，除去一切不可救药的赘疣。

上帝并不重要维持已存的事物，而重在培养新的生命，使种族得以继续下去，人类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不应过分重视目前的积弊，这是绝不可能的，我们应立即确定一完善的方法以谋将来的发展。

当我在维也纳生活而奋斗的时候，我观察得十分清楚，知道社会事业决不重在公益事业，这种事业是可笑而无用的，应该除去经济和文化生活组织上的种种错误，因为这种错误足以使个人陷入堕落的境地。

奥国因忽视社会的立法，所以他不能排除社会的积弊。这是有目共睹的事。

当时最使批骇异的，是为工人的经济痛苦，还是他们的卑鄙行为，或成为精神生活的低下？我实不得而知。

生活困苦的人，说他们只要足以维持生活，则为德意志人或非德意志人都是同样的，中产阶级听见了这种话不是要勃然大怒吗？

他们对于这种“民族自尊心”的缺乏，一定要大声斥责，表现出他们憎恶的意思。

为什么中产阶级有比较优的情绪？真正能够返躬自问的竟有几人？

能够了解在祖国民族的文化生活和艺术生活之中，有许多伟大的成就，使他们成为得天独厚的民族中的分子，又有几人？

能够明白祖国的先荣，在于祖国各方面的伟绩的，又有几人？

到了此刻，以前我所不知的事，便完全懂了。

欲使民众“民族化”，须得先造成健全的社会环境，然后再教育个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欲使知道祖国在文化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的种种伟绩而自幸为此民族的。非成教育入手不可。

一个人必须为他所爱的而奋斗，而所爱的也必须为他所敬，然而不是他明白了解的东西，那又何能对他发生敬意？

我对于社会问题既发生了兴趣，便透澈的研究他们，于是新异的世界，逐出现在我的眼前了。

在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〇年中间，我的生活环境渐渐的转好，无须靠佣工来维持生活，我靠了制图及画水彩画来维持我独立的生活了。

凡是不底和带有怯弱性的事件，都是为民众所不欢迎的。

民众爱严峻的统治者，甚于爱乞怜的人，他们对绝对的主义，较之对不知如何使用的自由还要觉得满意，就像妇女的性情，对于受抽象理论的感动，决不能像敬羨一种优越的势力一样。

他宁愿屈服于强者，而不愿去支配一个弱者，所以民众对精神是所受的威胁，并不觉得可耻，就像他们不觉得他的自由被凌，及至逼而反抗就以为可耻的，他们或许不知道遇的冤抑，但见到统治者举止的果毅，言论的坚利而终使他们服从到底。

若以一个具有高超真理而施行方面却是非常残酷的主义，起而反抗社会民主党，那么无论这个斗争怎样剧烈，这主义必会得到胜利的。

不到两年，我已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学说和它的专门用途了。

社会民主党从它的经验中很知道实力的可贵，所以对于该党认为有实力的人，就攻击不遗余力，——实力实是不可多得的东西。

而在别的方面对于敌方的弱者极力颂扬，起初很小心，后来大胆地实行起来，且看弱者的能力如何而定。

他对于无权力意志的畏惧，还不若他对于资本平凡而意志果毅的人的畏惧为厉害。

他又能够使人民相信，惟有他才有和平的秘诀；同时以不动声色的举动，乘群众不注意的时候潜施压力，或竟大胆的出而掠夺，得寸进尺，以拓张他的地位。

这纯粹是利用人类弱点的策略。假如对方不懂得以毒攻毒的战术，他这种策略是步步胜利的。

我们不得不对弱者告诫说这是一个存亡的关键。

在工场、商店中或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时所有的恫赫，倘使不碰到相同的势力，那是常常得到成功的。

工人迟早必定要被贫困所迫而加入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对于人类最合理的要求亦往往反对，这不仅是愚昧；也是不道德的，而且对于他们也无一些利益，而工人中就是极守纪律的，但也不得不因此退出工会而参加政治。

在我二十岁的时候，对于保障工人权利和改进劳工生活的工会，和那阶级斗争中为政党作工具的工会，也已能够辨别清楚了。

社会民主党知道工会运动的极端重要。所以就利它作为一种工具，因而获得相当的优势，反过来，资产阶级不能见及于此，所以便就失去了政治地位。

他们以为看轻工会运动。不使他按步的发展，便就可以使之消灭；或竟令它走入了不通的歧途。

如果说工会运动的祖国为敌有害的，那实属荒谬可笑的。实在说起来，那是恰恰相反的。

倘若工会目的是在改善国家的墓础中某阶级的生活状况而能获得效果，则其行动绝非和祖国为敌，倒是名正言顺的民族运动。

这样，工会运动对于社会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少的助力。没有了它，普遍的民族教育，便也无由中去着想了。

所以它的最大的功绩，便是在于除掉社会的流毒，根治身体的心理的病源，因以增加民族的一般的福利。

至于说到工会的本质，这便成为复述了。

假使在雇主之中还有不能明白的道理，甚或竟是误解了正义和道理的，那我们民众中一部分劳工，就可以起来反搞个人的贪婪无理，以之来保护全体的福利，还不但是为了权利，而且也是为了义务。

因为保持民众间的忠诚和信仰，乃民族的福利，这正和保持民众的健康，有着同样的功绩的。

因了待遇和不平而引起的反抗，如果在合法的司法当局未能够有适合的解决之前，那这种斗争的胜负，只好由最强大有力的一方来裁决了。

如果许多的劳力，和资本雄厚的某一雇主发生了抵抗，倘若在开始的时候，就有了不易获得胜利的希望，那劳工就得非团结一致不为功，这理由是很明白的。

在最近的十年中，工会运动已经在社会民主党的专家的手中，由保护人类社会权利的工具，一变而成为摧残国民经济的利器了。

那班利用工会为目的的人，完全没有计及工人的福利。

因为在政治方面，当一方在毫无顾忌的横行不法，而一方则忍辱含垢只知屈服的时候，那经济压迫，常是成为掠夺的良策的。

工会运动在本世纪的开始已早失去其本来的目的了。

年复一年，于是工会亦堕入了社会民主党政治的势力中，后来竟成为阶级斗争的唯一的利器了。

资产阶级于这种现象，不但不取攻势，反而受其压迫和蹂躏。

最后，才采用不大合宜的方法，然而为时未免太晚，不能发生效果，而且因其弱点很多，终于遭到民失败。

因此，不但一切依然如旧，而且不平反较前更甚。

“自由工会（**free trades union**）正像骇人的狂风暴雨，竟而低降于政治水准之下，它威胁着社会的安全，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巩固，以及个人的自由，可以说是一种最可怕的工具。

尤其厉害的，它会嘲笑着民主的观念。

玷辱自由，讥讽博爱；说是：“你如果不从我，我便把你的头颅打破。”

工人略略懂得了一些“人类的友情”，为时既久，我的见解，也就日益广大而深，因此也就无法来把他改变。

我既洞悉了纳粹党的外表，于是便想进一步知其学说中的要旨。

可是党当局发表的文字，于我几毫无裨益。

在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其立言的辩证都不大正确；而说到政治方面的进，其所说的更是不能成理的。

因此，我对于那些琐辩的诡饰的文字，憎厌达于极点。

最后我才知道的这种残贼的学说是和那某种种族的特性有关的，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明白犹太，便明白纳粹党内部真相的惟一关键了。

明白了这民族，便是揭穿了对于这党的目的和意义上一切错误的观念，并且再暴露了马克思主义滥用社会主义的美妙的文字以欺世。

“犹太”这一个名词，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对我发生了特殊的意义？这个回答，纵非不可能，但也是很难的。

我现在已不能追忆到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会于家中听过了记词否。

即使他老人家曾经说及这名词，我想大概也是指一种之遂古的文化而言。我父生平略具世界公民的观念，而且还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这是在我所受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在学校中的时候，也不会有过其他足以更易了我居家的时所受了印象。

在家科学学校中的时候，我曾经认识了一个犹太儿童，他很快被我们所重视；因了各种的经验，得悉其人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因此我们便不很信任他了。

当我在十四岁的时候，常于政谈中听到“犹太”这个名词。这时我对之未免稍有不悦；至于讨论宗教的歧异时，那我便感到更觉不安了。

上篇 三、在维也纳所得的政见

在旧多瑙河帝国（Danube Monarchy）中，一般的政治思想，比同时代的德国本部（普鲁士、汉堡及北海沿岸不在此例）的思想，较为豁落大度。

我现在所称“奥地利”，就是大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 Empire）中的一部分；因为那里是日耳曼人殖居的结果，不独在各方面能够表现其创造奥国的永久力量；而且还能够表现其力量于民间，对这政局阂阻的国家，延续其内在文化生命竟互达数百年。

时代越是向前时展，奥国的命运也越是繁之于日耳曼人而获得继续生存，因为日耳曼人，实在是帝国的生命细胞。

由多种民族混合而成的“奥地利。”到底免不掉崩溃这绝不可认作旧东马克（Ostmark）的德国的没有政治能力；因为这是要用一千万人的力量，永远支持住五千万异族同居的国家，要是不及早确定原则，那是实在不能维持，而崩溃是必然的。

一个日耳曼奥地利人，他常惯居于一个大帝国的境内，而且永不会忘掉了在这境内的一切义务。

他的视线虽然狭小得只奥国的境内，但是，他仍能望到帝国的边界。

他虽然不幸而受到脱离祖国的命运，但他仍能努力负起这伟大事业，为德国保存其祖先在长期奋斗中从东方所得来的权利。

目前我们须知道力量虽然已经分散，但是事业的成功，仍属是可能的。因为优秀的人士对于共同的祖国，永远表示着同情的，他们的祖国的国土，完全是属于他们的。

日耳曼奥地利人的眼界，实较帝国中其他种族的眼界为广。

他们经济的关系，差不多包括了整个帝国的全部，一切真正的伟大的企业，差不多完全在其掌握之中。

凡是主要的技术专家和职员，多是属于他们的，以前商业势力尚未被犹太人所夺取时，国外的贸易完全是由他们所经营的。

日耳曼奥地利的补充队，也可加入德国的军队之中，这种军队，可驻于黑尔兹哥维那（Herzegovina）正同在维也纳加里西亚（Galicia）一样。

军官力仍旧是日耳曼人，高级军官也是的，艺术和科学完全是属于日耳曼人的，除了晚近所发展的艺术（这或许是黑人的产物）之外，凡是只有真正的艺术思想以及传播者，都是日耳曼人，而且是只有日耳曼人。

至于音乐、建筑、雕刻和绘画方面，维也纳的于联合帝国（Dual Minarchy, Doppelmonarchic），好像是无尽的源泉，永不会有涸竭之日的。

最后，全部外交政策的责任，也是完全由日耳曼人来担负；不过偶或有了少数的匈牙利人在内罢了。

但是，想维持这帝国的任何企图。因为缺乏重要的原素的缘故，所以完全归尽于无效。

在这人种复杂的奥地利的帝国中唯有一法，能够把各民族分离的趋势克服的，就是国家必须中央集权，他的内部组织，也须照此目有而进行。

居于最高地位的奥王，在头脑清醒的时候。也能见及于此的，不过他旋即忘怀罢了；这或者是因其中困难而不克实行的集权的政策的缘故。

德国的统一，因其人民是，由一种单纯的人种所组成，而且常以一种共同的文化为根基，所以问题只是在政治上传统之弊的改革。

至于奥地利，他的情形恰恰和这相反。

他邦之中，除去匈牙利之外，大都是没有伟大的史遗迹的；即使有也是随了时代而消灭了。

总之：大都是黯淡无光的。

然而在各邦之中，民众的势力，则日有发展，在这王国的边境。“民族国家”

开始形成的时候，尤其是难于羁么的；因为这种人民和奥国国内的各族。

或是血统相近，或是利族相同，他的吸引力实在比较日耳曼的奥地利人为大。

这种的斗争，就是在维也纳也遭到了失败。

自从布达佩斯发展而成了一个重要的城市，维也纳了就首次遇到了劲敌，这劲敌的事业。并不重要在联合整个的王国，而是重要有巩固王国中的一部分。

不久，卜拉克（Praguc）也仿效了布达佩的先例；于是来姆贝格（Lemberg），来巴哈（Leibach）以及其他城市，也都随之而兴起了。

自从约瑟夫二世（Josrph II）逝世（一七九〇）之后，这个事业的进程，便可以很明白寻找了出来。

他的速度是依了多种的因素而定的。这种因素，一部分固在于帝国的本身；但是，还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帝国在各时期对外的政治地位的结果。

如果要维持这国家的奋斗坚持到底，那惟有坚决地行使者一贯的中央集权制，这样才能见到功效。

但是，形式上的统一，必须在原则上先要确定一种统一的国语来表现的；而完成这事业的专门工具，又必须操行于行政机关；倘使没有统一的国语，那么，统一的国家便就不能持久。

要使统一而持久的国家观念的产生，唯一的方法，惟有利用学校和教育。

但是，这事业并不是一二十年所能成功的，我们必须要有数百年的计划，因为这正和一切的殖民问题相同，目的的坚定，比了一时的努力尤为重要。

奥地利帝国，并不是由一种民族组织而成的，其维持的关键，不在共同的血统，而在共同的武力。

所以领袖者的无能，未必就能引起国家的不振，反而可以因了人种的不同而激发各民族的本能；倘使某种的意志超越而上的时候。那么，这种本能，自必被阻而难于发展的。

喻普斯堡皇室的不能看清楚这一点，这也许就是他的可悲的罪恶吧！

曾经在某一时期：命运之神又高举了火炬而照临列这块土地上来，但是，很可惜的，这火炬即永远的熄灭了“。

统辖日耳曼国家的约瑟夫二世十分忧虑着皇室偏安于帝国的极边，倘使不是及时弥补其先人的缺点，那势必要陷于人种复杂的漩涡之中。

这一位“人类良友”的约瑟夫，他用了一种超人的精力，去补救前朝的疏忽的地方，并且想在十年之内，努力去恢复数百年所失堕的作。

所可惜的是，就是他的承继人的思想和能力，都不能够担负了这一个重大的责任。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阶级斗争，可是在奥地利，则是民族间一种新斗争的发展。

日耳曼人对于这一点，或是因为健忘，或是因为认识不清，所以反而去从事革命运动，其结果，因而就判定了他自身的命运。

他们曾经始终的唤起了世界民主政治的精神，这种精神，把他本身生存所具的要素，在短期之中便被毁灭了。

在不成先定下一个共同的国语的原则之前，而先来成立一个国会，这便是使日耳曼人种的势力宣告终止的一个缘由。从此，国家将有颠覆之虑，结果便是使历史减少了一个帝国。

我很不愿详细的述说琐事，因为这并不是我写述这本书的目的。

我仅愿搜集种种的事实，来作紧密的考虑，因为这种事实，常常是民族和国家的衰败的原因，在现代，这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对于我决定政治思想的原则，也有着不少的帮助。

国家的正在崩溃，已经由各种制度昭示给一般的国民了。这些，即非明眼人也能见得到的，他的主要点便是国会，在奥地利或称做帝国议会，（**Reichsrat**）而这国会，便是依恃了力量而作出为根本的要素的。

显然的，这种团体，系依举着民主政治策源的英国国会。

这个制度，全部由英国而移植于维也纳中间更改的地方极少。

英国两院制新生命，便又重见于贵族院（**Abgeordnetenhaus**）和下议院（**Herrenhaus**）中了。但是，两院的本身，稍稍有着不同。

当 巴雷（**Barry**）在泰晤士河（**Watters of Thames**）建造议会的时候，他便取材于“不列颠世界帝国”（**British World Epire, Britisches Weltreich**）的历史，以作这所华夏中一千二百壁龛、托架、以及支柱的装饰，这富丽堂皇的贵族院和下议院，便就成为民族光荣的建筑了。

这是维也纳的第一个难关。

因为当丹麦人哈森（**Hansen**）完成他大理石宫的最后的尖顶时，便想到用一些古代的材料来为之装点。

于是把希腊罗马的政治家以及哲学家的肖像，都装饰在这“西方民主政治”的剧场式的建筑上了。

更有一讥讽的象征，就是屋顶的四角趋向四方，这是完全表示着他的内部分离之势的。

像 奥地利的历史，因了这项的建筑而获得了光荣，那各民族将认这一种是侮辱和挑战，正像在德意志帝国，一直到了世界的大战爆发才开始敢把“献给日耳曼人民”（**To the German People, dem deutschen Volke zu weihen**）的题词，雕刻在柏林城中保罗华劳脱（**Paul wallot**）的帝国议院的建筑之上。

在奥地利境内日耳曼民族的命运，完全是依靠着国会的势力而是定的，直到普选制和不记名投票制未曾探行的时候。日尔曼人仍旧在国会中占着多数。

但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行为的不可靠，使那时的情形，便成了不堪闻问题；因为这党常出来反对日耳曼民族的利益的重要问题，使他们党内的其它民族的党员发生异心。

就是在当时，社会民主党已不能祝为日耳曼人的政党。

待到实行了普选制之后，日耳曼人的优势，便不能在数字上占得多数了。

到了这时候，国中排斥日耳曼化的进行，已到无法可以阻止的地步了。

因为我当时抱着民族自存的决心，所以很不满意于代议制；因为这种制度，不但不能代表了日耳曼民族，而且常常欺骗而出卖日耳曼民族。

这种罪恶，正和其他的罪恶同样不可归处于事件的本身，而当归于奥地利国的。

过去，我还以为日耳曼人如果能够在国会中占多数，那么，旧国家继续存在，在原则上我并没有反对的余地。

但是，为时不久，那可怜的喜剧，就展开在我的眼前，这便使我怒不可遏了。

现在西方的民主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前区；如果没有民主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无从产生的，所以民主主义，实在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源。

民主主义的外形——议会制度——它像是“一种秽土和火中的怪物，”可惜这火的燃烧太快了。

这真是幸运，我得机会居住在维也纳，因而能够考察这个问题。

假使当时我在德国的话，这个问题解答，恐怕就不能这样轻易。

上篇 四、在慕尼黑

一九一二年的春天，我到慕尼黑（Munchen）去。

这真是一个处处和维也纳不同的德国的城市啊！

当我想到维也纳那种各民族杂难处的情形，心里感到很不快。

慕尼黑的语言，差不多和我的语言相同，使我回想到青年时代在下巴维利（Lower Bavaria）的那种情况。

此地在这方面都和我有一种亲密之感。

我和这地方的关系的深切，实在远过于世界的其它各地；因为，这地方和我的发展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的缘故。

联盟的赞成者，在奥地利仅仅只有哈普斯堡的皇胄以及日耳曼人而已。

因为哈普斯堡的皇胄的赞成，就是出于强迫计划；日耳曼人的赞成，是轻信和不明白政治的缘故。

由于轻信而赞成者，就是因为他们想藉三国联盟（Tripple Alliance）来谋日耳曼帝国的强盛和稳固；由于不明白政治而赞成者，就是因为他们的想像和事实不符，他们的所为，实在不过是日耳曼帝国，附着在一个国家的僵死上而已；所以结果必使他们堕入深渊而不能自拔；况且联盟能够使奥地利慢慢地脱离日耳曼的民族性。

因为哈普斯堡皇胄既是相信和帝国联盟之后，便可不受帝国的干涉——不幸，这一点真是凶到的很对——所以他们不难把日耳曼人在国人的势力逐渐消灭不会发生什么危险。而且也很无须成虑到德国政府所提出的任何抗议，这是因为德国政府的观点，素来以“客观”态度著名的，他们对付奥地利的日耳曼人，也是常常可以赁藉联盟来抑制反对，无论任何坚决的呼吁，凡斯拉夫人加以特别可耻的袒护而引起的，都可以用那联盟的口实而给予制止。假使我们对于历史以及日耳曼的民族心理有过精密的研究，那么，决不会有人能够相信意大利和奥地利会站在同一战线上作共同的奋斗的。

假使不论那一个政府竟能敢为其所痛恨的哈普斯堡派的一兵一卒（除非是和奥为敌，）那么，意大利必定立刻震怒而将如火山的爆发了。

当我在维也纳的时候，常常见到意大利对于奥国有关热烈的轻蔑和无限的仇视。

几百年来，哈普斯堡皇室为反对意大利的自由和独立所作的罪孽的重大，意大利是永不能忘掉的。

即使想忘掉，实在也有所不可能，何况意大利的人民或是政府，大都是无意于忘掉呢！

所以，为意大利的利害计，对付奥地利唯有两条路，便是联盟或是开战。

意大利人是很从容的选择了前者，自然可以安然准备后者了。

德国的联盟政策，是既无意义而又多危险的，况且奥俄的关系，又是正日趋于用武力来解决的时候。

到底为了什么而缔结同盟呢？这不过是趁国家尚能有着自主约的机会的时候，来保障国家的前途而已。

所谓国家的前途，又不过是使日耳曼民族继续生存的问题而已。

德国的人口，每年要增加近九〇〇。〇〇〇人，来养活这些新增人口的困难，自然是与年俱增的。

除非我们未雨绸缪而先来找取方法而加以防止，那么，结果是必定会使其祸殃的。

要替这些繁殖的人口来找工作 and 面包；不外是两条路，就是开拓领土和采取殖民贸易政策。

这两条路，都会有过种处的考虑、研究、建议及辩论、。

但是，都被各种理由来推翻了，最后才决定采取第二条路。

这两条路比较起来，当然是第一条比较健全些，因为获得新领土以及容纳过剩的人口，这利益是未可限量的，尤其是在将来为更甚。

现在领土政策唯一的希望，只是限于欧洲一地，不能扩充于喀麦隆（Cameroons）等的地方去。

我国东际的两处边际及领土的范围，都是由奋斗而来的，所以我们对这为生存百奋斗的決心，那是不得不感谢的。

我们所以能够生存到现在的缘故，也是完全靠着这一个决心而成功的。

这种解决的方法，所以正确而合理。

还有另外的理由：现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大都像倒置着的金字塔，因为他们在欧洲的基础，比了他们对殖民地才国外贸易的各种负担，真像头重脚轻的样子，简直可笑之至！我们可以说，顶在欧洲，到底则散在世界各地，和亚美利加合群国的莫基于本济而顶则和地球各处相接触的情形显然相反。

所以美国内部的实力非常雄厚，而欧洲诸殖民地的国家是大都比较起来显示出衰弱来了。

这种时期的例子，就是英国也不能作为反证，因为我们常易忘却那盎格罗撒逊世界和不列颠帝国关系中的真实性。

英国仅因他的语言文化和亚美利加合群国相同，所以英国不能和欧洲的其他各国相提并论。

所以德国要想实一健全的领土政策，唯一希望，就是在欧洲的本部能够获取新的领土，假使殖民地不适宜于移殖大批的欧洲人，那么殖民地也是毫无用处的。

在十九世纪，要想用和平的方法去获得殖民地，已属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要想实一这种殖民政策，只有出之于坚苦奋斗的一条路；但是，这种奋斗，是在谋取大陆上和本国邻近的领土，而不是欧洲以外的土地，那便是更为适当的。

这一个政策，想要使它实现，在欧洲唯一可能的联盟只一个英国。

如果我们德国再来实行侵略，只有英国才是能够做我们的后盾的。

我们有权来实行行为，实在不逊于我们的祖先。

我国的和平主义者，坐享着东方的产物而不稍踌躇，不知最初开辟东方的工具，就是刀剑呢？

我们应该惜任何重大的牺牲，去获取英国的好感。

所谓牺牲，便是放弃殖民地和海上霸权，并且再避免因了我们的商业竞争而妨碍到了英国的实业。

英国在有一时期，希望我们能够有这种的表示，因为基国他也很明白德国为了人口的增殖，必须谋得一个解决，这个解决的方法，或借助于英国而在欧洲谋得解决，或是无须英国的帮助力，在别处地方自己去谋解决。

十九世纪末，基国谋和德国亲善，实在就是了于这种的感情。

但是，德国人大都以为此举是徒供英国的利用，所以均觉不安，像一朝缔结了联盟，不必用互惠来作基础的！

实在，根掠于互惠的原则，德国对英的交涉，可以得到顺利的进行。

我们必须要知道，基国的外交政策很是机巧，假使我们不把实惠来给他，他是决不能加惠于我的。

我们且试想，倘使德国能用灵敏的外交政策，去完成了德国联盟，像一九〇四年日本的所为，那么，他影响于德国的，我们很难加以估计了。

也许世界大战不致爆发了。

但是，这种政策竟没有被采行。

然而发展工业和世界贸易，扩张海权及殖民地，这些仍是可能的。

如果要实行要欧洲拓地的政策，那唯有联英反俄；反之，要想行殖民地及世界贸易政策，那唯有联俄反英。

德国处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该立刻当机立断，决定和奥国的绝交。

百他们采用“在经济上和平征服世界”的政策，这势必把他们前此所行使的武力政策，永远的破坏了。

当许多意外的威胁，不时从英国来的时候，他们也许还莫名其妙哩！

最后，他们虽然决心建造一个船队，但是，他们的目的不要攻击英国而在保障“世界和平”以及“在经济上的和平征服世界。”。

所以，他们不仅对于战船的数量有所限制，就是各船的吨数及其军备，也是限制着最低的限度，藉以表明着他们的最后目的，还是在于“和平”

“在经济和平的征服世界”的要素，就是国家政策中的唯一的主要原因，这实在是最愚笨不过的事，然而，他们竟援引英国来证明实行这种原则的可能，这实在真是愚不可及了。

我国的大学教授他们所讲授历史的理论所留下的害处是没法可以补救的，这适足证明读历史只读百不能了解，真是叫做“食而不化”，这情形是随处都是的，这种理论，就是在英国方面，也已遭受了驳斥，这是他们所不能不承认的。

然而，在世界上的各国，他们预备以武力作经济的后盾，而且在征服之后，再以残酷的手段来维持这种行为的实使者，实莫过于英国。

英国向来的政策，他不是用政治的势力去获得经济的利益，于是立刻使经济的利益一变百为政治势力吗？所以，如果说英国太怯懦，不敢为了保障他们的经济政策而奉流血，那是完全错误的。

英国没有国民军的事实，这也不足为反证；因为一国的要点，并不在兵力的形式而在善用一国所有势力的意志和决心。

英国时时具有他所必需的军备。

英国在战争的时候，常用一切必需的利器来获得的胜利。

如在役兵有用的时候，英国便以役兵来应；但是，如果不碰到必须有重大的牺牲方能获得的胜利的时候，英国也就不惜用他全国的最优秀的分子来应战；他的在战争时的决心和毅力以及其百折不挠的作战行为，那是无处不具备的。

在德国，常把学校，刊物，以及滑稽报纸等来做宣传，宣传着谬误的英国人的生活及其帝国，使德国人养成一种观念，而陷入自欺的心理，竟使德国人对于英国人，加以轻视，这种谬误的观念，探深地印入了人心，于是德国人的心目这中林家都认英国人是一种狡猾诈而怯懦的商人了。

（要知道一个庞大的英国，决不是徒靠诡计卑劣的手段所能目结而维系的，但是我国的那些肖头教授，他们是从不会了解到这一点的。

这种错误的观念，有少数付之纠正而予以警告，然而，对这些少数的警告的人，不是予以漠视，便是遭受抑制。

当两对垒于法兰德斯（**Flanders**）的时候，我们武装同志那种警惶失措的状态，我还是历历在目的十分清楚。

交呀不到数日。国人便立刻觉悟到苏格兰人确实不和国央的滑稽报章及报告中所描写的形态了。

我要这个时候，于是使对宣传及其最有效的方式加以注意了。

那班宣传，对于前面所说的荒谬观念，自然有着便利的地方，他们可以援引实例——不管这例子的错误是怎样——来证明“世界的经济征服”是正当的。

凡是基国人所以能够成功的，我们德国人自然也必能成功的；因为我们的诚实——不像英国人的这样缺乏信义——又可认为是我们的特长。

上篇 五、世界大战

当我在年青气盛的时代，最使我忧虑的，不快的，便是在这没落的时代，受着万民崇拜的人物，只有商人和国家的官吏而已。

政潮像是已经波平浪静，世界的前途，像是已经进入于：国际的和平竞争“了。

换句话说：就是彼此间互相用欺诈的手段，而避免着一切激烈的方法。

各国的政府，开始注意于互相倾轧的企业以及互相夺取主顾和契约，他们不惜用了千方百计，大家互相利用，于是一片喧嚣的声音，便就充满于全世界了。

这种的发展，不但继续进行而永无底止，并且好像已经得到了世界一致的赞许，将一举而把世界改造成一个极大的货栈似的。

在这宏大的货栈的通廊中，凡是最狡猾的奸商和那最怯懦的职员，都有他们半知的肖像以筭永久。

为什么我不早百年而生？

不生于解放战争（**War of Liberation**）的前后呢？

因为在当时的人，除了从事于“商业”之外，还有一些相当的价值可言。

当法兰西。斐迪南大公被刺的消息传到了慕尼黑的时候（那时我正在屋子内，对于这事变的情节，仅有一些模糊的听闻，）起初，我以为这次的暗杀事件，或许是德国的学生所做的。

因为他们深恨奥太子的有意偏袒斯拉夫人，要借此来铲除日耳曼人的虐待而已。

事变的结果怎样呢？那我可以立刻想像得到，就是再加重对于日耳曼人的虐待而已。

当时还可以把这种虐待的理由公然向全世界解释，而求得全世界谅解呢！

不久，知道了凶手的姓名，系是一个塞尔维亚人，我乃对于这不可测的命运的报复，感觉到有些悚然而惧了。

斯拉夫人的挚友，在斯拉夫民族的疯狂者的枪下已经做了牺牲者了。

对于维也纳政府所发出的最后通牒的形式和内容，在现在，世人还是有着许多的责难，这是殊欠公允的。

世界上任何的国家，处在同样的境地，未有不是这样来举动一下的。

在奥地利的南境，有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时时对奥国的皇室放出了挑战的态度，待到时候一到，必须要使这奥地利帝国倾覆而反快。

一般人士的心目中，唯恐考皇一死，这件惨祸必须要实现的。这是委合理的。

而且奥地利帝国或许不会的切实抵抗的能力。

近年来奥国的安危。完全对之于老皇法兰西斯。约瑟（Francis Joseph）的身上，所以由民众的眼光来观察，老皇的死，等于国家的自知的覆灭。

世人大都以为这次大战或许是可以避免，所以把战祸的发生归处于维也纳政府，这实在不是公平的论调。

因为这次的战争终不可避免，至多延缓了一两年而已。

所恨的就是德奥两国的外交政策，他们对于无可避免的一天，还是常常想多方延缓，直到最后关头，被迫而不得不战，那时候的时机已属不利了。

如果想勉力台湾省维持和平，那么，战争一起，时机将更陷于不利，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

已经有多年了，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用了最卑鄙的手段，鼓动着德俄的开战，而中央党；因为宗教的缘故，所以对于国家大计，大抵以奥匈帝国不转移。

现在，大错已经铸成，所以结果也不得不忍受。

祸变的来临，势所必然，这是无法可以避免的。

德国政府的错误，就是在于只知道维持世界的和平，因此坐失开战的良机，而且再为维持世界和平的联盟所牵制，最后也终成为世界协约国的牺牲品了。

这名义上虽称为世界协约国，实际是反对保持世界和平而决心造成世界大战的。

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并不是强迫民众去参加的，实在是全国上下所切望的，国人急急地要使全世界的不安告一个段落。

这就是德国二百万以上的成人和青年，所以欣然去从军，甘心作猛烈的争斗，而且在国旗之下，甘愿洒最后的一滴血来捍卫自己的祖国。

这一个争自由的战争爆发了，规模之大，实在是空前未有的。

在慕尼黑方面刚听到了暗杀的消息，我们脑海里立即发生了两种感想：一是战争无法可避免；二是哈普斯堡皇必须维持聪明。

因为我所最怕的，便是德国为了联盟的缘故，也许有一天被卷入击突的漩涡，这击突的直接的原因，也许并不在奥国，奥国因为内部的政治关系，竟无法来实行援助同盟国的充分决心。

对于战争，不论这个老大帝国愿不愿，然而已经到了非战不可的时候了。

这次击突的态度，我个人对之十分明白。

我以为这种击突，并不是奥地利为要惩罚塞尔维亚而战，实在是德意志为着生存而战，换句话说，就是日耳曼民族为了它的生死存亡和自由前途而战。

德国人必须要步着毕士麦的后尘，现在的少年德国，对于过去的祖先，他们把英雄的血在威森堡（Weisen—brug）到西丹（Sedan）及巴黎的战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仍旧应该努力保持着。

倘使这战争而获得胜利的话，那我日耳曼人能够靠了自己的势力而再在列强间占得一个地位，因为日耳曼帝国是节衣缩食来一战，那是决不能做和平的保障者的。

八月三日，我就呈请国王路特威三世（Ludwig III）准许我服么于波维利亚的军队中，那时候内阁的国务非常的忙碌，然而我的呈请第二天就批准了，这是十分快慰的。

我生平最伟大而最难忘的时期，便在这时期开始了。这是和其他德国人一样的。

过去的一切事迹，如果和这次激烈的斗争相较，那都不足道了。

回首到当年我民族勇猛战争的最初的星期，我不禁悲喜交集，我深以仁慈的神，能够使我来参加这次的战么为幸。

战争年复一年的继续着，战争的毫情，也就一变而为恐怖了。

大家爱国的热忱，慢慢地冷却下来，光荣的幻想，已经深在死亡的苦痛之中了。

这时每一个人的心中，大都有“自存”和“效忠”的两件事在击突。

一九一五——一六年冬季，这种击突，在我已成为过去。我的意志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起初我在冲锋陷阵的时候，常常兴高采烈呼喊欢笑，现在一变而为沉静坚决了。

一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我都是这样。

青年的志愿兵已经变成了老练的战士。

这种变化，整个军队都是一样的；因为我军经过了长期的战阵，已经老练坚强，凡在这次战役中不能抵抗的已经早被淘汰了。

到了这时候，军队的优劣，始能加以判断。

在两三年一仗接一仗不断的战争，我们以寡敌众，以弱小敌强，备尝着铠渴劳顿，——要估量我军的优点，就在这个时候。

虽然在几千年之后谈起了勇敢的英雄主义，就不能不念及大战中的德国军队。

德国的灰色钢盔，不畏缩，不规避，将成为历史上永垂不朽的纪念品。

我日耳曼人苟有一天存在当会念到这些军人更为国家的健儿。

在那个时候，我对于政治并不注意，可是有关于影响全民族，尤其是涉及我们军人的事，那就不能不表示我的意见了。

马克思主义的被人认为正确，这些，我对之十分愤慨。

马克思主义的最后的目的是在毁灭一切不是犹太民族的国家，然而，到了一九一四年七月，马克思主义多方面诱惑的德国劳动阶级，居然觉悟了，他们效劳于祖国的风起云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痛心疾首的时候。

在几天之内，卑劣的国家的叛徒，他们欺骗民族的烟幕都已云消雾散，而那些犹太领袖，立刻感觉到孤立无援，六十年来流毒人群的愚妄的痕迹，完全化为乌有了。

这实在是欺诈德国劳工者的最不利的时候。

这些叛徒的领袖，一旦察觉到他们处境的危险，他们也立刻遮掩了他们虚伪的丑形，居然老着脸皮，一同主喊民族抵抗的口号了。

这正是对于毒害我国民族的整个的犹太团体大加攻击的时候了，德国的工人既重新发现了复兴民主民族的路，政府应该就在这时候毫不加以宽假，急急地想法剂除了这反民族主义的鼓吹者。

优秀分子既已到前线捐躯去了。国人也应该在后方把予贼肃清才对。

可是德皇并不出此，反而新给那些叛徒以援手，并且给他们以保护。使他们得维持着他们的组织。

每一种世界观（Wctsndchauunsgi），不论其性持是政治的，或是宗教的，（两者的界限极不容易说的。）都在其本知理论的积极建立，而不在对方理论的消极摧毁。

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世界观的斗争，在进攻而不在退守。

所以目的确定，便是有利于理论的本身，因这种目的，便是思想胜利，而攻破对方理论的消极目的，什么时候可以达到，那就不易说了。

所以，凡是一种世界观，其计划愈是明白确定，那么在进攻之中也必有强而有力；因为最后的胜利，是在进攻而不在退守。

用武力来抵制的世界观，如果不采取攻势以拥护一种新理论，结果是必定遭受失败的。

只有两种世界观在同一条件下斗争的时候，始能用坚决的严酷的武力来决定胜负，而使胜利属于武力所拥护的一方面。

过去，反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失败，完是由于这一个缘故。

毕士麦关于社会主义的立法的失入，也就是由于这一个缘故。

因为这种措施，实在缺乏一种新世界观的基础，所以无法树立起斗争的目的来，只有那些素称为高明的达官要人，他们才会幻想着用“国家权威”或“秩序和安宁”

，就足以激励人们甘心去为斗争而牺牲。

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反社会民主政治的斗争已是十分明显；但是，这种斗争，因为缺乏实际的代替物，所以究竟能够支持到什么时候，殊难预定。

因为这事实在是有一严重的缺点在。

在大战之前，我就有这种意思，所以当时不能决定去参加任何的党派。

后来，战事延续，我的信念也就愈坚，因为当时不以议会政党为限的运动还没有，所以要想从事反社会民主党的彻底斗争，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常把这种意见，向知己的朋友谈及。

我在将来要做一个活动政治家的意念，也是在这时候发生的。

我所以屡和少数的知己朋友说及，就是因战后我除了固有的专业之外，再愿意作一个演说家的缘故。

上篇 六、战争宣传

当我注意于政治上的一切事件的时候，常使我感到极大的兴趣的，便是宣传事业。

据我看来马克思社会主义党他们所最擅长而又能充分运用的工具，就是宣传，我立刻觉悟到如果把宣传运用得到法，那确也是一种正当的技术，这种技术，实在是那班中产阶级各党所不知道的，只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尤以吕格勒时代为然）

用一种赏鉴艺术的性质来运用这种工具，而且他们大部分的成功，实在是得力于此的。

我们会有过什么宣传吗？

唉！我仅能回一句：“没有。”

我们对于这方面一切的努力，一开始便失妥而且方针错误，因之不但毫无应效，并且有时还反足为害。

我们如果对于德国的战争宣传，作一系统的考察，就可以确信他外表的虚弱与内心的谬误了。

宣传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这一个基本问题，甚而至于我们还不能弄清楚。

宣传是一种手段，而且必须根据其所宣传的目的而评判的。

这一种手段，必须要妥为规划，使目的获得适当的效果。

目的的重要，既要捍一般的需要而变动，所以宣传的要素，也就随之而变动，以期和目的相言办，这是十分显然的。

大战正当十分紧张的时候，我们所奋斗的目的，便是人类想像中极尊贵而又极迫切的。

这便是我民族的自由和独立，以及将来生存的保障和民族的光荣。

至于说到人道问题，毛奇（Moltke）曾经说过：“战争最要紧的便是在使战事早些结束，而最能达到目的的，便是最残酷的方法。”

在战争中的宣传，便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这一次大战，就是日耳曼民族为了求生存而所作的奋斗，所以宣传仅能根据有利于这个目的的原则。

就是最残酷的武器，如果用后可以早获胜利，那么，对于人道的原则仍是不悖的。

我们对于这种生死的战争中，对于战争宣传的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不过是如此而已。

如果那些居高位的人能够明白了上述的各点，那对于这种武器的方式和运用，当然不致踌躇不决，莫衷一是：因为宣传不过为一种武器而已——若是这种武器落在一个善用这种武器的人的手中，这武器真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呢！

一切的宣传，都应该求其通俗，并且还须在宣传的人群中，还得顾到知识最低下的人的接受能力。

所以，我们要使接受宣传的人数愈多，那么宣传的知识标准，也就愈宜降低，要是我们宣传的目的，是在使全国都受到影响——例如要使战事贯彻到底的宣传——那就愿当极端的当心，必须避免陈义的过高。

群众对于宣传的接受力极为有限，而且理解力也很薄弱；他们又是大都健忘的。

这样，一切有效的宣传，必须限于数点，而用标语的形式来宣传，务期每个人都能知道任何标语的命意。

要是牵涉过多，而一不顾此项的原是，那么宣传的效力，反而易于涣散，因为人民对于所宣传的事，实在不能去融会或是记忆的缘故。

而且它本身的力量，到底也因微弱失掉了。

比方把敌尽量给以滑稽的描写，像德奥滑稽报纸所用的一种宣传方法，实在是根本错误的，因为我军有一天实行和敌人肉搏的时候，那么，他们所获得印象必定完全相反，因此自己会遭受到一种惨报；德国的军士，亲见到敌人抵抗力的时候，他们觉悟到被那些虚构事实的人所欺骗了，这不但不能增强，而且不能保持其敌气同仇的心理，结果是德国的士兵，就在这错误的宣传之下惨败了。

反过来，英美各国他们对于战争宣传，在心理上说是正确的，他们各向其人民暴露德国人是一种斐族，为匈奴，而且使每一个士兵，对于战争的恐怖，早已具有准备，所以临阵而不会沮丧，他们在前线所碰到的最可怕的武器，不过是证明了他们所听到的不错而已，因而相信他们本国政府的言论是真确的，同时也增加其对于敌人的愤恨。

他们的宣传是这样的，所以英国的士兵，对于从本国所传到的消息，从不感觉到虚实，而德国的士兵，竟把国内消息看作纯粹的虚妄而不再信仰了。

假始有一张广告，要宣传一种新制的肥皂，它的宣传方法，盛赞着别的肥皂的很好，那么，我们对此广告将怎样？只是摇首叹息而已。

所以当讨论到战争发生的责任问题的时候，说德国对于战祸的爆发，也应该来负一部分的责任。这实在是根本错误的，而正常的办法，就是应该把大战责任完全加到敌人的身上去；即使和事实不大符合，也要把它当做真实的情形来看待。

因为，敌我两方违法行动的界线，并不是一般群众所能辨别的。

大多数的国民，他们的性质和见解，极类女性，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受到情感支配者实多于受到理性的支配者。

但是，这种情感，并不复杂，而且是很单纯的。

他们的变化不多：不是积极便是消极，不是爱便是恨，不是真理便是谎言，永不会是非各半的。

英国的宣传，便是善于这种的事实。

所以在英国，绝没有模棱两可的而引人误会的措辞的。

英国对于群众情感的幼稚，已经能有彻底的了解，所以他们对于战争恐怖的宣传，十分投合战事的情形，而且巧妙毒辣，使前线的士兵，就是在惨败的时候，也仍能保持着他们作战的勇气；再宣传说德国人是大战的唯一戎首，这种卑污无耻的谎语，以及他们宣传的方法，实在早已计及到群众天赋的情感和极端性，所以能够获得国民的信任。

方法的改变，不应该去改变了宣传所要实现的要点，它的目的，应始终如一。

标语固不妨从多方面来加解释，但是无论怎样的解释，应该和标语的本意一致。

要使宣传的功效得到切实一致，这是唯一的方法。

不论是商业上或是政治上的广告，其能获得成功，都是因为具有持久性和一致性的原因。

箸人的宣传方法，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敌人的宣传限于很少的几点，而以民众为唯一的对象，并且还坚持而不懈的进行着。

在大战的全期之中，他都应用其最初认为正确的基本观念和表现方式，而毫不有所更改。

起初看来，好像是强词夺理，谬妄无稽；继接着是令人有不快之感，结果是令人深信不疑。

四年半的大战终止了，德国爆发了革命，而革命的口号，实在是发源于敌人的战争宣传。

还有一件事英国人所明白的，就是这种斗智的工具，唯有多多利用，才能获得成功，苟若获得了成功，那便是能获得厚大的报酬。

宣传，在他们看来，这在是一种无上的武器，可是在我们看来，这实在是失意政客谋生的末路，以及无名英雄栖身的微职。

总之我们的宣传，成效终也真等于零。

上篇 七、革命

一九一五年的夏天，敌人的传单，开始由空中而传入了我们的手中。

虽然它的措词各不相同，但是它的内容差不多是千篇一律，不外说德国的困苦有增无减，大战将永无休止地时候，而胜利的希望则日渐减少，国内的人民大家都切望着和平，但是“军国主义”和凯萨（Kaiser）（指德皇）是不允许；全世界——对于这件事十分明了的——并不是为反对日耳曼民族而战，纯粹是反抗那唯一负责的德皇一人而战；所以如果不把人类和平的矛贼除去，大战是不会休止的，大战能够终了，“普鲁士军国主义”能够一旦消灭，世界和平决定可能的，和平实现之后，那么，自由的民主国家也必会欢迎德国加入永久世界和平的联盟中的。

这种宣传之中，有一点应该加以注意的，就是在前线的各部，凡是有巴维利亚士兵的地方，便对普鲁士尽情的加以攻击，不单说普士是这次大战的罪魁，且说协约国中，并没有对巴维利亚有一些的仇恨。

但是，巴维利亚如果始终给普鲁士军国主义尽力，那么，协约国将要爱莫能助了。

这种宣传在一九一五年就开始有了一些效力，军人中反对普鲁士的情绪，慢慢地增高了起来，——但是当局者从不会来设法加以阻止过。

到了一九一六年，前线兵士们所接到的家信，大都申诉着不平；显然的，已经对于士兵生了了了一种直接的影响，这时候已经不劳敌人再用传单向前线去散播了。

德国妇女所写的则毫无见识的家信，后来竟葬送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在前线。

那时已经出现了不良的现象，前线的士兵，大家都诅咒愤懑，怨声载道；——这种怨声有时候也很合理的。

在前线的士兵，他们饥寒交迫他们的家人，也在国内日坐愁城，而别人的饱暖淫乐。

甚至在火线上的士兵，他们也有了这种不应有的现象。

在这时候，危要四伏，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这不过是“国内”的事。

大多数和士兵虽然在怨恨不平，但是，一转瞬之间，他们又不声不响的尽着他们的职守。

好像是十分自然的有一部分和军队，虽然心里有着无限的苦闷，可是对于他们必须防守的战壕，他们仍是死守不去，好像德国的命运，完全维系在这几百米的战壕上的样子。

从这地方，我们可以见到前线战士们，他们仍旧不失是光荣的英雄。

我在一九一六年十月七日受了伤，于是欣然离开前线，乘坐着伤兵车回返德国，我离家已经有两年了，处在这个乱世，真是有些度日如年。

我进入了柏林附近的一处医院。环境真是恶化得十分厉害！

唉！另外方面看起来，这个世界确实是一个新世界。

在前线的军队中的精神，这里是一些没有的。

我竟第一次碰到在前线所没的听闻的事，就是竟有人自己把懦怯来向人夸耀。

我的伤势，经了医治而能够行动了，我就得到许可到柏林去走一下。

这一种困苦的惨状，触目皆是。

全城和百万的人民，大家都站立在饥饿线上，怨愤异常。

有几家是士兵所到过的，他们的语调竟然和医院中的语调完全一样。

人们每以为那些士兵们好像专门寻觅这种地方来发汇他们胸中的积怨的。

在慕尼黑的情形更是恶劣，当我恢复了健康而出院的时候，就被派到后备队中去，我重到这个城市，和乎有些要不认识了——不论在什么地方，充满着愤怒不平和咀咒。

从前方归来的士兵，因为在前线服役的缘故，所以每人有种种的特性，这是为后方的老年军官所不能了解的；但是，新从前方归来的军官，那就能明白了。

人民来于这类军官的尊敬，和对于后方军官的尊敬是绝然不同的。除此以外，一般的精神却是十分消沉。凡是逃避责任的人，大家都视为识时特务的俊杰，而忠于职守的人，反目为庸碌的犬子。

在官厅之中，满是犹太人。差不多每一个书记都是犹太人，而每一个犹太人，也都是书记。

这是使我十分惊异的，这独得天宠的人民，何以在这里的特别多，而在前线者反而特别少。

在商界方面，那是更厉害了，犹太民族实在已经成于“少不来”的分子了。

一九一七年末，兵工厂的工人罢工，并不能产生出所希望的结果，而使前线感受到军器缺乏的恐慌。

这种罢工的目的，本来在使军火缺乏，但是，因为它的本身失败的太快了所以还不能使军队陷入失败中去然而这已经是够使精神上受到了一个巨而可耻的影响了。

第一，倘使后方的民众，不想得到胜利，那么，前线的军队为了什么而去作战？

士兵们受这样重大的牺牲和苦难，到底是为了谁呢？

士兵们为了胜利而战，后方的民众，竟用罢工来加以反对，这是些什么道理？

第二，这件罢工的事，对于敌人的影响又将怎样？

一九一七年——一八年的冬天，协约国已被愁去惨雾所笼罩的。

因为，他们所希望于俄罗斯的一切，现在已经得到了失望。

俄国曾经为了协约国的共同的利益，不惜作了最大的流血的牺牲，现在已是精疲力竭，只好让敌人来加以无情的宰割了。

他们的被盲目的信仰所支配的士兵，一在大都头丧气，大家深怕着明春的来到；因为他们鉴于德国仅有一部分的兵力防卫着西线的时候，他们尚且不能把这战线的攻破。现在德国厚集勇士，用全力来准备向西线进攻的时候，他们怎还能获得胜利呢。

德军各师正当奉到最后总攻的命令的时候，总罢工竟也在德国爆发了。

这一举动，起初是举世惊愕的，后来敌方攫取了这一个最终的机会，重作宣传，于是协约国涣散的军心，因此重新振作起来，以为今后是可以重操胜负的，对于未来事态的恐怖和捻，竟一转而为之坚决和自信了。

英法美诸国的报纸，便开始把这种信念散布在读者的心中；同时，又用了极巧妙的宣传不鼓动前线的军队。

“德国将要革命了，协约国必定能够获得胜利的！此种口号，是使正在动摇中英法士兵，复得立定脚跟的最最优良的一点兴奋剂。

这此，都是兵工厂罢工的结果。这罢工恢复了敌国的人民对于胜利的希望，并且再驱散了协约国前线士兵之顽丧精神。

结果使几万的德国的士兵牺牲了他们的血肉。

但是，鼓动这次最卑鄙无耻的罢工的工，便是希望乘德国革命的机会而去获得政府中最高位置的人。

我真幸运，获得了参加最初两次以及最后一次的进攻。

最后一次的进攻，使我终生获得了一个最惊人的印象，因为可惊的是在最后的战争，也像一九一四年一样的，由守势而转为进攻。

一九一八年的夏天，前线到处都是异常的闷热，而国内是争论纷起。所争的究属什么事？

各部队之中，也有着很多的谣言。好像是说大战已经毫无希望，只有犬子作我方胜利的好梦。

要继续战争者，并不是日耳曼的民族，而是资本家和帝室。这就是国内传来而且为前线所讨论的消息。

前线的士兵，对此，于这个革命的消息。起初也没有什么反应。

“普及选举权”对于我们有些什么关系？我的四年来的苦战，竟是为了这一点吗？

前线的士兵，素来是极稳定的，对于哀伯特（Ebert）施德曼（Scheidemann）巴特（Borth）李波克尼希特（Libknecht）等人的新战争目的，完全置之不理。

我们百思而不解的，那些避战的人为什么竟敢揽权秉政。

我个人的政治观念，很早已就确定。

我深恶而痛绝那些卖国欺民的党棍，我早已洞悉这班党徒，他们并不把民族的福利作前提，而把饱他们的私囊为唯一的目的，他们为谋他们的私利计，不惜把整个民族来牺牲，遇到必要的时候，即使德国灭亡了，也不妨的，我恨不得能够亲见这些人的一个个缢死在我的在前。

为了要顾及他们的愿望，就不妨去牺牲了劳动阶级的利益，来充实那强盗的囊囊；我们如果不要德国灭亡，那就不能坐视着他们的为所欲为。

军队中多数的士兵所抱的思想，仍然是和我相同的。

这一年的八九两月。虽然敌方进攻猛烈，并不能和我方在过去的防御的勇猛相比较，然而，衰颓的现象，竟是一天厉害一天。

比较起来，索美（Somme）和法兰德斯（Flanders）的战，已经成了过去的历史，简直是一种可怕的回忆了。

九月末，我军第三次到达那我们青年义勇团的野外所攻克的各地。

那真是往事已经不堪回首了。

一九一八年的秋天，军心已经大变；大家常把政治问题来加以讨论了。

从国内传来的消息在各地的军队中开始发生了影响。

新征来的青年军全部受到了麻醉，——因为他们是从国内一直来的缘故。

在十月十三的晚上，基国开始向伊泊尔（Ypres）前的地线投放毒瓦斯弹。

十月十三晚上，我们尚在威菱克（Werwick）南的小山上，继续受着轰击，时猛时缓，终夜不继。

将近夜半的时候，我队支不住了，倒在阵亡的有了不少的人了。

到了清晨，我就感觉到一种痛苦，每隔十五分钟，痛势愈加厉害，在七点多钟的时候，我的两眼感觉到有睚焦灼，因此退役报告一切，而我的参战，也以这次为最后的一次，几小时之后，我的两眼，刺得像烈火焚烧，一些东西也不能咽到了，于是我就被送到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帕士瓦尔克（Pescowalk）的地方医院中，我就在该地遇见了革命。

坏消息不断地由海军方面的传来，说海军酝酿起事，但是，我以为这种谣言。

不过是少数神经过敏的青年猜测，未必便是一种影响，多数人的不幸事件。

在医院中，每个人都在谈论战事的结果，并且还希望着早早见实现，但是，没有一个人公为战事立刻可以结束的，在这时候，我还不能阅读报纸呢。

到了十一月，群情更是激昂，忽然有一天大祸降临了，在事先，我们是毫无所知的。

海员乘坐运化的车来到他们鼓动着民从起革命，在这个为我民族求“自由、优美、和尊严”的斗争中，以少数的犹太青年做领袖，而他们是不会有守一人到过前线去作战的。

上篇 八、我政治生活的开始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末，我加归慕尼黑从亲自再进我那一团的后备队。

但是，该队被“军人会议”（**Soldiers Council**）所把持着。

我对这一点深为不满，所以决意立刻脱离。我和战争时的一位忠实同志史密特。

爱仑斯特（**Schmiedt Ernst**）同赴特老恩斯坦因（**Traustin**）去居住，在那里一直至军队解散。

一九一九年三月，我们再回慕尼黑。

在当时的情况，实在不大好，革命扩大而已有不可遏止的情势。

爱士诺（**Eisner**）的死，恰好是加快了这一个情势的进展。最后竟造成了由会议操纵的形势，这或者可称之为犹太人过渡期间的统治更为恰当些，这便是首倡革命者的最初目的，在这期间，我的脑海中的计划有了不少。

当新革命在进行的时候，我最初的行动引起了中央会议（**Central Council**）对我发生恶感，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清晨。我差一点儿就遭被捕，那三位逮捕我的青年，当我举枪相向的时候。他们的勇气顿失，惊惶一循着旧路而走了。

在慕尼黑解严以后和天，我便奉命出于委员会，调查第二步团革命事主的经过，这是我参加近乎纯粹政治的第一次。

过了几星期之后，我又奉命出席为国防边军官佐而设的特别班。

该班的根本目的，就是在授军人以一定的主义，使他们去指导一国国民的思想，这特别班对于我个人的价值，便是使我因此认识和我思想相同的一部分同志，我们可互相畅论当时的局势。

我们都确信德国的崩溃，已经迫在眉睫，他们十一月的罪犯，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实在不能救了德国的危亡。

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国民党”，虽然他们的用意很好，但也补救了既成的创伤。

我们中有少数的人便就讨论新党的组织了，我们所持的根本原则，和后来所实现的德国工人党（**German Workers Party**）的原则相同。

这一个新运动的名称。一开始便就表示了深入民间的可能性；因为如果缺乏了这个特质，那全部的工作，似乎都没有什么意义徒然多了一举了。

因此，我们便决计定名为“社会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ary**）因为这颗新建设的社会观念，实在是含有革命意义的缘故。

再者，尚有着一层场更深的理由。我在早年，便致力于经济问题的研究，这使对于社会问题发生的思想多所限制。

这研究的范围，等到后来我研究了德国的联盟政策始行扩大，德国所以采取这种联盟政策的缘故，大半由于把国内的经济估计错误，以及对于将来德国食物供给基本原则不明白所致的。

这种理想，是根据了一种假定，就是把资本纯粹作为劳动的产物，而且和劳动同改正为一切足以促进或限制人的活动的因素的基础。。这就是资本对于民族的意义，因为资本的自身，完全依赖于国家（state）——就是民族（nation）——的伟大，自由和势力，所以两者的联合，必定要使国家和民族因了资本的维持和增加面向前发展。

资本和自由独立的国家，有着十分深切的相互关系。

所以资本势必把民族的自由和强大做目的。

因此，国家对于资本的责任是十分简单面明了的。国家只要注意资本供国家使用，而不使一操纵着民族那就好了。

国家既坚持着这种态度，那么，便可以定下了两个目的来：一方面维持着有效率的国民的独立经济，另一方面是再维持工人的社会权利。

我对于资本纯由劳动所产生的，和纯由投机而获得的，以前是未能明白分别。

对这问题，我不知道该怎样应付。

这个问题，就是在当时上述的特别班讲量中的一人来加以极详尽的讨论——这人就是古特弗里德·费德（Gottfried Feder）

在我第一次听了费德的讲演以后，脑海中立刻就发生了一种观念，就是我已经发现我们组织新党的一个重要原则。

我立刻知道了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具有真理的，对于德国的前途关系是很大的。

票据交易所的资本和国民经济的绝对划分，使我们对于德国财政行政的国际化有着可能的抗争性；同时又不致因为和资本斗争的缘故而危及民族独立生存的原则。

我对德意志发展的途径认识得十分清楚，所以我觉得他们最坚苦的奋斗，产不在对付敌国而在对付国际资本主义。

费德的讲演。实在给予我将来奋斗的一种绝好的口号。

从这件事后来的发展来加以观察也可以证明我们当时的见解是怎样的正确了。

我们不再为我国资产阶级的狡黠政客所嘲弄了。

到了现在，要是他们并不说谎的话，那他们也应该知道国际资本不单是煽动大战的最有力者；就是在大战终止了的现在，他仍在极力和平的世界不惜变成为地狱。

我个人以及其他一切真正的民族社会党人，仅有一个信条，就是民族和祖国。

我们所以必须奋斗的原因，就是在保障我种族的繁殖，我国的人民及其子孙的教养，血统的纯洁，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并且使我民族能够完成了上帝所付给我们的使命。

我又重新加以研究犹太人马克思学说和目的，到了现在，我才有了正确的了解。

到了现在我才了解资本论信社会民主主义反对国民经济的斗争；并且明白了他的目的，乃是要准备一切，使金融业和交易所的真正国际资本能够来统制德国。

在另一方面，这上特别班的课程，也会产生了巨大的结果。

有一天，我宣布我有演说的意思。

同班中有一人要替犹太人作争辩，因此，他就作了长篇的辩论来袒护犹太人。

这就引起了我的反驳。我的主张，在当时在场有人中，赞成者竟占有大多数。

这结果，在几天之后，我便奉命以“教官”的名义加入了慕尼黑的军团。

要当时军队的纪律不大好，这是因为军人会议时代的遗毒还是存在。

军队因此便受到了影响。要使“同意”的服从——这句妙语是他们形容柯尔特。

爱士给（Kurt Eisner）下的猪圈中的——变成整饬的军纪。如果不是小心翼翼，慢慢地做着是不会有加的。

而要使军队能够自觉他是民族和祖国的分子，也不是同样的。

我的新活动，就是在这里，我用了充分的爱国热情和灵敏的感觉来开始活动。

我可以说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功：听我的演说而尊崇祖国和德国民族的同志，竟不知有了多少人，我使德军“民族化”而且使一般的纪律加严。

再有，工结识军队中和我同情我同志很多，后来，这些同志就和我联合，因此奠定了新运动的基础。

上篇 九、德国工人党

有一天，我接到了总部的一个命令，要我去调查一个社团的情形。这个社团，显然是有政治作用的。在几天之内，他们将要用“德国工人党”的名义来举行会议；而且费德还将前去演说。

我必须去赴会，察看众情而做一个报告。

现在。军队对于政党发生的好奇心，已经充分地明白了。

自从革命之后，军人已经获得了政治上活动的权利，就是毫无经验的军人，也充分地来利用这种权利了。

但是，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他们发觉了军人对于革命党的同情，已在慢慢丧失而倾向于民族复兴运动，因而十分后悔，才知道应该撤回军队中的选举权，并且还应该禁止其参加政治。

衰弱的资产阶级，以为军队必须回复过去的情形，而为德国国防的一部分，但是中央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意旨，那差不多把民族主义看作是一颗毒齿，必须把他来拔除的。

但是，没有民族主义，那么，军队仅仅成为一种永久的维持治安的警察而已，不再是抵抗敌人的一种力量了。

以后和年的事实，就是一个明证。

所以，我对于上述的工党，虽然是毫无所知，然而也决定去参加他们的聚会。

旨德的演讲完毕了我很高兴，我以看已足，准备出场时候，忽来宣布说珊在人人皆可发言，因此我就站定了不去。

但是，起初所见闻的，一些也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后来，忽然有一位“教授”

站立起来说话了，他对于费德的议论发生了疑问，待到费德对他了满意的答复之后，他又突然把“事实的根据”作为要素，毅然地建议着，说这个新兴的青年党最是适于能使巴维利亚，脱离普鲁士的压迫而奋斗的。

这位先生真是厚脸，他还说这事如果能够实现，那么，日耳曼奥地利必定会立即和巴维利亚联合德国的和平也就有了希望，以及其他类比的无意义妄言。

在这时候，我乃不得不请求主席，准许发言，我也来发表一些意见。

我因此把这位“学者”的狂言痛加驳斥，我的言论，也就获得了很的胜利。

我的话还未说完，他已经像丧家之犬一般的狼狈逃出去了。

在那时，我会把这件事反复的加以思索，并且预备置之勿论了。

可是，这真是使我一生惊奇的，就是不到一星期，忽然就接过了一张邮片，说是已经准许我做德国工人党的党中：并且请我去参加下星期三的该党的委员会。

他们这种做求会员的方法，真使惊诧得不知所以，叫人恨既不对，爱也不是。

我想自己来树立一个党，我绝无参加现成党派的心意。

真的，我实在不会有过参加他党的梦想。

我真拟动手写信去答复该党的时候，忽然我生出了一种好奇心，决意要那天我自己到会，趁此机会要亲自解释我的理由。

星期三到了。忽然，有人来告诉我，说是全国工党的首领将来亲自出席。

这一个消息，使这听到很有一些惊奇。

我的理由，也只好慢慢来声明了。

恃然，他真的准时出场了。他就是费德讲演时的重要的发言人哪。

这件事更使我诧异了，我决计静待着，看他有些什么事件发生。

无论怎样他们的大名，我是已经知道了。

该党全国的首领，是叫赫勒先生（Herr Harrer）慕尼黑的主席便是安顿。德莱克斯勒（Anton Drexler）

开会了首先是宣读上一次会议的记录，并且再对演说的人表示谢意，接着便是新党员的选举——就是通过我入党的问题。

我就开始向他们发问。

我方才知道了该党除少数重要的原则外，毫无所有，其他是什么也没有了，没有党纲，没有小册子，没有印刷品，甚至一个区区的橡皮图章都也没有置备：然而，他们却有着极大的信仰的良好意志。

我不愿对他们加以嘲笑了，我很知他们所研究的是些什么事了，仓促产实渴望着一种新运动，这种运动，实在是比了一般称做党的范围还要大。

于是，我就碰到了有生以来最困难的问题了。我对于这个党究竟是加入呢还是不加入呢？

命运似乎在向我示意，我绝不应该加入当时的热呢现成的大政党，我将更详细和来说明我的理由。

据我看来，这可笑而人数很少的团体，尚未成为一个坚强的“组织”，并且还能存个人活动的余地，这在我实在是一件很有利的事。

该党尚有待整顿，这个运动的范围愈小，那么，这个运动适当的表现也愈快。

该党的性质、目的和方法，还可以决定，这在现存的各大党之中是绝不可能的。

我对于这件事愈是反复的思索，我就愈是坚信这种小规模的运动，可以作为复兴民族的先声，这是在现在的议会中的各政党是绝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的政党，仅仅知道牢记着陈腐的观念。或是因为有利可图的缘故而来拥护一种新制度。

现在，这里所提倡的，乃是一个新的世界观，并不是一种新的选举的口号。

我经过了两天的苦思闷想，最后。我才决心进行着我听取决的步骤。

因为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关键，这时候，这后退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应该有的。

这就是我实行德国工人党的经过，他们还给了我一个第七号的临时党证。

上篇 十、旧帝国崩溃的征兆

德意志国家的民族，受到了这个非常重大的创痛，正像患了头晕病症，他们的感觉和思想像是都丧失掉了。

把过去的光荣和伟大来比一在的艰难和不幸，真像是隔了一世不堪回首！

这无怪无论什么人都要炫惑于帝国的伟大，而不知道他的崩溃的征兆已经发生了。

这种征兆，已经显然的可以见到，不过，只有极少的人能够得到明确的教训。

这种教训，在目前比了过去尤为必要。

现在，多数的德国人民，他们仅从国内经济上的分困和其结果，去窥见德国的崩溃。因为凡属德国人差不多是个个人受到了影响的，所以个个人都知道了这种的大灾。但是，全国的人民，不知道这种崩溃和政治、文化、道德有着关系而已。

一般民众的认识是这样，那也不要去了；便是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他们也以德国的崩溃；就是“经济的灾害”为唯一的原因。

而且以为要复兴德国，须在经济方面去着手，才对，这就是我国的直到现在所以不能找出挽救的办法的重要原因。

倘使我们能够知道德国崩溃的主要原因，第一还是在道德和种族方面，而以济列是还在其次，这样那才可算明白目前的困苦原因，而且也能发现了救济的方法。

我们的患难以及目前腐败的原因，这是由于欧战失利的缘故。

这一点，便是最易为一般人所公认的。

这种毫无意识的话，确信的固不乏其入，但是，明知他是不对的，而偏又故意这样来说的人，为数更其是多。这班人，便是庸集百仰赖政府来豢养的人。世界和平的宣传者不是这样的说吗？德国的战败，仅是破坏了“军国主义”，德国的人民且将庆祝其光荣的复兴呢。

整个革命所用的口号，说革命固然使德国不能逐渐得到话，不是你们这班敝世的小人所说的吗？

把德国崩溃的原因完全推在军事的失败上面去，这是犹太人的无耻的特点。

而卖国的总要关报，就是柏林的前进报（**Vorwats**），还说此际不允许德国民族揭旗凯旋！现在：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是德国崩溃的原因？

把战败当作德国崩溃的原因，我们可以用以下面那样的答复：自然欧战的失败，对于我国的命运，确实有着可怕的影响，然而，战败并不是原因，是各种原因的结果。

这种生死存亡的斗争，到底不会有好结果，这是有知识的和怀善意的人士都十分明白的。

然而。不幸有许多人碰到紧要关头而失掉了推理的能力，对于真理，必会得到加以驳斥和否认，而那些明白这真理的人又从而加以附和。

这些人实在是我国崩溃的罪魁，而他们现在忽然把战败是崩溃的原因，这并非大谬。

因为战败只是他们行动的结果，而不像他们现在所说的是由于“领袖不良。”

要知道敌人并不是懦夫；他们也知道为国效死的。

当战败的时候，敌方的人数就多过德国的军队，而且就专门的军队而论，他们是有全世界在做后盾。

但是德国仍能 and 全世界对抗，苦战四年，而且常获胜利，这除了德国人的勇武和严密的组织之外，完全因为他有着良好的领袖，事实具在，不容抹杀的。

德国军队的组织和指挥，实在是古今世界各国所不及的，而其失入的原因实在是因为人类抵抗力限制的缘故。这样的军队的崩溃，并不是我们现在的幸的原因，而是别种罪恶的结果；这个结果，再会引起后来的崩溃，而且比较前些的崩溃更为厉害。

民族的覆亡，事实上只是一次战败而没有其它的缘故吗？这问题现在可作下面的简单的解答。

如果一个民族的军事的失败，是由于懒惰、怯懦及平庸——总之是该民族的卑劣无能，——那么，这个是常有的事实；不然，那军事的失败，反而足以激发起未来的伟大的复兴，这并不是民族覆亡的标记。

历史上有着无数的实例。

足以来证明此说是正确而不谬的。

德国军事的失败，并非了于偶然，是古今因果报应的当然的惩罚，我们受着这个惩罚，还嫌其过轻呢！

假使前线真的因为孤军无援而撤退了，民族的不幸，真的是上于军事的失利，那么，德国民族的失败，必定是另有一种精神在，他们对于战败后的一切痛苦，必定会得咬紧了牙齿跟来忍受的。

对于敌人的侥幸获胜，必定会愤怒填应，德国人决不会有幸灾乐祸的事件发生；而且也不敢以怯懦和失败来向人矜夸，战士也不致招人揶揄，军旗也不致被人污辱，其是不致发生失去体面的事，遭受基国雷平顿上校（Colonel Repinston）讥诮“三个德国人中必定有一个卖国贼”了。

军事崩溃的本身，实在是由于种种不健全的现象以及促成这种不健全的现象的人所造成的。

他们在和干的时候已经流毒遍于全国，他们道德的败坏，自卫意志的薄弱，以及酝酿多年有害于民族和国本的种种议论来造成了这一个灾难，所以军事的失败，不过是第一种有形的恶果而已。

犹太人阴险狡诈的全副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机关，把这种灾难的直接责任去加在卢登都封乐的身上，这是自然的，实在，卢登都夫预先知道了灾祸的来临，乃想用非常的意志和能力来使之转变，拯救民族于沉痛屈辱的时候。

他们使他负起战败的责任，这是因为要夺去他从道德上从事辩白的武器，使唯一能揭发的卖国贼的人束手无策而已。

这种事等于一种慢性的病已经到了成熟的时期，恰好能在大难中忽然被可怕的情形而把罅止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作是德国民族的大幸；不然民族将慢慢地趋近灭亡。好像入骨的痼疾，更难挽救了。

幸而这灾难，至少是大多数人所共见的。

人类对于瘟疫的克服，实在比肺癆为容易，这是因为瘟疫的来其势很凶，死亡枕藉，使人惊心动魄，而肺癆的来，其势和缓；瘟疫使人恐怖，而肺癆却使人疏忽。

我们碰到了瘟疫就尽力来加以抗之，碰到了肺癆便用于缓的方法来加以遏阻，人类能够克服瘟疫的而反为肺癆所克服，便是为了这样缘故。

政治团体的疾病也是如此的。

在大战之前，有着长久的和平日子，某种的祸患，已经在这时期中发生，他的原因虽然没有人加以注意（除了少数的几种例外），但是，其成为祸患，那是已经认识了。

这里所说的例外，第一便是民族经济生活中的现象，因为这个使人感到切骨之痛，实在较其他方面的祸患为更甚。

许多崩溃的征兆，能够激发的猛省的地方很多。

大战以前，德国的人口激增，因而使主要食料的供给问题，在一切政治、经济行动上日就成为重要。

但是，不幸他们以为这种严重的问题，可以依靠简便的方法，就能达到目的的，因此就不能用了坚决的心，迳自去获取一个正确的解决。

德国放弃了扩张新领土的观念，而代之以经济侵略的妄想，因之使工业生产漫无限制而弊害百出。

这最不幸的结果，第一便是促成农业阶级的衰颓。

农业阶级愈是衰颓，那无产阶级的会集于都市者也愈是众多，终于使社会的均衡完全失掉了。

现在已经使贫富悬殊更是显然了。

富者和贫者，他们比邻而居，这势必要形成悲惨的结果的。

人民既开始受着贫穷和大量失业的痛苦，所以接踵而至者，便是不平和怨恨。

民族经济破坏而所生的不良现象，还有比这更坏的。

因为商业宰制了全国，所以金钱也就变成了万能了，举国上下，个个人都成了拜金主义的奴隶，我纪败坏到了这样的地步。

当时德国民族正在危急存亡的时候，亟所需要的，便是激发人民最壮烈的情绪，而突遭到这种变化，其祸更为厉害。

依照事理来说德国应该依靠“经济上的和平工作”来维持其生存，而把武力作为后盾。

不幸，现在对于金钱势力应极端反对的人，竟也默认了。

尤其不幸的，便是德皇劝贵族也加入新金融资本界去。

但是，德皇的此举，情有可原，因为毕士麦尚且不能觉察了这——一个危险。

事实上，这一件事使理想的美德居于金钱之后。所以此风一开，勇武的贵族，立刻能退居在财阀之后，这是十分明显的。

在大战以前。德国的商业，因为发行股票而已经趋于国际化。

一部分德国的工业，固会努力于防制这种危险，但是，终于还是牺牲在资本联合攻击之下，有密切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也是为虎作伥的。

反对德国“重工业”的持久战，这便是；国际化的发端。当时国际化正靠着马克思主义的助力而力图实现，要想完成这事的，那么、在革命中马克思主义是不得到胜利不成的。

当我执笔写述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对于德国国有铁路的总攻吉正获得了胜利，这种铁路，就是落在国际资本家的手中了，因此，“国际”社会民主党，又达到了其他的一个主要目的。

德国工业化的进行，得到成功的最好的确证，就是大战后，德国一位工商界要人发表的意见，说商业是使德国复兴的唯一的因素，这便是德国工业化成功的明证。

史坦尼斯（**Stinnes**）的这句话引起了极大的纠纷；但是仍被采纳，而且在转瞬之间。

便成为一切欺人者及空谈家的格言；自革命以来，毁坏德国的运动，便是这班冒牌的“政治家！”在战前，德国衰颓的唯一征兆，就是国人一天一天的精神萎靡，作事不力。

这是他人临事不能决断，遇事畏葸的结果。

这种缺点，实在是由于教育制度的不良所致。

德国的教育，在战前缺点极多。

他的制度，仅注意于知识方面而忽略了实际能力的培植。

对于人格的养成以及责任心的激励，更少注意；至于意志力的和果断力的培养，那就完全漠视了。

所以，这种教育所养成的人才，大都不是强毅的壮士，而是懦怯的书蛀。

战前，世人大都这样的看德国人，而我，德国人也因此而邀人推崇。

德国人为的所以受人欢迎，这是因为他们是有用的人的缘故。

然而，意志不坚，那就并不见重于人。

他们脱离国籍，背弃祖国，所以比较他国有人民为容易，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上篇 十一、民族和种族

如果亚利安民族（Aryan）的血统，和其他的劣等民族的血统相混合的时候，那么，支持文化的种族，必定要超于没落，从过去的历史看来，一些也不会错误的。

北美之人口，大部分是日耳曼种族，极少和低等的有色的民族相混杂；中美和南美的移民，大半是拉丁人，他们常和土著混杂，他们的国民性和文化便和北美大不相同。

就拿这一个例子来引证种族混杂而所生的影响，那中显而易见的。

美洲大陆上的日耳曼人，凡能维持纯粹的血统而不和其他的人种相混事的他们已经能够崛起而为美洲的主人，假始他们能够长期守着没有混乱血统的羞耻，那将永远维持着他们的主人的地位。

如果强有力的能够早早把世界完全征服了，成为全世界的唯一的主宰，那么在这局面之下，和平仁爱或许还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理想；用这原则去实施的当也不会有损于民众。

所以奋斗实先于和平。

否则那就等于说人类的发展，已经超过了最高的一点，而其标准，则不是任何理论观念的统治，而是野蛮的统治，接着就发生了混乱。

我知道有人要讥笑这一种说法，然而地球固旨运行于以太之中历几百万年，人类所以能维持其高尚的生存的并不是为了狂妄者的理想，乃是因为了解自然的法则。

且能控制这法则而为人用。

也倘使这一点而忘掉，那么，人类又将会灭绝，又到了洪荒的时代了。

我们在世界上所赞美的一切——科学、艺术、工艺和发明，——不过是少数民族的创造品，推究他的根原或许出之于某一种族。

全部的文化，完全靠了这少数民族而存在的。

在是他们沦于灭亡，那么，地球上的一切灿烂的文物，自必也同归于尽了。

假如我们把人类分为文化的创造者，保持者和破坏者的三种，那么，唯有亚利安人种方能够资格做第一种的代表。

亚利安常用极少数去征服异族，而且能够得到多种的低劣民族的帮助，他们利用那新获的领土的特殊环境——像土地膏腴和气候等，——去发展他们潜伏着的智力和组织和本能。

经过了几百年，他们便创造他们独有的特别的文化，这种文化，起初仅有他们本身的特性，后来便依照他们所征服的土地和人民的特性而发展了。

时间过得稍久，他们那些征服者，便违背了保持血统纯洁的原则（这原则在起初他们是固守着的，而和被征服的土著通婚，因此，他们行殊的民族性，逐渐消灭这是天演的公理。

凡是有创造力的民族，他们是始终在创造之中的，不过粗看起来不觉察而已。

他们这班人仅能认识既成的事实，因为世人大都仅能见到天才的外表，像发明、发现、建筑、绘画等。而不能认识天才的本身。

就是这种外表，也不是他们一时所能了解的。

在民族有生活中，其所有的创造力，须待某种特定的环境的要求，始能有了实际的应用；正像一个人的天才，须得所有的创造力，须得受了特殊的激励，他的本身，始能有了具体的表现。

我们看看那过去和现在的人类文化的传播者，大都是亚利安人，那就可以证明了。

为了要发展高超的文化起见，那些文化较低的民族，实在有着存在的必要，因为只有这些民族，可以当作技术工具的代替物。没有技术工具，那么高超的文化是不可能发展的。

因人类发展的初期，赖于驯良的兽类的地方少；而赖于低劣的民族的劳力的地方多。

要直到被征服的种族成为奴隶之后，于是兽类才开始遭受同样的命运；普通人每以为兽类先于人类报着奴役，实在是对的。

就把耕种来说，最初挽救者是奴隶，以示才由马来代替的只有梦想和平主义的愚人，尚认为这是人类堕落的现象，而不知道管是势所必然的，必须这样，然后能达到了某种态，而那些和平使者。才能对世界传播他们荒谬的大言。

人类的进步，好像是去登一无尽长的梯子。

登高必须要从下面拾级而上，所以亚利安人必须要遵循实际的道路去向前进行，这道路决不是近代和平者所梦想的道路。

但是，亚利安人所必走的途径已经十分明显。

他是一个征服者，他征服了低等民族，使被征服者遵从他的意志力和目的，受他支配而从事工作。

但是，当他驱使这班被征服者工作的时候，被征服者不但生命有了保护；而且命运也比较优于前所谓“自由”的生活了。

亚利安人长此以主人自居，他们不单是维持其主人的地位，而且是文化的维护者及培植者，可是有一天被征服者把本身的地位提高了，或者和征服者的语言同化时，那就主奴的分别没有了。

亚利安人既放弃了他们纯粹的血统，那么所有的养真处优的权利也就跟着消失了。

亚利安人于是就一天一天的堕落，他们陷于种族的混杂之中，他们创造文化的能力也跟着慢慢地消失了，终于智力和体力，和被征服的土著人种相像而不类他们的祖先了。

虽然他们暂时仍能享受着文明的福利，可是对于文明，初则漠视。

终也遗忘。

这就是各种文明和帝国所以崩溃的原因，而各种新的创造，所以也代之而起了。

血统的混杂，以及种族的堕落，这实在是旧文明湮没的唯一的原因。

因为人类的覆亡，并非是为了战争的失败；实在是为了丧失纯粹血统所独具的抵抗力的缘故。

在德文中有一个准备服从义务的要求（**Pflichter fuellung**）的形容字，这字极能表明勇于负责，急公好义的理想。

这种态度的基本观念，我们称之为理想主义，这是用以来分别利己主义的。

因为这个主义，是指个人为社会为人类而牺牲自己的。

当理想陷入灭亡的时候，我们可以立刻见到那种社会的精华，和文化之必要条件，也随着而低落了。

于是利己主义，也就成为民族中的主要势力，个个只是唯利是图，社会秩序立刻废弛，人类大都从天堂而堕入到地狱中去犹太人正和亚利安人相反的。

在世界上任何什么民族，他们自卫本能的强盛，没有较之所谓“天之骄子的民族”更强的。

他们的种族直到现在还是存在，这就足以证明了。

我们试问世界上有那一个民族能够像犹太民族样历二千年而不变他的内在的特性的吗？世界上有那么一个民族所经的大变较之犹太族更甚而且能历万劫而不变故态的吗？他们图存在，保种民族的决心，在这件大事实之中，已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犹太人的智力；发展已历几千年；到了现在犹太人才以狡黠称。

从某种的意义言方面来说，犹太人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的。

但是，他们的智力并不是他们自身肆达的结果，是由于外族教育的功效。

犹太人本身，绝无什么文化可言，所以他们精神活动的基础，常常是受他族所供给的。

他们的智力，在一切的时期中，都是因为和邻近他们的文明相接触而得到发达的。

可是犹太人对于他族，那就没有丝毫的贡献了。

有人以犹太人和他们同类争斗——还是说掠夺他们的同类——时能够团结一致。

因而称他们是具有理想的牺牲精神，这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

便是这一点犹太人也是出于他们纯粹的自私心；这就是犹太国家——我们且不妨假定他是一个维持和繁殖的团体——所以毫无国境可言的缘故。

因为一个有固定的边界的国家，国内的种族，必须具有他们理想情操，而且对于工作须有正确的观念。

假命名这种概念缺乏了；那么，想要维持有疆界的国家，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的所赖以建立的基础了。

因此，犹太民族虽然有着显著的智力，然而没有真正的文化，其次没有他们所特有的文化。

因为犹太人现在所有的文化，大都是他民族的东西，而在犹太人的手中败坏了。

起初，亚利安人大都是游牧民族，到了后来，才慢慢地变成了有一定居住的民族了。

从这一点上，就可以他们绝不是证明犹太人。

反过来，犹太人决不是游牧民族，因为即使是游牧民族，那么，依了他们的智力所及，对于“工作”概念，也抱有一个确定的态度，以备为将来作发达的基础的。

游牧民族确实有着理想主义的根本观念，不过并不浓厚，所以他们的生活概念。

虽然和亚利安人不同。但也并不相反。

然而犹太人对于这种态度是绝对没有的，他们向来不是游牧民族，他们是异族的寄生虫。

他们虽然离弃了原来所住的地方，然而这并不是完全出于他们的本意，而是被那些反对他们的民族驱逐了的缘故。

犹太人的散遍于世界各地，这确实是一切寄生虫的特征，他们常常为种族竟取了新食养。

犹太人假使能够使人士相信他们的寄生生活，并不是为了种族问题，而是为一种特别的宗教；团体，那么，他们寄生于异族的生活，才能获得了永久的维持。

可惜这是一个大谎话。

犹太人因为要继续他们在别的民族中的寄生生活，所以不得不设法掩饰了他们内部的工作真相。

凡是他们的智力愈是富足，那他们的欺诈也愈能奏效。

他们欺诈的程度，竟使世界上多数的人士，大家确信他们是法国人或是英国人，德国人或是拉丁人，不过是宗教不同而已。

现在经济的异常发展，正引起了民族中社会等级的变化。小规模的手工业慢慢地被淘汰了。工人不大自然维持他们的生活，于是被逼而变为一个无产阶级了。

工人，便由此而产生了。

可是不幸的明显的事实便是工人们晚年产能自谋生路。

换句话说，我人们实在一无所有；年纪一老，即受痛苦，简直不堪称之为生活。

在从前已经有过一个类似的而极需解决的方法，现在已经发现。

在农工以外，慢慢地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这一个阶级的官吏，完全是国家的公仆，而且他们也是一无所有的，这种不良的情形，国家为之找出了一个补救的方法，凡是做公仆的人，如果年老而无法能够自给的，那就由国家来负责维持，并且再规定退职的年金。

上篇 十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我现在来叙述我党发展的初期，并且再来简略的叙述一下和它相关的事件，我决计不想来涉及本党的理想目的。

因为，如果把本党的目的来一一说明，那就得要占去了一册的篇幅了。

因此我想在下编中来详细的谈论一下本党的党纲，决定党纲的原则，并且再就我们的见解去说明“国家”这个名词的意义。

我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指几十万的群众而盲，他们的希望，大都是相同，不过他们苦于不能说出他们的意思而已。

在一切重大的改革之中，起初都是由一个人勇往直前的来作战士，而在后面附从的人那就有了不知亿万，这确是一件大注意的事。

这种改革的目的。潜伏在数十万人的心坎中，经过了几百年，方才有人崛起而宣布这一致的要求，自己来担任领袖，促其实现。

现在，群众们的愤懑，就足以证明了他们的心目中都具有的彻底改革现状的势望；有许多人厌恶着选举，还有极端的疯狂般的左倾的人，也可以作为佐证；他们就是新运动所第一应该顾到的。

我们要恢复我民族的政治势力，第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应该先恢复我民族自卫的欲望。

经验告诉我们，对外政策的建立，以及国家强弱的判别，根据于现有的军备者少，而根据于民族的显著或是潜蓄的抵抗力者多。

因为同盟条约，是人所缔结的。

因此像世人都认为英国人的指挥和精神，很是果敢坚毅，那么我们仍斜把英国民族看成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同盟者了。

因为他们一经奋斗。

就立刻决定殚精竭力，不惜时间和牺牲，来达到他们所期望的最后的胜利。

从这地方，就可以见到一国的军备，不必随时和他国成了任何样的比例。

要把德国的目的自治国家的新运动再建立起来，必须要集中力量。博取群众的拥护。

我们所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是丝毫没有希望，而且很缺乏爱护民族的热忱。

凡是对内对外的强有力的民族政策，无疑的，必定要受到他们所对。

德国的资产阶级，他们很是愚昧无知，在自由解放之前，曾用消极抵抗的态度去反对毕士麦；因为他们素以怯懦著名，所有我们也不用去怕他们有了那样的积极的反对。

但是，就国内一般具有国际同情的群众而论，那情形又不同了。

不但是他们的本性倾向于暴横的观念，就是做他们领袖的犹太人，也是愈来愈残暴了。

除此以外，凡是一种运动，出于自卫机的，必定要被些背叛民族的党魁所反对仇视。

如果日耳曼民族要恢复过去的地位，必要首先来制裁这辈祸国的罪魁，在将来的法庭之中对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事件，将不再作为通常的国事犯来审判，而作为背叛民族的罪来审判。

因此，不论是那样的恢复德国的独立的思想，必定和恢复我民族的坚强的意志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的。

在一九一九年的时候，我们已经看清楚了新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必须唤醒群众的民族观念。

从策略上说，有下面的许多要求，由此发生。

（一）要使民族运动能够吸引群众，就应当不惜任何重大的社会牺牲。

但是，运动的目的，既在为德国民族而唤醒德国的工人，那么当民族生活的维持和独立还不曾受到威胁的时候，经济牺牲性，自然还不曾到了必要的时候。

（二）要使群众民族化，那决不能去用敷衍的手段或是客观的和平表示所能成功的；唯有毅然决然地把全力集中在这种目标上。

大多数的民众他们并不是大学教授或是外交家。

一个凡是要想得到民从的拥护必须知道用那一种的秘锁，才可以去启发民从的心灵。

此种秘锁，并不是一客观的力量，而是一种决心和毅力。

（三）如果我们为了的目的，积极的指挥着政治斗争同时再努力于消灭敌人，则我们必定能够获得群众，这是毫无疑义的。

群众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如果去和那目的显然相反的人握手言欢，这决不是群众所能懂得的。

他们只知道强胜弱败而已。

（四）如果要把某一阶级列入于民族的全体，或是纳进国家，这方法并不在贬抑上等阶级，而他在提高下等阶级。

但是担负这种责任的，那决不是上等阶级，而是正在争取平等权的那个阶级。

现在的中等阶级，他们能得参与国事，这并不是赁藉了贵族的帮助，是靠着他们自身的实力，以及他们领袖的领导。

要使现在的工人，去接近民族主义的国民团体，其中最大的障碍，并不是阶级的利益，而是国际领袖的态度，因为这辈的国际领袖，他们是仇视着民族和祖国的。

那些工会对于政治和民族，如果是具有狂热的民族观念的话。那么工人会可以使无效的工人一变而为民族中的最优良的分子，并且和各处纯粹的经济斗争，完全是没有关系的。

倘使一种运动，要使德国的工人倾向于自己的民族，并且对疯狂的国际主义，加以鄙弃，那么，必须切实反对那些大雇主所取的态度，因为雇主把民族的意义，认为就是雇工在经济方面应该屈服于雇主之下的。

如果工人不尊重公共的幸福，不维持民族的经济，只知靠着他自己的强力，横肆要挟，那么他对于民族所犯的罪，实不下于雇主以残栈的剥削手段，去蹂躏民族的劳动力，从他们的汗血中去榨取厚利。

因此这个新兴运动的同志的来源，第一便是工人团体这种运动的任务，是在使工人们脱离遇妄的国际主义，从贫困的社会之中使他们解放出来，从不他们低落的文化这中把他们知识增高起来，且能在团结完善、和充满丁族感情及热望的社会中去成为一种主要的分子。

实在，我们的目的，并不愿意在民族的壁累之中欣起了变动，而是要使反民族派的人员改变了他们的态度，我来信奉我们的主张。

整个运动的方针，对于这原则是极关重要的。

这种一贯而明显的态度，必须要表现于史党的宣传之中（这态度是宣传者必须具有的；宣传的内容与方式，必定要能够感动群众，并且再观察其实际的成绩是怎样，那才可以测验这种宣传的是否正确。

在群众的大会之中，效力比较最大的是演说，这演说并不在能感动知识分子，而是在能投合群众的意思。

要使政治达到改革运动的目的，我们决不能单由苦心劝导。或是感化当局的方法便能到目的的。

唯一的方法，便在夺取政权。

然而，仅仅把政局，变动了一下，因而便取得了行政权，这是仍能认这种“苦跌打”（Coup d'état）为成功的。

必定要革命根本目的和意志完全已经实现；而且为民族所造的福利较旧时代使大家所享受的为多。

一九一八年的秋季像盗匪行为的德国的革命暴动，根本不足以语比。

但是假如夺取政权，是实现改革的前提，那么把改革作为目的的运动，在开始的时候便当为民众运动，而非文人的茶话会和游艺会。

这个新兴的运动，在本质和组织上虽对议会加以反对，但是，在原则以及和党的组织上，便否认取决于多数的任何的原理，这个原理的含义，谓领袖如果是仅仅维持秩序和执行他人的命令和意见，那是对于他的身价有损的。

依照了新运动的主张，不论事件的大小，领袖是具有绝对的威权，并且还负有完全的责任的。

把这种原则去贯彻于全党，并全再推行于一国，那就是新运动主要任务的一种。

最后这种运动，它认为它的任务并不在恢复那一种特殊形式的政府而去反对其他的政府，它是在创立民主政权和君主政体所依着维持的基本原则。

它的使命，并不在建立一个君主政体，或是一个民主政体，而是在创立一个日耳曼的国家。

这种运动的内部组织，并不是一个原则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便利的问题。

最优良的组织，必须使领袖和党员间的隔阂尽量的减少，因为组织的使命，是要把一个确定的理想这种理想，是常在一般人的脑中造的——输入民众的脑海中而促其实现，在党员增加的时候。必须要成立支部；这支部便是将来政治团体中各地的细胞组织。

这各运动的内部组织，应当依照下列的纲领：首先把全部的工作集中于慕尼黑一地。

训练忠实党员，并建立一学校，以便为这种理想作将来的宣传。

把现在在这里所得的显著成功，作为将来取得必要威权的手段。

在慕尼黑中央领袖的权威已经得到了绝对的公认之后，于是再来成立地方的支部。

做领袖所需要的资望，不但是意志，并且是才能，由才能所生出的力量，较之由纯粹的天才所生出的力量更为重大才能意志和坚忍三件事完全集于一个人身上，这人便是最良好的领袖。

一种运动的将来，是有赖于从事运动者的狂热（甚至是偏激）。他们把这运动当作唯一的正当的运动，极端反对那性质相似的其他的组织。“

如果说，一种运动和他种运动联合起来，便可以增加力量，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虽然这种运动的目的也许是相似。）我向来承认运动数量的增加，便是范围的扩大，但是，那些浅见的入，在他们的眼中看起来，以为就是势力的增强；其实，徒使这运动的本身。孕育着衰弱的种子。

凡是一种理想所寄托的无论什么组织，它的伟大。就是在于他的宗教狂热和那能容忍的固执的精神，他们攻击其他的组织，坚信着人家都是不对的只有我是的。

如果理想的本身合理，并且以这种武器，那众。这理想，奋斗于世界之上，必定是所向无敌的。凡把压迫加之于这种组织。那是恰好使其内部的实力增加。

基督教的伟大，并不在于委曲求全而使教义和古代类似的哲学思想相调和，是在于他们对于本身的教义，努力于坚决和狂热的宣传到及辩护本党的同志加于民族敌人的一切仇视以及这种仇视的表现用不到惊奇看作这是平常而当然的事。

因为谎言和诽谤根本和这种仇视的表现是不能分离的。

不论是那一个，凡是不受犹太报纸的攻击、诽谤和污陷的，那么这人便不是真正的日耳曼人，不是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的信徒。

欲判断他的意见的价值，信念的确否，以及意志的强弱，完全可以用我们民族社会主义的信徒。

下篇 一、世界观和政党

一种新的运动，第一要能够贡献——一些新的世界观，而不专门去替政党号召选举，倘使在运动开始的时候，这种高尚的信念，不能深入到党员的内心，那么，这种新运动在从事于伟大的奋斗的时候，必定难于得所需要的权力，这是十分明显的。

各党的党纲，屡次的加以修必，在这时候，一切卑劣的动机，往往就反映了出来，这是我们必须切记的，通常各政党的所以采用新党纲，或者是改变旧党纲者，他们的动机之一，便是顾虑到下届的选举而已。

议会的选举结束后，议员获得了任期五年的美款。

他们便每天早晨赴议院去。

议员未必入内办公，可是签名画到，那是天天如此的。

议员如果是为民宣劳，天天签到，那么，他所领的薄俸，实在是应得的报酬。

天下事情的最令人懊恼的，莫过于间眼见到议会辨事的真相，以及他们层出不穷的欺骗。

这议会制度，决不能增加了小资产阶级的实力，来抵抗马克思主义的有力的组织。

那些议员们，对于这一点竟未曾熟虑到。

凡是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他们政治斗争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各夺取国会中的议席，至于信仰和原则，那是都可以随时抛弃的。

所以他们对于党纲的决定和力量的估计，也都依了这种旨趣为依归。

这样的政党决不会号召民众的魔力，因为要感动群众业而吸引群众，唯有伟大的高尚的理想，以及坚定不移的信仰，和大无畏的精神相结合，这才能达到目的。

当敌方用了最凶恶的武器来破坏固有的秩序的时假，另一方面想要谋抵抗，那只有建设一种新的信仰（就以我党而论，便是一种政治上的信仰，）放怯弱的防守态度，而改取一种勇往直前的攻势。

“民意”（*Volkisch*）的概念，恰好是像“宗教性”一语一样的，漫无限制，解说分歧。

这两个名词，都含有某种基本的信仰。

而且两者虽然都屑重要然而涵义空泛，必须要使其成为政党组织中的基本元素之后，才能承认了它们的价值，这是一种差强人意的见解，人类不能单靠感情来实现改革世界的理想及其要求，正和不能单靠普遍的渴望以争取自由是一样的。

争坟独立的理想，必须要有武力的组织，而后民族的愿望才能得到了圆满的实现。

不论那一种世界观，虽然是万分的正确，而且有益于群众，可是，在原则上如果不是以武力奋斗作为基础，那么就不以建设起新国家来；而且不是等到奋斗已经获了重大胜利和党中的信条已经成为国家的基本新法律的时候，这种奋斗的运动，也不能自成一党。

一般人对于政治的见解。

大都具有下述的观念：创造力和教化力，这是应为国家必具的特性；国家是在经济上所必然的产物，充其量也不过仅是政治力的自然结果，和种族问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这种基本见解，如果加以推阐起来，不仅要使人误认种族的原动力，而且对于个人的价值，也半来无从去加以评断。如果把各种族创造文化能力差异来加以否认了，那么判断个人的品格，自然也必定发生了荒谬。

假设一切各种族的性质相等，那么一切民族，甚而至于个人，都没有区别可说了。

所以常有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他的本身，不过是一种普通的世界观（此说由来已久）经犹太人马克思刊行于世，于是便形成成为政治上的信条了。

这种学说，倘使不用毒恶性的手段来作为基础，那么在政治上决难获得上信条了。

这种学说，倘使不用毒恶的手段来作为基础，那么在政治上决难获得了非常的成功。

马克思仅仅是千万人中的一人，他能够用预言家的眼光认识了这腐败世界中的主要的毒物，用了巧妙的方法去提取而制成浓厚的毒液，用以迅速地去毁灭世上一切自由独立的国家。

马克思之所以如此，那是为了谋犹太种族的利益而已。

因此马克思主义便成为现在普通的流行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了。

亚利安种族的存在，实在和欧洲社会的文化及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倘使有一天亚利安种族消灭或是衰微了，那浑浑噩噩的黑暗时代势必再重现于世上。

无论那一个人，如果用民族主义的眼光来看世界，凡是要消灭人类的种族，因而使人类文化有了破坏，这是应该认为是一种罪大恶极。

无论那一个人，他如敢打倒天之骄子。那就是他违背天意而自绝于天国。

在遥远的将来，我们都深切的知道人类必须要应付这种种的难题；到了那时，最高贵的民族必定做着世界的盟主，而且受万国所拥戴。

不论在什么时候，世界观的建立，必须把它的理论明确的宣布于世。

酝酿中的政党，它的党义和党的关系恰好是像教义和宗教的关系。

所以民族主义世界的理论，应该锻炼成一副工具，以作武力的防御——恰好是像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趋于国际主义一样。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便是以此为其努力的目标。

我知道我的特殊任务，就是在从那些庞杂的世界观的材料中，去抉择出它的中心思想，而使这中心思想成为简明扼要，类似教义，这样，必能使所有的信徒精诚团结。

换一句话说，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须要适合于民道德世界观的重要原则，而且须注意于实事求是，顾及人类的才力和弱点，把这种原则，变成为政治的教条；当这种方法已经使群众奠定了严密的组织的时候，这种政治教条，必定是世界观最后胜利的先决条件。

下篇 二、国家

一九二〇——二一年间，小资产阶级中的人士，他们大家都责难我党的新运动，说我党对于国家是抱着反对态度的，所以各党派的政客们，大家都主张采用种种方法，来扑灭这新世界的理论的战士。

他们在意把小资产阶级来忘掉，而在小资产阶级所谓国家。已经不是纯一组织；“国家”一个名词并没有一定的定义。

各党派的政客，他们大家漠视这种的事实，大家都置之不问。

然而在我国国立各等学校中的法律都是他们在讲解国家法律的时候，无非来强词夺理，对于蒙养他们的中枢，解释他是不存在的必要而已。

一个国家的组织愈是不良，那么世人来解释他的存在的目的，也愈是奥妙解释譬如生于二十世纪最恶劣之畸形国家中的大学教授，他们极要畅所欲言的来说国家的意义和目的，这岂不是一件难事吗？

德国的人民，大抵可以他成为三派：第一派，他们把国家看作是人民自动结合而受治于政府的。

从他们的眼睛里看起来，国家的存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他们因为要贯彻这一种疯狂谬妄的思想，所以甘心去俯首贴耳，来尊重“国家的威权。”因此，在一反掌之间，他们立刻把手段变成为目的，国家不俯首贴耳，来尊重“国家的威权。”因此，在一反掌之间，他们立刻手段变成为目的，国家不复是为人民服公役的，人民反以崇拜国权为人生的目标，而官僚便是此国权所庇护的。

第二派他们不相信以树立威权为国家唯一的目的，国家也应当计及国民幸福的增进。

这一种国家观念，错误在含有不大正确的“自由”思想。

实际上，一种政体，不能因其存在的缘故，就说它是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理由；“到底”它适宜与否，还须加以考核。

我国的纯正的小资产阶级，尤其是自由民产党人都赞成这一种主张。

第三派的人数最少。

第一派的主张联合语言相同的民族，去实现一种空泛的武力政策国家是不过实现这一种政策的媒介而已。

最堪痛心的，就是在近百年来抱着上述各种见解的人，喜欢滥用“日耳曼化”

的一个名词。

我还能想到当我在少年时化，这个名词竟怎样引起了可惊异的错误观念呢，曾经听到“泛日耳曼”一派的建议。说是如果得政府的助力，那么奥地利斯拉夫人民的日耳曼化便可实现了。

真是出入意料之外的，有人以为一个黑种人他们因为学过德文的，而且终身讲着德语，并且为德国的某政党投票，就可以变为德国人。

然而我们不能想像他是能变为德国人的。

这种办法实在就是种族混杂的开始。

从我们的情形看起来，这并不是日耳曼化，实在日耳曼成分的毁灭而已。

民族或是人种的鉴定，在乎血统不在乎语言；倘使能够改变了人种的血统后才能说到同化。

但是血统的改变，势所难能，所唯一——的方法，就是血统混合；要是真的这样了，那么，优秀种族的品质，必至低落无疑。

从历史方面去观察，我们的祖先用了武力征服这一块土地，实行日耳曼化，这是大为有益的；因为居定在这地方的大都是德国的农民。

如果一朝引进了异族乱了我们的血统，那就要有不幸的结果发生，这结果就是使我们的民族性毁灭殆尽。

我们顺有这个根本的认识。

国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国家虽然是形成了人类高等文化的基础，但是国家并不是创造文化的原动力。

能够创造文化的仍旧是赋有天才的种族。世界上仅有几百个模范国家，但是，保持文化的亚利安族如果一朝衰替了，那么现在最高民族的文化，也将不再存在。

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说，倘使人类的高等智力和适应能力。

因为同有种族为之护持而致丧失了，那国家虽由人民来构成，也岂能防止了人类为之灭亡？

国家的本身并不能产生一定的文化标准；国家仅能把决定这项标准的种族集纳于一处，所以产生高等人类文化的必要条件，产不是国家，而是优秀的种族。

赋有文化和创造天才的国家中是种族，即使因为环境恶劣而不能发展，但是他的才能，仍旧是潜伏在这种族之中的。

所以如果说纪元以前的日耳曼人是一种粗野的蛮族，实在是十分荒谬的。

我们的祖先是一种文明的种族，决不是蛮族。

他们聚居于气候严寒的北国，环境把他们束缚了，使他们的创造性未能发展。

假使没有古化典型文化专美于前，而我们的祖先得宅居于环境较优的南方，利用那些劣等民族最初所用舶器械以谋进展，那他们创造文化人潜势力，必定能够磅礴于外，因而产生出灿烂的文化和希腊文明，先后的交相辉映了。

民族德国国家所努力的主要的目的，是在保存种族原有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是利用学术的有机体，它的使命，不单是仅在保持固有的民族，而且还须继续着培养它的智力和想像力，使它达到最高的自由的境域。

现在，我们因国家而受以的压迫，乃是人类极端的错误的结果，将来的后患，是谈都谈不完的。

世间的一切，因了我们的思想，就把民族社会主义的党员认为是乱党，对我们横加污蔑，这是我们并非不知道的。

然而，我们万万不可以因了一时的毁誉，便就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必须要坚决的服应我们所认识的真理。

我可以确信后世的人，他们不仅要谅解我们现在的行动，并且还要认为合理而加以推崇呢。

这是我们必须加以牢记的；国家的重要使命完全寄托于民族中；国家的责任，只是在利用它的组织力，以求达到促进民族的自由发展。

可是，我们试问一下德国人所需要的国家究竟应去该怎样组织？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明了国家的旨趣是在容纳那一种人民和完成那一种目的。

但是很不幸，我民族的中坚的组织，它的种族的成份已经不纯粹了。

各种复杂的成分尚还没有完全融化，我们便不能断定德国的民族是一种新民族。

反之从三十年战争以来德国的民族，因了血统混淆所受的毒害，不但是摧毁了我们的血统，并且还摧毁了我们的灵魂。

我国的四境，门户洞开，四邻的异族，不时的从边际徙居于内地。

外力的侵袭继续不断，实在没方法使我们的血统能够完全融化的时候。

凡是血统单纯的民族，他们都具有合群性，能够在民族凭于危急的时候，共同一致的起来禀侮救难；可是，我们德国人就缺乏了这一种天性。

这种缺陷，使我们受害很大。

因为德国的民族缺乏合群性，所以国内的群雄，大家割据一方，各自为政；结果，把德国的民族，自主权利完全剥夺得没有了。

一个有生命的国家，应当以实施较高的理想为标志，而去代替毫无生气的只因为它本身图谋生存的组织。

德国人应该国家的权能，把一切德国人团结起来，还须从日耳曼的民族之中，选择原有的优秀分子而加以维护，更须逐慢慢地使它取得统治的最高地位。

自然的，现在统治我们的国家的官吏他们是乐于维持现状的，他们决不愿为了未来的幸福而去奋斗。

在他们眼中看起来，国家好像是架机器，单为维护他们的生活而存在的，所以他们常常爱说他们的生命是“属于国家。”

照这样看来，我们果真为这新的理想（这种的理想和事物的原义是完全符合的）而去奋斗，那么，在这些行尸走肉的无用的人群之中所得的同志，必定是寥若晨星。

只有国内的那些头脑新而有着壮志的老年人愿来和我们拉手，那些因循苟安的人是根本谈不到的。

我们必须记着，如果把一个民族中的少数的出类拔萃的英俊完全团结在同一的目标下面并且摆脱去一切群众的惰性，那么这少数的出类拔萃的英俊，必定可以成为多数人的领袖。

世界的历史的造成，完全是少数人，因为这少数人，他们实在具有最多的民族的意志与和毅力的。

因此有些事在多数人看起来是不利的，实际上倒就是我党胜利的必要条件。

我党的事业，是那样的繁重艰巨，所有加入我党去共同奋斗的，多数都是些骁勇之战士，这才有希望我党成功的保证，必须在选择优秀的战士上面。

如果说异族杂交后。

较高的民族能够保留他们固有的品质的话，那么，那些杂种，迟早必致衰亡。

如果说文化比较高的种族，因了杂交而失去他们固有的品质，那么，那些杂种，必定不会不灭绝的忧虑。

复兴民族的程序，是在因势利导，就是缓进也不妨的。不过我们必须奠定我们的基础，这种程度，才能慢慢地驱除去败坏我种族的毒素。

不过，这是假定基本种族的品质还存在，而血统的破坏受了制止以后的话。

民族国家的紧急任务就是在于改进婚姻的制度，使它免得在种族上永久的留着污点，婚姻必须看作是神圣的制度，用以来创造像神的人类。

而不是创造半人半兽的怪物的。

站立在所谓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出而反对上面的主张；他所持论点是和时代不合的。因为吾人所处的时代一方面既是允许腐化份子繁殖子孙而贻害当代，流毒后世；一方面又可能允许药商小贩，向健康的父母去兜售节制生育的药品。

在这自称秩序井然的近代国家中一就是当这民族中的小资产阶级雄视一民的时候，一像防止身染梅毒、肺病、和其他的遗传病的人以及残废；白痴等人的生育，常常看作是一种罪恶；反之，如果有几百万健全的国民，他们实行节制生育。

那就不算一回什么事，不认为是违犯了社会的道德：从他们这种浅陋的思想看起来，反而可以引为没有头脑的人安慰的。

不然，他们势必忧虑怎样去和对于民族的健全份子的保护。

以后的健全份子，对于他们自己的后代，应该担负起同样的职务。

理想和荣誉，在这整个制度是多么的缺乏呢！世人大都得过且过的因循度日不想去改革，不肯为后世去培植最优秀的人才。

民族国家的责任，就是在捕救现在所怠忽的一切事业。

民族国家必须命名使种族成为全民族生活的中心，设法使它保持着种族的纯洁。

下篇 三、公民和国民

现在大家所说的“国家，”单单把人民分为两类：一是公民，一是外侨。

因为出生地的关系，中是入籍的缘故，因而享受公权叫做公民；在他国的统治下享受和分民相同的权利的叫做外侨。

现在要取得这种权利，第一个条件，必须生在国家的疆域内，种种和国籍的问题倒是没有怎样的关系的。

比方像黑人，从前居于德国的保护地，现在居住德国，他们的子女就可以算是德国的公民。

要取得一个国家的公民资格的全部手续，竟像去加入汽车俱乐部为会员一样。

我知道这句话大家一定不乐闻的。

可是事实上，德国现行的公民律的荒谬和草率却令人不能不来这么的想。

现在已经有一个国家企图发育改良他们的公民律了。

我所说的，原不是指我德意志模范共和国，是指竭力以理性为师表（至少一部分如此）的美洲合众国。

合众国的政府，他们禁止不健康的人入境，而且严禁某一入种入籍，这实在是超向地民族国家观念的第一步。

民族国家，分别他们的民为三类就是公民、国民、外侨、就原则方面来说，一个人的出生，只能获得国籍；不能因此而去做国家的官吏，中是参加选举凡是一个国民，必须有种族的国籍的两种证明。

国民可以随时脱离国籍，而在和他们同民族的国家内成为公民外侨的所以异于国家，就是因为他居地外国而仍保存他的国籍的缘故。

德国的青年国民，须受德国一切人民所应的教育。

以后，他了应该受国家所规定的体育，最后入伍而受军事训练。

军事训练是人人所必受的，成绩优良乃强健青年，于军役完毕之后，乃由国家正式授以公民的权利。

这一件事，实在是他一生最为可贵的纪念。我们必须知道得为做一个德国的公民，即使他的职业是一个卑下的清道夫，然而他的荣誉，也必胜于做外国的帝王。

德国的子女，不过是国民，一直结婚以后，那才成为公民。

德国的妇女，她们从事于职业者，也得授给她们公民的权利。

下篇 四、人格和民族国家的观念

如果我们并不预备去探求马克思理论的结果，那么，希望把个人所属各族去估量个人的价值，而同时又去攻击马克思派的“人人都是一样，没种族的分别”的理论，那真是傻子。

倘使有人相信同代的民族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用纯粹的机械方法和经较优良的经济生活的组织，使本国和他国不同——换句话说，就是调和贫富或是扩大经济的统制，或是使报酬公平百除去过巨的工资的差别——这样的人，他必定要陷入绝境，因为他一些也没有我们所说的世界观的眼光。

上面所说的种种方法，既没的长久的期望，也没有伟大的前途。

如果一个国家仅仅信赖这种浅薄的改革，那么，在这国际的竞争之中，决难获得胜利。

一种运动的使命，如果是出地这样的妥协方法，势必不会有伟大的改革，因为这是夫浅而不深入的缘故。

要明白这种道理，我们不防去大略的追溯一下有类文化发展的真正起因。

人类所以得禽兽不同的缘故，第一就是因为人有发明的本能。

当人和一切兽类斗争的时候人类有巧妙的方法，用以去驾驭各各具有特殊能力的动物。

就在这个时候，人格便足以决断疑难，建立奇功，以后人类就把这看作当然的事了。

一人对地自知的能力的所以能够认识（我一直把自知之明认为是一切策略的基础，起初因为他具有果毅的精神，不过这种精神，直到几千年之后，人类才开始公认这是极是自然的事态。

人类除了这第一种发现以外。又有第二种发现，就是他知道在生存竞争的时候，怎样去谋生。

人类所特有的发明能力。遂由是而起就在从这地方开始的。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就是这一种发现的结果。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从个人创造能力上面所产生出来的。

这种发同，使人类继续向上发展的功迹实属匪浅。

从前在森林中为猎人生活而奋斗的种种单纯的技巧，现在已经在为科学上的巨在的发现，这种发现，既有助于现在人类的生存竞争，而且又是为未来的生存竞争制造武器。

把纯粹理论去发展而所费的思考，那是无法可以计算的凡是一发物质发现的必要的初步工作，是个专有的产物；可是对于更进一步的物质发现，实在是一个必的前提。

群众并不有所发明；大多数的人，也没有组织和思考的能力；所赖者，只是个人而已。

人类社会，如果能够竭力去推进这种创造力的工作以为社会谋福利，那么人为社会，才能有良善的组织。

才能有良善的组织。

而且这良善组织的社会，应该设法安置有才智人士于群众之上，使群众大家都听受他的指挥。

所以社会的组织不但不应该阻止有才智的人士高出群众之上，而且还须努力使有才智的人士居于最高的地位。

一种剧烈的生存竞争，是促成智力高于一发的主要原因。

统治国家行政的国防军的，完全是——种人格观念和它的权威，以及对于地位最高的人所负的责任。

现在的政治生活常和这自然的原则背道则驰的人类的文化，差不多是人格创造力的结果；在社会的全体是这产在领袖间也是这样可是现在竟把尊重多数的原则作为决定一切的权威，而且很慢慢地使人受着它的毒害，实在是受着他的破坏。

犹太教对于其他人民所施的破坏工作，就是在时时消灭个人的重要，并摧毁该民族中的主人物，则把群众的意志去代替这主要人物。

于是，我们就可以知道了马克思主义是犹太人用以消灭在人生各方面的领袖人才的一种明目张胆的企图，他们企图着在人生各方面取消了人格的重要性，而去代之以多数的群众。

在政治上的议会制度，就可以处算是它的表现的一个代表。

从最小的教区会议，一直到控制全国的大权都是这样的。

马克思主义的本身，决不能建立起一种文化，或者独自创造一种经济制度；进一步说：它在事实上决不能依照了固有的原则去维持现存的制度。

可是在短期之后，马克思主义又不得不表示让步，回过头来承认人格原则的理论；就是在该党的组织中，也不能去否认了这一项原则。

所以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绝对的相反的民族主义确信种族的价值，十分明了格的重要，并且使这二者成为国家的柱石。

这就是民族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要素。

民族国家应该继续努力使整个政府，尤其握有政治领导权的最高机关，一脱离了群众的操纵；必定要这样，这才能取得了无上的权威。

最好的国家的制度就是用毅然决然的手段。

去选择中有才智的人士，叫他做有权威的领袖。

决断权切不可操在大多数人手中，国家应该是一个负责的团体，而（Rat 顾问）

一字应该恢复它的古义。

每个人的旁边虽然熊可以有问，可决断必须出之于一人。

一切的专门问题，一例如经济一民族国家不可以去请教于没有专门学识和没有职业的人。

于是，国家分设了若干的政治委会及代表专业的委员会。

在这两者的上面，又设参议院，俾能收到合作的效能。

参议院和众议院教没有决议以；任命议员，是使他们工作，并不是使他们来决议。

各议员可以参加意见，但是能有什么决议的；因为决议，是当时主席的特权。

我们的主张能不能实现。我敢请读者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所用多数议决的议会原则，决不有长久去支配人类；反之，在历史上支配人类的时期，大都是民族国家衰落时期的短期中。

无论怎样，我们切不可去妄想：以为由在上者用了单纯的理想方法，就可以产生出这种动来；因为他所牵涉的，并不是仅仅一国的政制而已。

一切立法，和一般公民的生活都应该充满这种变动的精神。

只有一种运动，才能实现这种的改革；这种运动，是由政革思想的精神所造成，所以这种运动的本身可以成为未来国家的创造者的。

所以现在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和这理想符合，而且在他的本身的组织中实行，这样那不但把国家导入正轨而且还能使这个完善的国家能够执行它的职务。

下篇 五、世界观和组织

我所要大概叙述的民族国家，决不是单单知道了他的必要条件，就可使它实现的。

也并不单单知道了它的表面的形态，就足以了事的。

民族国家的产生，实在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我们不能去静静等待现在那些损国的各政党自协的来改变他们的态度。

因为他们的真正领袖大都是犹太人，而且只有犹太人，所以尤其没有改变态度的可能。

犹太人抱定了他们的目的，为对付这几百万德国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的为势很大，而这班德国人又是大都昏庸怯弱，日趋灭亡。

犹太人对于他们的最的目的，都是十分明白的，所以，凡是犹太人所领导的政党，除了犹太主人的利益而奋斗以外，不再有别的企图，他们和亚利安民族的特性是毫不相同的。

如果我们要实现民族国家的理想，我们势必要抛弃了现在支配公众生活的势力，而另外去求取意志坚决足以为这种理想奋斗的新力量。

倘使我们的初步工作，不在创造民族国家的新观念，而在铲除现在犹太人观念，那么，目前的奋斗，这是无法避免的。

一种含有伟大的新原则的新主义，必须把严厉批评作为他们的最初的武器，至于被批评的个人对这批评有了怎样的厌恶，那是可以全不管的。

马克思主义启然有着他的目的，而且还抱有一种建设有雄心（虽然他们所建设的不过是犹太人垄断世界金融）然而，他们致力于攻讦已经有了七十年。

以后便开始他们的所谓“建设工作”。这工作是正当，自然，而且又合逻辑的。

世界观不但不许而且还不甘和其他各党为伍，它的唯我独尊的地位，依了他的新观念，去改造全部的公共生活。

因此，对于代表过去的状况的旧势力，世界观是不能容许它继续存在的。

宗教也是这样。

基督教并不把建立他们本身的祭坛算是满足；必须要进而去破毁异教的祭坛。

但是这种狂热的排他性，能够创立了万古不磨的信仰，这就是该教存在的绝对的必要条件。

政党每容易妥协而世界观便不是这样。

党和他的政党磋商条件，世办观便公然说他本身正确无讹。

无论什么政党，在并始的时候，大都是抱独揽大权的希望的，所以大都是是具有若干世界观的成份的。

然而，因为他们的党纲贫乏，所以各党大都没世界观的英雄气概。

因为他们这样的愿意和人家妥协，所以各党所吸引的大都是一些软弱无能的人；和弱者混在一起，决不能肯为主义而去奋斗的。

所以各党常常在开始的时候，就因了他身的懦弱而不有有所进展。

如果世界观不是罗致一批国内在当时算是最勇敢有实力的份子，叫他们来组成奋斗团体，那么他们的理想是决难实现的。

同时他们又须就世界的一般的现状中，去抽出某几种确定的世界理论，用了简明了的文字去表达出来，俾可作为新社会的信条纯粹是政治性质的政党，他的党纲，只在希望为将的选举获得胜利着想，而世界的计划，那就直等于向现在的社会宣战；其实。这就是向现存的世界观实行宣战。

信仰世界观而愿意去奋斗的各个战士，对于领导者最近的思想以及他的思想的过程，那是用不到去完全了解。

譬如军队假使士兵们个个地有大将的才干，于军队是并没有什么大益处的，所以政治运动，如果“知识份子”的集团那么，他们对于世界观的维护，也必不会有什么的补益的。

因此政治运动，也是需用到思想简单的战士；因为没有这班人，那内部的纪律就不能有所整饬。

在本质上，倘使有一位具有大学问的领袖，舒畅是不会激于感表的群众受着他的指挥，那么，这组织的本身必定仍不巩固。

如果有一队有二是人的军队，他们的智力都相等那么他们的纪律，恐怕比了五百九十人智力较低而十人智力较高的另一队更难维持。

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的军队是军官和兵士所组成的。

退伍的德国工人，做士兵；犹太人中的知识者则做军官。

民族观念要想使从现在的，空洞的希求中去产生，且能还获得显著的功效，那我们应该在宽泛的思想之中，去选出若干确定的主要的条文。

这样，那新运动的党纲，就可以草入少数的主要的条文当中，这条文一人虽只有二十五条。

这个目的，第五是在使局外人大家都能知道一些运动的大意。

这种党纲，有些像政治的条文，一半是向外宣传它的主义，还有一半是向内缔结共同的誓约，以便团结党员号召徒众。

我们所以把原则上正确的主义广泛地为加以宣布一上的缘故，就是因为我们以为坚持一种概念（即使和实际情形并不完全符合）为害较小，而公开讨论以前所认为不能更动的基本原则，因而发生了极大的流弊，为害较大。

实在，当一种运动正在进行之中，那是决不能有公开讨论的。

凡是重要的东西，不有外表上探讨的，必需求之地内在的意义，而这内在的意义，已经不能再有什么更改了。

我只有希望我党为着本身的利益计，必须避免分化以及缺乏团结任何行为，用以保持那奋斗所必须的力量。

有不少的事情，罗马公教是可以教训我们的。

罗马公教的全部教义，虽然有许多和科学研究是互相冲突的，——有一部分是不必要的冲突一然而教会的本身，它们决不肯牺牲了教义中的片言只字。

教会方面充分地明白，它的抵抗力并不在教义是否能够符合了当时的科学事实一实际上科学事实是时有的变动一而在坚执从前是所规定的教条，因为它们的教条，就大体而论，本来就足以表示他们信仰的要旨的。

因为这样，所以教会的地位比较从前更是巩固了。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把他们的二十五条党纲，认为是一种确立不移的基础。

不论现在在未来，我党同志的任务，不在批评或是更改这等的主要原则。而在坚持信奉，把自己和主义打成一片。

这新运动就是依照这主要原则而定名的，它的党纲，也是根据主要原则而草成的。

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是含在民族主义的意义的；同样民族主义的思想，也是有着民族社会主义的意义的。

倘使要把民族社会主义的运动完成，那么，不是绝对的深信这种思想不可。

民族社会主义，在权利和主义上，都应该有明确的宣布：凡是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范围以外，再有表示民族主义的观念的，那是他的基础大都是虚伪而不足相信的。

各种派系的派别一不管它是小组织也好大政党也好一大都喜欢把“民族义者”为向人自命其实，这一个名词的由来，实在是受了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否则，各种会系等等，甚至竟不能说出“民族主义者”的一个名词；这名词对于他们，实在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

他们和他们的领袖，和这种思想无关。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是第一个和这名词发生一种重大意义的，而现在竟被众人所通用了。

我党的运动，从宣传工作方面，充分地证明民族主义的力量，因此，其他的政党，他们为了利益的驱使也来冒称说他们和我党的有着一样的志愿的。

下篇 六、初期的奋斗——演说的功效

一九二〇二月二十四日，我们在慕尼黑的霍夫布雷好土地堂（Hofbaufestsaal）刚在开第一届大会，就在筹备第二届的大会了。

在过去我们不敢有什么妄想，在慕尼黑一类的城市之中，每月或是每地周开会一次，现在则决定每举行大会一次了。

在那个时候，我们国社党的党员大家都差不多把这会看作很有一些神圣的意义。

每一次开会，济济一堂，到会的有增无减，而且听众对之一天注意一天。

每次的议程，大都是先论“战争的罪恶”问题（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人注意到，）接着是讨论和平条约；在这个时候，慷慨激昂的演说，十分的适用，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

假使在当时召集一个民众大会，参加的都是困苦的无产阶级，并不是麻木不仁的小资产阶级，一同来讨论凡尔赛条约，那么这个民众大会，不只是向共和国进攻，即使不被人认识为复辟思想，至少也必定被当作反思想的表现。

当我们把凡尔赛条约加以批评的时候，群众每有起来辩论的，说“那么布勒斯。

里多佛斯克（Brest—Litovsk）条约又怎样呢？“群众叫嚣不已，扰攘，一直到他们力竭声嘶，或是发言人晓得他们不能加以理喻而休止时为止。

唉！像这样的国民真是叫人失望！他们不知道，凡尔赛条约是我国莫大的奇辱，不知道这种和约，是地我民族的一种横暴的侵袭。

马克思党破坏工作，敌人的毒害宣传，处处地方使民众对于事理完全失掉了理智。

但是我们不必去怨天尤人，因为对方的罪恶大到不可限量。

但是，我国的小资产阶级，在当时对这狂澜是否来出力维持的？或者曾动用他们的智谋去启导了真理？然而他们并不如此。

我自己知道得十分明白，但是为初期的运动着想。战祸里的责任问题。就是该去依循了历史上的事实来解决的。

当强有力的敌人。动用了他们诱惑的手段，去欺骗着群众，使群众大家怀有狂妄的主张，和荒谬的态度的时候，那么，一种尚未发这的新运动，自然易于受欺，随附和而就和他们为伍了。尤其是当一个新运动认为群众之狂妄的主化有几点（即使完全是虚幻的）宜于采取这种行支时为更甚。

上述的情形，我碰到的已经不止一次，当时要用了极在的力量去防备卷入漩涡之中。

最后一次，就是当时我国的可恶的报纸，他们竟不顾日耳曼民族的生存，对于南的罗尔（**South Tyrol**）问题竟张大其辞，说日耳曼民族将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影响。

有许多所谓“民族主义”的人物、政党和协会行等，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应该怎样做，只是他们怕犹太人所激起的公愤所以糊里糊涂的就同声附和，赞助犹太人去反对一种组织，这种组织，在我们德国人遭此存亡关头的时候，都应该看作是在这腐败社会中的一线曙光。

当那些没有国籍观念的犹太人纵慢慢地置我人于死地的时候，我为有所谓“爱国者”的朋友，竟愤然反对有勇气的人和制度，要知道这种人和制度，至少在世界一方，我们是尽力图想脱离民族犹太人同盟的羁绊，要靠了民族主义的力量去反抗国际毒物的。

敌人对我们的辩论，有着他们的一定的争点，他们反对我们的要点，在他们的演说中，也再三的有着攻击我党主张的理由；从这种同样原辩论来看，已经足以显示出对方有着一贯的训练了。

事实上确也是这样现在我已发同了一种方法，这方法不但可以使他们的宣传失掉效力，而且还有以他的矛去攻他的盾。

这真是足以自豪的。

这样两年以后，我已经十分精于这一种技能了。

不论在什么时候，我每在演说之前，必定预先猜想在讨论中将在那种形工和性质的论辩发生，因此我在演词的前段，先把敌人的理由驳斥得使他体无完肤，这方法就是把对方一切可能认辩完全说了出来，来证明他们是虚妄。

而无价值的。

上面所说的，就是可以说明我在任教官的时候，第一次军队演讲凡尔赛和约时，为什么把讲题改为“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我和凡尔赛和约的比较”的缘故。

因为在第一次演后的讨论中，我就确切知道了他们不明白布勒斯里多斯克和约的真相，因为他们早已受了他们党中有效的宣传的影响，便认该和约是世界上最可耻的压近行为一种。

成千万的德国人把凡尔赛和约仅仅认为我们在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的作恶所应得的果报，这种谬妄的见解，实因用谎言继续着欺罔民众而致此的。

于是他们认为以对凡尔赛和约的任何举动，都是错误的，而且常常痛恨这种举动。

因此，那可耻而又可怕的“赔偿”一词，便就能通行德国了。

我在演讲的时候，同时提出了这两种和约，拿来互相比，使大家明白那一种是合乎人道的，那一种是反人道的，结果成绩很好。

在干百万听众的脑海里因此不再存有这种谎言，真理完全代替了他们心中早已存在了的谎言了。

这种集会，在我们是很有利的；因为我已经借此而慢慢地成为群众大会演说家了。

在容纳一千听众的大场中，应该需要的沈痛语调和姿势，我已经弄得十分的热了。

我们在最初几次的集会在桌子堆放着许多传单报纸及各种小册子，然而我们所依靠的只是言词，因为心理的关系，只有言词才能引起思想上的重大的转变。

演说家可以时时受着听众指导，使他能够矫正他的演辞，因为他可以观察听众的面色，就能推测到听众是否对他的演辞能够明白了解，和他的演辞能否产生了他所希望的效果；至于著作家，那是和读者并没有一面之缘，所以作家不能依当前听众来修饰他的词句，只好用普通的文字来说明普通的事理。

如果一个演说家，他知道了听众对于他的演辞不有全领悟的时候，便应该作十分浅明的解释，使大家都能够明白而且在解释的时候，审慎而很慢地说着，使那些知识最低的人也能够领会。

还有他如果知道听众对他的论辩有了怀疑，就应该另行举例证来反覆说明，并且把听众尚未说出来的反驳，先行说了出来，这样断续的做下去，直到最后的反对者，也从态度和面色上的表现显示信服时为止。

一切听众的成见，演说家往往用这方法去破除的。

因为他们的成见并不是起于是理智的认识而是起于不知不觉的无意识的感情作用。

欲破除这种和性上的压恶以及感情上的嫉恨和成见，他的困难，比较去矫正由错误的知识则生出来的意见困难万倍！一种愚昧和错误观念，可以由教导而去铲除；但是由感情作用而和出来的阻碍，那就不容易祛除了，如果要祛除的话，那只有靠站这种潜伏着的力量，然则这决不是著作家所能够负责的，只有演说家才有成功的希望。

马克思主义它所以对于群众能够有惊人的势力的缘故，这并不是得力于犹太知识阶级的是著作上面，而是得力于历来许多滔滔不绝支配群众的口头宣传上面。

在十万个德国的工人当中晓得马克思著作的人平均不会有一百人；而且曾经研究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当中要算知识阶级一以犹太人为最一的人数比了真正拥护这种运动下层阶级多到有千倍该书的著作，目的并不是为了群众，而是纯粹为了征服世界的犹太机关中有的知识的领袖，至于煽动群众，那就应用另一种材料，就是报纸。

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所以和我国的小资产阶级的报纸不同处，就是在这种地方。

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执笔的人大都是煽动家，而小资产阶级报纸，那就爱用著作家去从事于煽动的工作。

演讲的时间对于演讲的效果，也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

同一的演说家，去演讲同一的问题，但是因为时间的不同。像在上午十点钟和下午三点钟，或是在晚上，所得的效果便会截然不同。

我在最初演讲的时候，常把时间排上午，我还记得在慕尼黑德国酒馆（Kind keller）的集会，是在上午十点钟举行的，题目是反对德国领土的被压迫“。可是所得的结果，真是令人失望，然而同时我因此而得到了一个良好的教训。

我自信在当时我和演词，并不比平时说得坏，可是所得效果，竟是等于零。

然在这次的集会中我获得了较丰富的经验，可是我绝不把这一些当为满意。

以后我又试验了好几次，结果都是一样的。

善于演讲的人，他要感动听众，最好的时间是在晚上；因为听众在晚上精神疲倦，不像上午的头脑清醒意志坚决而反抗力也比较强的缘故。

在天主教的教堂里光线暗淡，有着神秘的意味而且又用香、烛等发出一种气息，用意正也和此一样的。

真是想不到的德国的知识阶级，他们认为著作家的智力必定比较说家为优，这正和他们的茫然不识世务一样。

在某种民族主义的报纸上对于这种见解，曾经作过最有趣的说明，说著名的在演说家所刊行的演辞，使人见而失望。

我记得在战的时候，我见到一篇论文，对于当时英国军需大工臣罗易。乔治（Lloyd George）的演辞细细加分析，后来得到了一个绝妙结论；说这种演辞，徒然是表现了演讲者的平庸而且又智能薄弱。

我曾在一本小册子中他的演辞读过好几篇，因而知道那班德国的读者，他们对于这种的心理杰作，足以感动社会的地方还不能明白，想到了禁不住表达着笑起来。

那些记者，对于演辞的批评，纯粹对他贫乏的智力所给给予的印象为断；要知道这一位英国的大演说家，他确能利用演说来感动听众；感动了英国的下层阶级。

这样看起来，就是英国人的演辞是有着惊人的成绩，因为他们能够洞悉群众的心理；所以他们感人的效力也深且大。

如果把前面所说的演辞和贝特曼。霍尔威史拙劣的演辞来比较一下；贝特曼。

霍尔威克的演辞，虽然是长于说理，实在不过是证明他这一个人不能向群众来讲演的。

罗易。乔治的演辞的内容和形式能够博取捉众的信仰和悦服，就这一点来说罗易。乔治比较贝特曼。霍尔威克也只有远过而没有不及的。

他的演辞朴质无华，而且叙述明白，字句易解，举例浅显，处处地方足以证明这位英国具有高超的政治才能。

民众大会实是必要的，因为当一个人正要去参加一种新兴的运动，在没有去参加的时候，不免是畏缩的；可是一经到会，便可以从大会中去得到一种良好的印象，这种印象，能够使多数人增加声势，鼓起勇气。

下篇 七、和共产党的奋斗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中间。

我曾亲自去参加所谓资产阶级的各种集会。

因此我大略知道了一些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宣传者。然而我并不惊奇着他们的举动，因为我十分明白他们对于口头宣传不加重视的缘故。

我曾去参加过民主党德国国民党（German Nationalist）、德国人民党（German Peoples Party）就是巴维利亚人民党（Bavarian Peoples Party 就是巴维利亚中央党 Bavarian Centre Party）的集会。

其中使我立时加以注意的，便是听众一致。

到会的会场些纪律，也没有就全体而论很像是一个杂乱无章的赌场，而不是从事于伟大事业的群众大会。

演说的人竭力保持着他们的镇静工夫。

他们背诵着满辞，大多数的人不把这演辞高声朗诵，极像报纸上精巧的论文或是学术的论文，他们避免去一切强烈的语调；演僻间有一二处温文儒雅的笑谑的穿插，引起了在演讲坛上人的轻微的一笑，这不过是联以助之仍不失绅士的那种态度，这样经过了四十五分钟，全体大家都昏昏走是睡乡了。

于是就有了早退的脚步声，互相谈话声，以及一部分听众的呵欠声演讲完毕了主席领导听众，共同唱一支德国的爱国歌，于是散会。

一听众们拥挤不堪的奋斗而出，有的到酒店中去的上咖啡馆去。有的出去吸一些新鲜的空气。

反过来，我们民族社会党集会，绝不是“平静”的集会。

两种不同的世界互相对抗，在散会的时候，每致感激群众的民族主义者的狂热，并不是唱了一只沉闷的爱国歌所能了事的。

我们的集会，有着严格的纪律，大家第一步是盲目的信从俾主席有着绝对的威权。

这件是极关重要的。

在我们集会里常有反对派来（共产党）参加，他们常常是结队而至的，偶然还有少数的煽动家份子混入在内，他们各人的脸上，望去都呈现着“今夜我们要和你们决一雌雄”的表情。

在这千钧一发的危险时候，唯有主席的魄力以及会场卫队的严厉的防卫，才能挫折了反对派的阴谋。

共产党员和我们的捣乱，这是有因的。

我们在精密考虑了以后，决定采用揭贴包的标语，故意来激怒他们，使他们愤不可遏，特地参加我们的集会——我们的用意，本来只是在离开他们——于是，我们趁此机会，来向他们宣传。

我们的敌人，因此令“有阶级意识的晚间阶级”成群结队来参加我党的大会，以便用无产阶级的力量，来攻击我们“专制而动的计划。”

在开会前的四十五分钟内，会场上已经充满了工人。

他们好像是一只火药箱，大有一触着导火线立刻爆发的趋势，可是在事实每每不像这样，他们在到会的时候是敌人，到了散会的时候，他们虽然未必和我们搦手，但至少他们也能反躬身省，并且去要查一下他们的主义是不是正确。

以后，他们竟这样地说：“无产阶级们呀！你们千万不要去参加民族主义煽动家的集会罢！”同时，共产党的报纸，他们也不了了之改变方针的表示了。

民众们见到了共产党的报纸对我们注意了，因此对我党也就加以注意了。

因此，共产党的报纸突然改变他们的策略，在有一时期，他们竟把我们看作是人类的真正罪人。

该报屡次的撰述论文，宣布我们的罪状，他们尽量的造出种种谣言，存心来对我们陷害。

但是不久他们好像也深知这种攻击的完全无效；便在事实上适足以引起一般人对于我党的注意而已。

我党的集会为什么敌党还有来破坏？原因就是由于他们的领袖的怯懦的缘故。

凡是到了危急的时候，这班不要脸的东西，大家都鹄立在会场的外面，静待事变的后果。

在当时，我们不得不自己来保持集会；我们决不能去依赖官厅；因为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官厅不但不能来为我们保护，而且加反帮助着那些捣乱份子呢。

官厅所擅长的手段，不外是把大家解散，这实在就是共产党捣乱。

因此，我们绝端的相信不论什么的大会，如果完全去依赖官厅来为他们作保护，那么他们领袖，决难取得群众的信任。

在从前，往往有少数的同志，他们挺身而出，对咆哮凶恶的红色群众作壮烈的抗拒。

这十五人中是二十人的少数的同志以终必被敌方所打败。

其余同志，他们明知有三倍群众也必受伤，因此不敢冒险。

这是谁都知道的统治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的祸国殃民，便是革命发生的唯一的原因。

在当今，虽然有着备德国民主民族的赤手空拳，但是却同；仔准备牺牲的大好头颅。

我国德国的青年在谈话的时候常常向他们说明他们所负使命的重大，并且再反复证明，假如人类的智慧要是没有武力来扶助保持，终必要陷入沦亡之途的。

温柔的和平女神，如是由武力来作后盾青年们听了我的话，没人不是动容的。

伟大的和平事业，必定要由武车来作后盾青年们听了我的话，没人不是动容的。

于是军事工程训练的观念对于他们觉得较有意味了他们都爱官僚，大家把军事训练看成成是一条畏途了。

我们且为看一下这班青年护勇敢的奋斗怎样！

他们像一群黄蜂，向着全场中的捣乱份子拼命猛卫，他们既不至少计较敌众，我寡，也不顾到伤害和流血的牺牲心里只是满怀着伟大的理想和神圣的使命，誓为我们的运动扫除障碍，一九二〇年的夏天，我党维持秩序的军队有些像样了，明年春在，依次再分成好几队，每一队分为几小队。因为我们的集合的活动一天一天的增多，增加保护的实质编制，实在是刻不容缓的。

我们组织起军队来维持去场的秩序，目的是在解决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

在那个时候。我党还没有党徽和党旗。

这种的标识缺乏了，这不不仅在当时是不便，就是将来也是不便的；因为既没有方法去表明党籍，而且将来我党的国际主义的党员斗争也没法来区别的。

我在幼年时代，曾由感情上去观察，知道这类的标记，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心理，所以就认为标记是十分重要的。

在大战以后，我曾参加过柏林皇宫前的马克思主义的民众示威运动。

一幅幅的红旗，一条条的红领巾，以及一朵朵的红花，在空气中自由飘荡显示了十二万参加大会的群众的声势。

我深切的知道这种伟大而庄严的气象，确有感动局外人的一种魔力。

在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政党，并没有世界的观念，所以并没有党旗。

因为他们的党是由一些“爱国份子”所组成的，所以他们就用帝国的国旅，黑白红三包的旧帝国的国旗，现在已被那些所谓“民族的小资产阶级”各政党采用为党旗。

德国的国旗，不足以作为我党的象征，因为他所代表的德国。在将来或许要受尽耻辱，被马克思主义所克服；而我党的运动，则在消灭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不该去沿用旧的德国的国旗。

现在虽然还有不少的德国人他们念及旧国旗的全盛时代，而且因为他们会在这国旗下作战，亲眼见别无数的生命死在这旗下，因此对之就和出了敬爱之心；可是照未来的奋斗来说，这旗是一无价值的。

这就是人们民族社会党认为旧国旗不能象征我们特殊的目的的唯一理由。

因为我们的志愿，并不在恢复污点很多的旧帝国，而是在建设一个有新精神的新国家。

我们现在所做的运动，既是本着这意思去和马克思主义斗。那么，党旗上自然应有代表新国家的象征。

我自己每想要保存旧旗的黑、白、红三色经过了多少次的试验以后，我便决定上最后形式：我党的党旗是在工党之中有一个白圆，圆中再画上一个黑色的卐字。

再经过了多少次详细研究。

便决定旗和圆间的适当比例，以及卐的形式和粗细；这旗一直沿用到现在，不曾有了更改。

不久维持秩序的军队，也就制成了同样的臂带一红地，白圆，中有黑卐字。

一九二〇的夏天，新党旗初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

经过了二年，吾党同志，已经有了几千了，于是组织人数人多的挺进队（*Sturmanbteilunb*）；这种为新世界奋斗的武力组织，应该有胜利的特殊的象征，一就是军旗。

在 那时候的慕尼黑，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外，不再其他的党能够像我党的书籍来举行大示威运动一民族主义派的政党，那是更不足道了。慕尼黑的景德酒店，可以容纳下五千人。每当我党集会的时候，拥挤不堪；所以我们常在找寻其他更大的场所。我们不曾集会的会堂，只有克罗纳戏院（*Circus Krone*）一处地方而已。

一九二一年一月底，德国人的心里大感到不安。因为巴黎和约，依伦敦最后通牒的方式迫我国承认，照此和约德国应付 赔款二千二百六十万万金马克。一天一天的过去，这个惊人的事件德国竟没有一个大的政党来加以注意，就是所谓民族主义各党的联合会，他们虽然没有示威的计划。可是也没有决定的日期。

二月一日，这天是星期二，我要求该会决定日期，可是，我的要求被延到星期三。我再询问这一天大会是不是举行，到底什么时候举行，给我的答复仍然是游移不定；不过说他们要邀集各团体在下星期三举行示威运动。

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是忍无可忍，所以决定自己起来负责领导示威运动，反对和约。在星期三中午，我就令人于十分钟之内写齐了标语，而且租定克罗纳戏院作为明天开会的会场。

在当时，这件事是一个惊人的冒险。因为在这样的一广大的会场之中，是否能够有相当的听众？我党的党员，能不能把这广大的会场填满？这确实是一个疑问；而且

大会还有受人破坏的忧虑。不过我确切知道，一如果这一次失败的话，那我党将灰的长期奋斗中也必陷于不利。

我们尽一天之内去把标语贴好，可是，不幸，星期四的早晨就降雨，我十分的担忧，担忧着听众决不愿冒雨前来赴会，而愿安居家中；且这一次的开会说不定要发生恶斗惨杀的暴动。

星期四那一天，我雇了运货汽车两辆完全围着红色，上面插了党旗；每一辆车上载着党员十五至二十人，满街驰骋散发传单，作为在晚上举行群众大会的宣传。

下篇 八、强者的独裁便成为最强者

一般的公民，他们听到各种劳工团体合组成工会。

努力团结避免分化的消息，他们必定是十分快慰的。

人人都深信这种的组合必定能够增加巨大的力量，而且以前弱小的团体，必定可以变为强大的团体。

可是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

有人宣布某种真理。说是解决某项的问题，提出某一种的目的，并创始某一种的运动。以求他的理想的实现。

一个社团或是一个政党的建立，便是这样的。

他从前的计划或是在革除以求他的理想的实现。

一个社团或是一个政党的建立，便是这样的。

他们的计划，或是在革除现存的罪恶或是在实现将来的新社会。

同一的目的而奋斗的，都应该参加这种运动，借此而增加他的实力，使他们共同的希望更为容易实现。

然而在事实上，恰好得到了相反的结果，这是有着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可以称之为悲惨的原因；第二种原因是基于人类的弱点可以称之为可怜的原因。

照普通的情形来说，世界上不论那种丰功伟业，大都是在实现众人所共有的宿愿。

这是各时代和各种大问题的特质，千千万万的人努力于解决这种问题，而且有些人还自认自己负此重任，完全是受着上天的使命。

于是在一群英豪大家互相争势的时候，惟有比较强壮比较勇敢的人，他能出人头地而获得最后的胜利，能够担当了这项巨大的任务。

所不幸的就是他们大家用了不同的方法。去达到共同的目的，他们只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各自照着自己的主张去做并不互相的帮助。

人类往往为了尝试的失败而得到教训，终于获得事业的成功。

这就是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们从历史中去研究要解决德国问题。有两条途径。

这两条途径的代表和战士，是奥地利普鲁士，也就哈布斯堡皇室和霍亨索伦皇室他们老早就应该合并为一，其余的小势力，应该各自依他们自己的意见去把团结力归附于甲方或是乙方。

这样最后胜利的一方面所采取的途径。自然是应该人人所遵守循的了。

不过，奥地利所用的方法。断不能造成德意志帝国。

总而言之，统一而又坚强的德意志帝国，这是全体德国人心目中所视为同室操戈最可怕的结果。

因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冠，并不像一般的人所说是从巴黎的围攻所得来的，实在是得之于寇尼希格莱兹（Koniggratz）的战场德意志帝国建树，并不是用协用力的主法去从事共同的志愿，实在是由于竭力争霸而斗争的结果；就是普鲁士是由争霸获得了最后胜利。

所以多数的人大家都超向于同一目的，这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不过我们从这些地方可以去认识出最坚强最敏捷，而且能够战胜一切的人。

第二种理由，不但是悲惨，并且是十分惋惜的。

这就由于嫉妒，贪婪、野心以及盗窃观念混合而成的人类的劣根性。

人类的重大事件，大都杂有这类的邪念，这是十分可欢的。

当一个新运动发生而且采取特殊的党纲的时候，就有许多人起来用这新运动的目的奋斗。

然而他们并不是真的忠心着去参加这个新运动而想获得优先权，实在是想乘机窃取党纲，以谋自己去另组新党。

一九一八年扯到一九一九年间，有不少以“民族主义者”自命的新团体和新政党。

这些团体和政党系自然的发展，不能归功于他们的创始人的。

到了最一九二〇年，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慢慢地团结为一个胜利的政党。

有几个某党的创始人，他们自知他们的运动没有什么成绩，因此就十分迅速的牺牲了他们的个别运动，无条件的归附于强有力的运动，这种行为，足以证明他是确实忠诚诉。

那连（Nurnberg）德国社会主义党（German Socialist Party）领袖唐留士。史特莱希（Julius streieher）他尤其是诚挚。

两个政党的目的的相同，但是不相依附而各自独立。

当史特莱希有一天确切地知道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实力和发展确是超过了德国社会主义党时候，他就停止了她的活动，使他的同志，大家和优胜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举行，实行合并而为共同的目的去奋斗。

这种果断的精神，深堪赞美，能够像他这样来干的。

实在是得难能可贵的。

我们所不应该忽视的，就是世间一切的丰功伟绩，必须靠自己个人的胜利，决不是靠群力和结合所能产生的。

由群力的结合而得到的成功，决不能长久，因为在开始的时候，已经就含有共日分化的种子，甚且前功尽弃的。

真正足以必变世界思想的伟大的革命，除掉由单独的力量所领导猛烈斗争而外，决不会有什么完成的希望的。

民族的国家的创造，断不是毅力薄弱的民族主义联合会所能济事的，只有具备金钱一般的坚决意志的单独运动，才能打倒其他的一切运动获得最后的胜利。

下篇 九、党卫队的意义和组织

旧德国国力所维持的柱石有三：就是君主行政机关和军队。

一九一八年的革命，把君主政体打倒了，把军队解散了，把政权委托给腐败的政党了。

国家的权威，因此就失掉了它的凭依。

然而这三颗柱石，常常是国家的权威所维持者的，也就是一切的权威的基础。

权威的第一要素固然是群众的一致拥护，可是，单单靠了群众来做基础，那权威仍旧是十分脆弱而不稳固的。

所以权威所必具的第二要素显然是武力了。

如果群众的一致拥护和武力两者相辅而行，那么，到了相当时候，基础便会致稳固，而成为仗的权威了。

如果群众不一致拥护、武力、以及传统的权威，三者合而为一，那这权威可以说永不会发生动摇了。

革命兴了起来，这种希望，便就成为绝望。

传统的权威已经消失。

旧帝国的崩溃，和旧帝国过去的光荣徵象的破毁，已经把传统的精神悍然打破，结果，是国家的权威，受到了一个极重大的打击。

就是支持国家权威的第二柱石—武力—也不再存在了。为了要希望完成革命，各领袖大都不惜把旧帝国中有组织的军队，来加以摧毁，把这残余的军队从事于革命的斗争。

这种动不动就要改变的乌合的军队，他们把军役看作寻常的八小时工作一样。

我们实在并不能希望他们来有助于国家的权威。

所以第二种保障权威的要素也就消灭了。

而实际上革命所赖以建立权威的，只是群众的一致拥护的第一种要素而已。

不论那一种民族，都可以分为三等；最上等的是具有各种的美德，并且有牺牲的勇气和决心的。最下等的是人类的败类，他们只知道自私纵欲自利，放佚淫侈。

在这两者中的是第三阶级，为数最多，他们既没有英勇的决心的牺牲精神，但也没有卑鄙的枉法的自私行为。

我们可以加以注意，就是这班群众——我一向称他们叫做中间阶级——从来不会变成重要，只有当最上等的和最下等的两者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始能显示出他们的重要来。

比方他们不管那一方面获得胜利，他们都望风而靡的去归附胜利的一方面。

如果有贤者来握权，他们固然安心相从；可是被小人专政，他们也绝不会反抗的；因为中间阶级，他们是绝不愿有斗争的。

在欧战告终时的情形大略是这样：国内多数的人民，因为迫于义务，已经有了相当数目的为国捐躯；一部份最优秀的国民，差不多全数牺牲了，只有那些卑鄙的下级国民，靠了荒谬的法律的保护，同时，他们又不遵从治军条例，所以反得偷生苟安。

我们的民族中安安稳稳留下来的败类于是起来革命了；因为一些优秀的国民，大半已经战死沙场，没有人再来对他们反抗了。

这班马克思主义的乱党，他们不能专门靠着群众的一致拥护来维持他们的权威。

然而，这一致拥护的权威是新共和国所急需的；因为他们不愿在短期的混乱之后就被我国硕果公存的优秀分子所组织成的讨伐军来扑灭。

具有革命思想和从事于革命的人，他们自然不能而且也不愿受军队的保护。

因为他们所愿望的并不在组织一个国家，而是在破坏现存的国家；他们这种思想正好乱成性的军队相吻合的。

他们的口号并不是德意志共和车间的“秩序”和建设，而是国家的“掠夺。”

在这时候，有大批的德国青年，他们出来说愿为“和平的秩序”效力，他们大家身上穿了军装，背了枪械戴了钢盔实行来抵抗蹂躏他们祖国的人。

他们在做义勇军的时候是憎恨革命，但是，他们为治安计，就不得不来维护革命，而使革命的基础筑固。

他们的行动，完全是出之他们的至诚的。

造成革命和暗中操纵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犹太人，他们对于当时的情势，早已估量得十分的正确。

他们知道德国，所以人使德国陷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流血惨剧，尚还没有到时候。

从前线归来的将士对这件事情怎样呢？德国的军人能不能容忍呢？这些都是疑问。

在那个时候，德国的革命，不得不有着十分缓和的表示。

因为要不是这样，那德国的革命，可以在几星期之中，被德国两三师的军队完全击破而消灭的。

在这时候，如果某师长和他的亲信军队决心扯下红旗来的话，那革命政府立刻可以置之死地，或是用枪弹压服任何的反抗，不到一个月，这一师的军队必定可以扩大而为六师。

这是在暗中操纵着犹太人所十分恐慌的。

革命的造成是由于乱徒的暴动的掠劫，那些近护和平秩序的人是不在内的。

革命的进展，是由于慢慢地和暴徒的意见相左，完全基于战略，不是他们所能了解，而且也不是合他们的脾胃的。

社会民主主义慢慢地得势，这种运动也就跟着慢慢地失去了他的激烈的革命性。

在大战还没有告终的时候，带有民众惰性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国防的障碍物了。

在他们党中极端活动的人物，脱离了该党而去组织成一种积极进攻的新阵线。

这种新组织就是为革命马克思主义作战的独立党（Independent Party）和斯巴达库斯团（Spanatacus Union）。不过，当德军从前线退回来的时候，每个军人都是虎视眈眈的，因此革命的进程，便又超于和缓了。

社会民主党的主体处在胜利的地位，独立党人斯巴达库斯团便就失掉了他们的势力。

这种变化，如果不是已经过了斗争，那绝不能这样的。

在这变局还不会实现以前显然有着两大壁土互相的针锋对峙，一是维护和平秩序的政党，一为流血恐怖的团体，小资产阶级。

自然是倾向于和平和秩序的政党方面。

结果，到底为了种种的原因，从前仇视共和国的人物，现在是不再做他们的仇敌了，而且帮助他们来征服共和国的敌人。

再进一步的结果，就从前拥护帝国的人物他们原想是要反抗新国家的。现在那也不必再来杞忧了。

如果我们在旧帝国的本身的种种缺点外，另外再去考虑革命成功的原因，那就可以得到了下列的结论：（一）因为革命把我们的责任心和服从观念完全弄掉了。

（二）因为当局的许多政党的怯懦无能。

第一种原因，就是因为我国的教育，是一种没有民族性而纯粹是国家教育的缘故。

因为从这种教育，去养成对于手段的目的的谬误观念。

责任心和服从观念以及实践，他的本身并不是目的（这等于国家的本身并不是目的，）实在是为扶助并保障社会生存的一种手段，用了这手段，去维持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一致的生活。

革命的成功就是因为我国的人民（还是说我国的政府）不能了解上述的许多观念真义，因而使这些观念变成为脆弱的空论。

关于第二种原因，小资产阶级的许多政党（可以说是旧帝国下仅有的政治组织），既是武力认国属于国家的，所以只有靠了文字的发挥他们的意见。

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十分错误的；因为敌党久已把这方法抛弃不用，公然喊着要尽量采用武力来达到政治目的的口号了。

小资产阶级的各政党，他们在没有的新制度妥协之前，他们的政纲还是靠在旧国家的事务上；然而他们的目的。

的确也愿意在可能的范围中，想在新环境中去占得一席的地位。

不过他们唯一的武器，还是和从前一样，靠着那空谈的文字而已。

在当时有能力而敢反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受马克思主义鼓动的群众的，最初当推“义勇团”（Free Corps）接着是各种自卫和民团（Einwohnerwehr）最后是传统的势力。

过去马克思主义获得成功，这是因为在他们动用政治的决心和暴力。

民族主义的德国所以终于完成他们的发展的希望。就是因国他们缺少暴力和政治野心的坚决合作的缘故。

民族主义的各党不论他们具有怎么样的政治野心。因为他们没有战斗的能力，所以不能凭了斗争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可是保守的民团是有此实力的，他们是巷战的能手，可是，他们缺乏了政治观念和目的，所以他们的力量，对于民族主义的德国，也没有什么利益的。

犹太人利用报纸的力量来宣传民团“非政治性”的观念。

倒颇获得在成功，恰好像他们政治的技能，往往宣传他们的斗争是“合于理智”的斗争。

缺乏伟大的新观念，常是缺乏战斗力的一种徵兆。

如果能够觉察深信改革后的新制度必定会获得胜利话，那么，对于武器的最残酷的，也必定会相信而有动用的权利是同样荒谬的。

一种运动如果不能去为了这种高尚的理想和目的而加以奋斗，那么必定不能坚持到底的。

法国革命，因为能够产生出一种伟大的新观念，因此他们就发现了成功的秘诀；俄国的革命也是这样的，法西斯主义是完全由理想去发生力量，他们的理想，在使整个的民族复兴，结果是为他们的民族造福不浅。

国防军的组织统一以后，马克思主义也慢慢地获了他们的权威所必需的力量，于是就以不必要的口实，去解散那似乎带有危险性的民族主义的民团，这是势所必然的。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创立是一种新运动的象征，他的目的。并不是小资产阶级正气党的死守着旧状态，恢复一切的旧观念，而是在建设起一种新的有生气的民族国家，去替代这时候的无意义的机械的国家。

这种新兴的运动，因为确信他的新主义有着极端的重要，所以认为如果能够达到目的，就不惜任何重大的牺牲。

在世界史上常有这样的事情：大概据一种世界观而引起的恐怖时期，往往不是政府的权威所能破坏的；但是，这恐怖时期，常为一种新的世界观（也同样有着勇敢而决心的）所屈服。

固然处在政府的地位以维护国家，或者不免要对此稍感不快，可是事实是不容抹杀的。

我国家正被马克思主义所蹂躏着，我们的当局者，既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无条件的投降了马克思主义，此后他断不能突然起来把乱戡平反过来，高踞阁席的资产阶级的许多傀儡，他们只是说着空话，而说“工人”不可反抗，足见他们谈论到“工人”的时候，便就联想到马克思主义了。

下篇 十、虚伪的联邦主义

一九一九年的冬天尤其是在一九二〇年春夏雨季，我党对于在大战时已经超于严重的问题不得不来采取一种态度。

这在本书上编中已经照我所见到的德国崩溃的征兆，大略的述过了，而尤其是对英法的指使的扩大南北德意志间踢有裂痕的宣传计划特别的加以注意。

一九一五年的春天煽动反对普鲁士的报纸出现了，它们认普鲁士是大战唯一的祸魁。

到了一九一六年，这些狡猾的无耻的宣传手段已经酝酿成熟，他们不惜利用人类的最卑劣的本性，来鼓动南德意志反对北德意志。

不久，他们的煽动就发生了结果，政府和军事当局（尤其是巴维利亚的军事当局）实在不能负担相当的责任；因为他们对于这种卑劣的宣传，竟是看它孳长起来，优游养奸，不能立即用断然的手段去防祸于未发之先。

他们反而竟像是不留痛痒的，不知道这种宣传，不但有碍于德男民族的疑统一，并且还助长了联邦的势力呢！从有史以来因为疏忽得到的惩罚，从来不会有比这更甚的。

从此普鲁士就一蹶不振，危害到整个德国，而促其崩溃这不独在德国有着亡国的痛苦，各邦也同归于尽了。

在当时柏林的市间，对于普鲁士的痛绝，恨达于极点，这种恶劣的空气完全是受人怂恿而激成的，他们对后皇室的反抗，实为革命的出发点。

但是如果说，人民对普鲁士的反感纯粹是为敌方的宣传而致的，那也不尽然。

因为我国战时的经济组织骗取全国的财力，完全集中于柏林这种荒谬的制度，就是市民对普鲁士发生反感的主要原因。

狡黠的犹太人，他们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借了战争团体的美名，去从事无耻的掠夺，而使日耳曼民族受到危害，那必定会遭到反对。

但是当日耳曼民族没有受到攻击的特候，他们一些也不惊恐。

因为战争对他们并不有什么损害。

于犹太人遂生出一计，要使挺而走险的群众对他们起反抗，不如激动他们的愤怒，而使他们自己去胡闹。

以后革命注爆发了。

国际主义的犹太人柯尔特。

爱斯纳尔他刚开始挑拨巴维利亚来反对普鲁士。

他的所以这这样的处心积虑，使革命运动在利维早亚发动，使巴维利亚的民众去反对国内其他各地，这并不是他们的民众为巴维利亚打算，实在他们是完全盲目有受着犹太人的指使。

犹太人利用巴维利亚人民固有的天性和嫉忌，以之来使德国倾覆。

如果德国一朝倾覆了，那么，德国受布尔雪维克主义的鱼肉，自然是毫不困难的。

共产党的煽动者，他们说委员制共和国（**Republics KfCommittees**）如果因了反抗军的进展而受到倾覆，那就好像是反对普鲁士和反军国主义的组织，被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所克服了是一样的。

他们这样的宣传诡计竟得到绝大的成效，当巴维利亚立法议会选举的时候，爱斯纳尔在慕尼黑所有的当党徒不到一万人，共产党也不到三千人，到地委员制共和国倾覆以后，这两党连合在一起，所有的党徒，竟增加到十万左右。

我觉得我所做的事，从有生以为最不能得到人家的同情的，要算是反抗这种反帝普鲁士运动了。

委员制的时代慕尼黑举行第一次的民众大会，在那进会场中对于德国其他部分的嫉恨，真像疯狂了一般，尤其是对普鲁士为最厉害。

那里如果有一个北德意志人参与会议那说不定就有了性命的危险。

这种示威运动，在将中散会的时候，常常狂呼“脱离普鲁士”“打到普鲁士”

“和普鲁士宣战”——在德国国会中有一维护维利亚主权的出色人物，他竟高声狂呼“情愿死了做巴维利亚的鬼，不愿生着去做普鲁士人。”这真可说是一针见血的话了。

我所干的奋斗起初只是我一个人，后来才得欧战时许多同志的帮助，我敢办现在荒谬叛乱的结合，所以终归消灭的原因，实在是全靠着我们巴维利亚的同志的力量。

反对普鲁士和联邦主义是毫无关系的，联邦运动，他的目的如果只是在破坏或解散另一邦那是十分不当的。

一个真正的联邦主义者，他既不把毕士所说的帝国观念作为空口说白话，那么，对于他所惨淡经营的普鲁士自然不应该存有分割的想法，因为普鲁士是毕士所开创和成的地方。

尤其不可解的，就是这等所谓联邦主义者了挑战在对付普鲁士，而普鲁士和十一月革命是毫不相涉的。

他们的攻击指责，并不是对手创威玛宪法（**swelmar Coustitution**）的人而发的，（而那些制宪的人，以南德意志和犹太人为最多）是对富于保守性的旧普鲁士的代表而发的。

这班代表和威玛宪法正相反对。

他们所以小心谨慎，惟恐触犯了犹太人，那是毫不足怪的。

但是个中的谜团，或者竟因此而得到了明白。

犹太人的目的，便是在使德国国内的民族互相斗争——使保守的巴维利亚人，去反对保守的普鲁士人，而他们便可以因此而获得了成功。

一九一八年冬天，在德国各地，反犹太人运动慢慢地举起来了，犹太人还是用着他们的老法子，以敏捷的手腕去挑拨群众连动，使群众间有了一个新裂痕，使他们反对犹太人运动势力分散了开来。

在当时，足以引起公众注意而不使犹太人成为有失之的，就是犹太人提出天主教皇全权（**Ultramontan**）的问题，以及由这问题而生出提新旧教种种的争论。

那个提出这问题来祸我民族的人，真是罪恶可赦。

犹太人目的已经达到了，眼见着旧教徒和新旧教徒的互相争斗，他们很是快意，亚利安族和基督教的敌人没有不在旁边窃窃私笑。

这两派的基督教，他们眼看着上帝所赐给人类的宝贵而优越的生存，横遭这种不幸的玷污和摧毁，竟是毫不介意。

要知道世界的将来。重要点并不是在新旧教徒的谁胜谁败。而是在亚利安人的生存和灭亡。

到了现在，两派还是照旧的斗争，他们不去反抗那灭亡亚利安族的敌人，而只是一味的自相残杀。

在德国，不许反对教皇全权的主义或牧师全权主义，但是，在其他各个纯粹旧教国，倒是可以的。

因此，德国如有反对运动，新教徒必定是参加的。

旧教徒在别国可以防卫他们的领袖去对抗政治上的攻上，但是在德国，那种防卫便成为新旧两教的争斗。

其他一切都有事实在证明，用不到来加以诠释的。

一九二四年，忽然有人认识了民族运动的主要使命，就是在反对“教后全权主义”、可是，他们不但不能推翻了“教皇全权主义，”反而去使民族动发生了分袭。

因此，我必须要求警告民族运动中的幼稚轻浮分子；请不要去梦想能够做了毕士所不能做的。

不论什么企图凡是足以使我们的运动卷进这种漩涡的，都要加以坚决的反对，并且从我们的队伍之中，去摈弃从事于这种宣传的人。

这两件是领导民族社会运动者的主要任务，一九二三年秋天。我们在这一方面实在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热烈的新教徒和热烈的旧教徒，他们在我们的队伍中大家都能安无事，对于宗教的信仰，毫没有良心上冲突。

德国究竟成国联邦政府好呢，还是成为单一政府好呢？

什么叫联邦政府呢？

所谓联邦政府，就是多数自主国的集合体，根据了各邦的主权而自动结合的，至于保障联邦政府生存所需要主权，那就是各邦所让给联邦政府的。

现在全世界所有的联邦政府，在事实都和这种理论的方式不合的。尤其是美合众国更甚；因为亚美利加合众国并不是成之力各州，实在是各州都由合众国所造成的。

各州所享的大权，不仅是适合联邦的特质，而和各州所占面积的广度也相称的。

所以当我们谈到亚美利加各邦的时候，不能说他们享有国家的主权，不过享有宪法规定所保障的权利，或者反这种权种称之为特权。

上面的理论。对于德国并不完全相合，因为德国各邦，原本独立，帝国就是由各个独立邦所组成的。

可是；帝国的组成并不完全是出于各邦自愿的平等合作；乃是因为其中的普鲁士，对于他各邦握有霸权的缘故。

德国各邦的领域，大小并不一样，不能去和亚美利加合众国相比；各邦既是大小并不一样，那么对于帝国的缔造和联邦的构成，能为力而有所贡献的，也互有关异的。

所以代们不能说各邦多数都享受到真正的主权的。

各邦为成就帝国的主权而去牺牲自己的主权，他们大都不是出之于自愿的。

在实际上，大都本没有主权的存在。或者，因为他们的主权在普鲁士压之下都已经丧失了。

毕士麦所走的原则并不是去各小剥削而使之归于帝国，不过看帝国的绝对需要而取之于各邦的。

但是，读者诸君，请不要发生误会，毕士麦也不在使帝国立刻得到国家永久所需要的一切权利，而是在把一进难于取得留着将来慢慢地再去取得。

这是事实上牺牲了邦权而使国权一天一天的增长。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毕士麦所希望的也就进步的完成了，德国的崩溃以及专制政体的颠覆，自然更是促进最这种制度的发展。

国家的联邦性质，因此而受到了一个重大的打击，同时又因接受和约的义力，所以所受的打击更见得重大了。

国家自从战败后，必须履行兵费赔偿的义务，因此各邦就失掉了他们的财政管理权而统归之于国家，这是十分明显的事；但是，虽单就靠各邦的输将，那是绝不能清偿了这种债务的。

因此，国家就进一步而决定收取钱路、邮政，这是我民族在和约的钳制下所必真诚的步骤。

毕士麦的帝国是自由而没有束缚的，它不受财政上债务的压迫，恰恰还像现在德国所受遭威斯（Dawes）计划的压迫是一样的。

当时的国用，只是限于一些国内绝对所需要的事项，所以刁；必要财政上的优越权，各邦的纳税，已经足够国用。

因为各邦的纳税既少，而且又能各自享受主权，所以他就甘心乐为帝国的属邦了。

但是，如果说现在在各邦的不满意，那是因为受国家财政的束缚，这也不是确切的言论，而且和事实完全不符。

各邦所以不满意于帝国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主权失掉的缘故，那是为了现在的帝国的政治组织，不足以来代表日耳曼民族的缘故。

下篇 十一、宣传和组织

宣传必须在进行在组织的前面，而且须广征人材，作为组织的成立基础。

我常常恨那草率和迂拘的组织，因为他们所得的结果，大都是黯然没有生气的。

为了这缘故，我们如果采取宣传方法从一个中心点去广播某一种的观念，然后再就所得的人材当中，就审慎的去选择领袖人物那是最要紧的。

常有一种人，初看像是毫无显著的才能，岂知后来竟是卓越的领袖人物。

大家都以为领袖所必须具备特质和能力，就是理论上有丰富的知识，那是大误而特误的：因为在事实上往往是适得其反的。

大理论家就是大领袖的才具——自然，这种才具，自然不是纯用科学方法去研究问题的入所乐闻的。

煽动家虽然不过是一个黠的政客：可是他既是某种观念传播给民众，可见他必定是一们心理学家。

如果叫他来做领袖，那必定较不通人情的理论家为优。

所以讲到领袖的才能，就是指能够鼓动群众的才能而言。

理想爱和领导群众的能力是截然的两件事。

假使一个人一身能够具备理论家、组织家和领袖的本领，这真是了不得的伟大人物了；然而这究竟是世界上少有的事。

前面我已经说过当我党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对于宣传这一点我们就加以十分的注意的。宣传的使命，就是在使一小部分的中心人物，能够接受新主义，俾造就将来组织的时候所必需的分子。

在这过程中，宣传的目的，实在比组织的目的更重要。

宣传工作，就是在孜孜不倦的为自己的主义去招致信徒，而组织的目的，就是使信徒之中最优秀的分子成忠实为党员。

至于信徒们办事的效能怎样，才干怎样，智力怎样，人格又是怎样，这都不是宣传的本身所应该去顾虑的；因为宣传的目的，就是在招致信徒，至于在众人中去慎选干员，俾能推进运动，而使主义能够到达成功之路那实在是组织方面的工作。

宣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替未来的组织设法罗致人才；而组织的第二个任务，那就是争取权力，俾希望达到新主义的最后胜利。

组织方面的任务，就是在注意党员不因内部的不和而起分裂，致使运动的工作，因而陷于衰弱地步，还须注意于奋斗的精神，不致萎靡，能够再接再厉臻强固为了要达到这种目的，所以要注意着不应该去滥招党员。

因为人类中只在少数的有具有毅力和胆量；所以如果一种运动的党员，要是漫限制的招收。

那么这个运动终有衰败的一目的。

如果单单是为自卫计，那么，一种运动而要想维持着它的胜利，就得要限制党员的人数；就是以后想扩大组织，也要单详加考察，审慎出之。

惟其是如此，那才能使这运动的干部时时更新，时时健全。

干部必须要握着指挥运动的全权——换句话说就是决定宣传的内容，以便博得世人的赞同，总揽一切的权力，进得着一切的工作，以谋理想的能够达于实现。

我主持党中的宣传事务，那时非常小心的，而且不但要替将来的伟大运动留下发展的余地，还宣传着最激烈的原则，去吸引那些最优良的分子来加入我党。

我的宣传越是激烈惊人，那么，那些性格怯弱而信仰不坚的人越是生着畏避的心而不敢来侵入我们组织的干部，这些都是有益于我党的。

当时我采用强有力的方式，来用作我党的宣传，使我党的运动日趋于激进；从此以后，凡是加入我党的人，便多是激进的人。

这种宣传不久就有了成效，有几十万的人数，不但深信我们是对的，而且极希望我常能够得到胜利，因为他们是怯懦而不敢牺牲的。

直到一九二一年，这种吸收同志的工作还是不错，而且对于我党的运动虽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不过这一年的夏天，由某种事件显示了我党的组织不及我党的宣传，于是是宣传的成效，也就日见显著了。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党员大会选出一个委员来指导我党的运动。

根滑稽，这一个委员会竟采取我党所极端反对议会制度。

我不愿附和这样笨的办法。

不久，我不再去出席于委员会了。

我只有为我自己作宣传，不问其他的一切。

我不听任何无知者的劝诱而改变方针，同时不去干涉他人的分内事务。

等到新章程一经采用，我就被任选为党中的总理，因此我便取得了必要的威权及附带的权利，这种愚笨的办法也就立即废止。

用实行专责的原理，去代替委员的合议制。

总理是负责指挥这个运动的全责的。

日子长久了，大家就公认这种原理是合乎自然的，至少在党的统治上该是这样。

委员会只有空谈而毫无一些成绩，所以如果把它来解散最好使他们去从事实际工作。

眼看着他们一声不响的离职，以后不知到那里去了，不禁要令人笑起来。

因了这事使我想念到同样的大制度，那是国会（**Reichstag**）。

如果叫那些坐谈的议员去担任实际工作，尤其是要他们各人对于工作须负责任的时候，他们必定会迅速的鸟兽散了。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民族观察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由我们来接办了。

这个报纸，我们从名字上就可以知道对于人民的意见是多所爱护的，现在变为民族的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机关报了，每星期刊行两次，到了一九二三年的春天改为日报，又到了是年的八月底，于是便扩展而成为所共和的大张的形式。

民族观察报是一种“民族”的机关报，它有着长处，自然也有它的谬误和弱点。

它的内容虽然不错，然而它不能作为商业经营。

原想此报由众人来定阅，以报费来维持生命的，可是它不知道和他报去竞争，以谋自己的生存，徒然用爱国的人们的一些报费去弥补营业不良的损失，而且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不当。

我看到这种危机，于是颇费苦心去极谋救济。

在一九一四年大战的时候，我曾认识了马克思·阿曼（**Max Amann**），他现在在本党中提任着事务主任，一九二一年夏季的某一日，我偶然到了这位军队中的老友，我便请他担任党中的事务主任，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优缺，所以迟疑了好久，才开始答允。

可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不愿意被庸碌的委员会所牵制，而愿意对唯一的领袖负责。

结果他挑选了几个人去任报馆的编辑。

这几个人以前曾隶属天马维利亚人民党的；但是，依他们的工作成绩而论，那是极能胜任的。

这种试验，成效显著这就是因为本党以忠诚坦白的态度去赏识人才；所以能够使职员心悦诚服，比较往日所收的效能尤为迅速而稳固。

以后他们便成为良好的民族社会党员了。

非特他们的言论是这样，而且还能见之于实行。

他们在吾党新运动中所做的工作，都很切实坚定，而出于至诚的。

在两年当中，我的见解慢慢他获得了实现，至小就最高的领导机关而言，我的见解，在现在党中已经成为极自然的事了。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的事件，足以证明这种制度已经获得了成效，当吾在四年前加入这运动时候，那时党中还没有一颗橡皮图章。

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吾党遭到解散，财产都被没收，一切贵重的物品，以及报纸所值总数已超出十七万金马克了。

下篇 十二、工会问题

我党运动的迅速发展，使我们不得不于一九二二年采取一种态度，来对付某一个问题，这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

我们会竭力的去研究一种最敏捷而最易的方法，使运动深入到群众的心里，但是常常会碰到一种阻力，如果永远和我们的意见相反，而工人政治组织，也操在他们的手中，那么，工人决不会完全永远来归附我们的。

在本分的上编中，我已经论及工会的性质、目的、以及工会的重要。

照我的意思，如果不是用国家有政策（这种政策也是常常没有结果的。）或是教育上的新思想，使雇主对工人的态度，稍微有些改变，那么工人除了从经济生活中的平等权利上着应，去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我继续说着，如果是因为这缘故，而无法防止一切常，使社会生活以重大损害的不平，那么这种保护行为，实在是有害于整个民族社会的。

我又说，在雇主中，如果还有不知道实社会的义务，甚至不知道人类基本的权利的。

那么工会当然是有着它的必要的。

依目前的事态来观察，我深信工会决没有可以废除的。

实在，工会在民族的经济生活中，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

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是在替人民实现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确信将来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当中，每一个制度，必定要把这种运动的本身作为根基。

如果说握到了权力，就可以实行无论怎样的改革，既不心有什么的运动来作为基础，也不须去征求对于这种运动素有训练的人才，那么，这是一种十分谬误的见解。

在这里，就明了一个原则，就是精神往往重于形式。

因为形式的创造是十分快速的。

决没有一个能够在他的文件中去取出一张新的审法草案来，并且再希望能够凭藉了一张最高机关的命令，就可以“施行”的。

这一种的草案虽然可以试验，然而决能久存，差不多和流产没有什么两样的。

我记得威玛法在产生的时候，有人想用一种新宪法和新国旗来对德国的民族作欺骗，在过去的半世纪中，这种宪法和新国旗，大都对我民族是毫无关系的。

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应该避免这种试验，因为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应该从长期的运用组织中产生出来的。

所以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应该自己有一种工会的组织，而且必须认识这种组织的需要。

民族社会主义的工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的任务？什么是工会的目的？

民族社会主义的工会，并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是代表工人的机关。

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不知道有阶级，不过从政治方面看来，有一种叫做公民，而公民是具有绝对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的。

除了公民之外，还有一种叫庶民，庶民是绝没有政治上的权利的。

工会制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阶级斗争，可是马克思主义硬要叫它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首先创设这种经济的武器。

而国际主义的犹太人，就来用破坏自由独立的国的经济基础，毁灭这种民族的工商业，而经营他们自己的工商业。

他们的目的。

是要使民族去做那不分国界的犹太人所操纵的金融界的奴隶。

民族社会主义工会，并不是主持能工当作破坏民族生产的工具的，而在增加生产，使物品能够畅销，他的方法是在打倒一切的弊端；因为这种弊端是含有反社会的性质，并且阻碍经济和全民族生活的效率的。

民族经济的繁荣，就是本身的物质上的幸福，这是民族社会主义的工人，应该知道的。

民族社会主义的雇主，也应该知道工人的幸福，和快乐，就是他的大企业存在和发展所必要的要件。

民族社会主义的工会，并不能和他种的工会并存，因为民族社会主义的工会，必须认识它自己的任务的普遍性和由这种任务所产生的义务，不被其它组织所阻碍，并且还须发展它自己的特色。

它不能和他种同类组织人妥协，而且还须保持绝对独立的权利。

在过去，曾有不少的反对我们独立行创立工会的议论，但是到了现在，还是一样。

我不愿考虑各种必要失败的试验。

像从工人血汗所得的工资当中，去提取一部分用以来维持工会，而这工会，又是未必一定有利于他们会员的，所以我必定认这一点是不对的。

在一九二二我们的行动，就是根据了这种意见的，其他的人士，在表面也像是有着过人的见识，大家去着手创办工会。

可是没有多少时候，他们便烟消云散，结果和我们一样。

所不同的就是我们以前既不欺人，也不自欺而已。

下篇 十三、德国在大战的联盟政策

在日耳曼帝国时代，外交政策既是变换不定，便是同盟政策也产没有遵照了适当的原则。

在革命以后，这种情形，不但没有改过，而且不愈弄愈糟。

譬如在战前，政治思想的混乱，便是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那么在战后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便是缺乏诚意了。

因为凭藉革命的手段去从事于破坏运动的政党，势必对于以复兴德国为目的的同盟政策是不放在眼中的，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

当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还在一个不出名的小团体的时候，多数的同志，对于外交政策上的问题，大都抱着一种漠然的态度。

因为我们要争取对外的自由，主要的前提之一，就是在首先要除掉我们所以溃败的原因，并且还须扑灭从中渔利的敌人。

不过，我们这个不重要的小团体，到扩张活动的范围，成为大团体的重要地位时候，就须急于注意外交政策的发展。

在这时候，我们必须决定各种进行的原则，而这种原则，不但应该违反我们的基本观念，而且把这种基本观念，应该切实的表现出来。

关于这问题，我们在研究时所抱有的基本观念，就是认定外交政策是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

这种目的，纯粹是鼓励我们的民族性。

凡是属外交政策的建议，不得不要经过了下面的考虑，就是这种建议，在现在或是将来是否有助于我民族，或是有害于我民族的？

还有。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民族和国家，如果要想恢复失地，常把恢复祖国的政权和独立作为最急要的问题。

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把所失领地的利益和祖国重获自由的利益来两相比较，那是断然的应该轻视前者。

因为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领地，它的被压迫和被割裂部分的解放，决不能由被压迫的人民的抗议就可以实现的。必须凭藉着祖国所残余的实力所实现的。

仅有激烈的空口的抗议，而没有准备斗争的武器，决不能使被压迫而失掉的土地重归祖国。

凡是一个民族的领袖，他在对内的政策上，固在训练这种的武器为任务：就是在对外的政策上，也须把进行这种训练工作为目的，并且还须征求同志。

我在本书的上编中，已经说过，在大战之前，我国的同盟政策并不彻底。

我国的政治领袖不在欧洲的内部去实行妥善的领地政策，反而喜欢去采取殖民地和商来的政策。

他们以为这样便可避免武力的冲突，岂知这是十分谬误的；因为这种计划贪多务得，所以他的结果自必弄得一败涂地，世界战争，便是德意志帝国领导不良而所得的报应。

因为在当时最适当的政策，便是在欧洲取得新的领土，使帝国在大陆上的势力能够坚强固。

可惜为了我从前的议员，愚昧无知，不注意于准备战斗的策略，立刻就把在欧洲取得土地的计划完全放弃。

再因他们采取殖民地和商业政策，因此便抛弃了和英国的同盟（在当时和英国盟确是可能的事。）同时他们又不去取得俄国的帮助。

如果依当时势力而论，我国确是应该取得俄国的帮助的。

到底，他们是陷入于世界大战，众叛亲离；而不离弃他们的，也只有那不幸的哈布斯堡王朝（Habsbuty Dynasty）而已。

在英国外交政策的历史的超势从依利沙白女皇树立了先声，用各种可能的手段，来制止欧洲强盛的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就是用武力来解决。

在德国方面能够和这种政策比美的，也只有普鲁士军队的传统的精神。

英国为要达到这个目的，随了形势和他所负的任务而异其所用的手段，不过，他的志愿和决心是常常一致的。

当北美殖民地独立的时候，曾经按照当时的情形，竭力向欧洲方面去寻一个真确对它帮助的伴侣，所以从西班牙、荷兰丧失了强国的地位以后，英国就集中了力量，去对付法国的新兴势力，一直到最后的拿破仑失败为止。

英国人向来是惧怕法国用军力来危害英国的，到了现在，便什么都不怕了。

英国用来对付德国的政治方针进行得十分的缓慢。这是因为德国内部不统一的缘故，所以对于英国也并没有显著的威力，可是在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一七年左右，英国已经采取了他们的新态度了。

美国占了世界经济上重要地位，俄国的发展而成为强国，这虽鲁英国踌躇一时，但是德国不能利用这种机会，那是十分不幸的。

结果竟使英国向来的政治方针愈形稳定。

英国把德国看作是一千强国，然而因为德国极端工业化的结果，造成了商业中的优势，因此在世界政治上也占取了优势，于是就变成了一个极在的威力。

用“和平侵略”的手，去征服世界。这是我国政治家自以为是无上的妙计，而英国的政治家就来利用了这一句话，作国组织抵抗的根据。

事实上，他们抵抗的形式，确是一种组织完备的进攻，这是完全对英国的政治方针符合的；因为英国政治方针的目的，本来不在维持这可疑的世界和平，而是在树立英国的世界霸权，因此凡是在军事上可以利用的国家，英国便引为同盟，这既合天英国传统的见解，同时又可以随时估计敌人的实力；而且是合于英国明了他自己本身的弱点。

英国这种措施自然不能称之为“毫无顾忌”，因为能够对战争准备到这样的周到，不应该拿勇敢来作为标准而加以评判，必须看他能不能适应机宜。

外交的任务，在必须注意于一个民族不为好勇寡谋，而受到失败，须得依了实际情形，去设法维持他的民族，能够达到这目的，便是正当的途径，如果不去照这途径走那显然是一种罪过，对于外交疏忽的责任，这是逃避不掉的。

德国的革命起来了，英国在政略上不再怕德国行将有可配世界的威权了。

可是如果德国在欧洲的地图，完全消灭了，这对于英国也是没有利益的。

反之，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可怕的政变，使英国外交对象，又改变了一个方向。

欧洲的新形势是德国变成衰败，法国在政治上变为最强的国家。

所以德国丧失了在大路上强国的资格，适恰好使英国的敌人有利而已。

不过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到明年的夏天，英国的外交，还是没有改变了他的态并，因噤在长期的战争中，英国的外交，利用群众心里的力量，比较从前是更厉害了。

此外，英国为了要防止法国的势力不致过于强大，他的唯一的可能的政策，便是去干涉法国的劫掠的野心。

在实际情形，英国并没有达到了参战的目的，因为欧洲已产生一个强国，这个强国的势力，竟是超出大陆国家的。

实力的比率，对于过种事实，英国竟没法来加以防止；而且实际上这强国是已经确立了。

现在法国的地位真是无法比拟的。

就军事上来说，他是首屈一指的强国，在大陆方面并没有什么劲敌；而且邻近西班牙意大利等外的边境也很安全；又因德国已经陷入衰弱无能，所以也毋庸去加以防御，他的绵延的海岸，正斜对着英国命脉。

维持欧洲各国的均势，这是英国的一种原因。

因英国如果想握有世界的霸权，这种均势实在是必要的条件。防止德国变成一个巩固的强国，去维持着德国内部各小邦的均势而没有统一的政府，这是法国的一种宿愿。他要把莱因河的左岸占领，就是要保持欧洲霸权的一种铁证。

所以法国的外交的最大目的，和英国的政治手腕的超势是永远卫突的。

凡是英美三国的政治家，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亲德的。

因为英国的政治家，必定以英吉利的利益为前提；美国的政治家，必定以美利坚的利益为前提，不用说得，意大利人自然也准备促进爱护意大利的政策。

所以，凡是相信他国的政治家的亲德论调而希望和异国去缔盟的，这种人不是愚人，便是妄人。

为在要达到实际的目的起见，我们必须答复下列的各个问题：从德国的中欧完全灭亡之后。试问有那一个国家不因法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已经独霸权而发生了动摇？又有那一个国家为因自己本身的生存条件和向来的传统政策而认这种的发展是他的未来的威胁的？

我们必须绝对的认清，法国和德国是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

法国对外政策的关键，是想永久的占领着莱因河一带的土地，并且想靠德国的衰替，去保障他们领土地的安全。

英国只不愿使德国做一个世界的强国。

而法国竟绝对不愿意德国做一个强国，这是两国的根本不同点。

我们现在的奋斗并不是在争取世界强国的地位，而是在为我国的生存，我民族的统一，子孙为面包而奋斗。

照这样看起来。只有英国和意大利可以做我们的同盟国。

英国极不愿法国的军力没有限制的发展，因为这是有害于英国利益的。

所以法国在军事上的优势，正是大不列颠最痛心的事。

意大利也不愿法国在欧洲的地位一天一天的强盛。

因为意大利的前途，在领土方面只有靠地中海沿岸发展。

他的参加世界大战的动机，并不想增加法国的势力，而是断然的给亚得里亚海（Adriatic）上的劲敌以一个致命的打击。

在欧洲大陆方面法国的实力一步一步的增加，这就是意大利未来的障碍。

如果说法民族相同就可以消除敌意。

那意大利并不会有了这种自欺的梦想。

我们审慎的加以考虑，知道英意两国的自然利益，和德国民族生存的必要条件是极少冲突的，而且在某种的限度内，不是有着互相的利害。

照德国现在的情形来说，还有肯和德国联盟的吗？我们可以说“没有。”不论那一个国家，如果要对自己的尊严看重的话，并且希望由联盟所得的利益，较多余贪污的政客所骗取的小利，那是决不愿意和现状下的德国来联盟的。

因为我国没有资格去和人家联盟，所以无怪那些行同匪寇的敌国要联合一致了。

如果德国更要再衰落的话，虽然英国的政策并没有什么利益，但是对那总揽国际金融的犹太人是有着大利的。

这是因为垄断金融的犹太民族，显然是和英国的见解相反，他们不仅希望德国在经济上永远衰落，而且还希望德国在政治上完全成为奴隶。

因了这缘故，犹太人便竭力听提倡灭亡德国。

犹太人的用意，那是十分明显的，就是想要德国赤化。

下篇 十四、东方政策

我国的那些所谓的知识阶级，他们贸然改变了我国的外交政策，使它不能真切的来代表我民族的利益，俾他们狂妄的理论得到好处。

我十分在感觉到我必须向诸同志郑重地谈论一下外交政策上的重要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俄国的关系。

因为这问题是人人所应该明了，而且是本书篇幅所许可的。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它的任务是在使他们民族的繁殖，和他们土地的大小，能够有一种自然和适当比例，而保障种族的生存。

能够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的，唯有地球充分的空间。

德意志的民族，只有靠了这种方法，才能保障了他是世界的强国。

在世界史上，我国民族的利益已经占有了重要的地位有千年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自己可以来做证明的。

因为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大战实在是德国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竞争，我们对这战争叫做世界大战。

在那时候，德国的表面是一个世界强国。

我所以称之为“表面”，就是因为实际并不是一个世界强国。

如果德国的土地和人数能够合于上述的比例，那么，德国确实是一个世界的强国了，倘使把其他的种种因素一概置之不论，那么，欧战的最后胜利，就是当属于我们的。

现在的德国并不是一个强国了。

从领土上看来，德国的疆域，和那世界列强相较，那真是小得很我们不必用英国来作例，因为英国实际上只是不列颠世界帝国的一大都会，但是不列颠世界帝国所辖的领土，差不多占了地球的四分之一。

我们必须再看看其他的各大国，像美国、俄国和中国。

这几个国家所拥有的领土，都是十倍于现要的德国。

就以法兰西而论，也应该列入这等国家中。

法国常常使国内的有色人种加入军队。

如果这样的再过了三百年，那么，法兰西血统，势必完全消失于欧非两人种所造成的国家中，他所拥有的广大的领土，将会从莱因河一直扩充到非洲的刚果河（Congo）他的种族，也就越来越复杂了。

这就是法国的殖民政策所以和德国以前的殖民政策的不同的地方。

我国以前殖民政策，既不能扩张日耳曼民族的领土，又不敢大胆的靠了黑种人的血统来增强帝国的实力。

德属东非洲的亚斯加力（Askari）士兵虽然略有这种的倾向。可是这种士兵，仅能保卫殖民地的本身而已。

我们不能去和世界其他各大国来比较，我们已经不再享有怎样的地位。

这是不得不归咎于我国外交政策的谬误，因为在外交上缺了传统的政策，丧失了族所赖以维持的一切健全的本能和策励。

这种种的错误，必须用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来给以补救。

我国的人口和疆域不相称的情形——疆域是财富的来源，又是政力量的基础——以及我国过去的历史和现在衰弱无望的情形，应该从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来设法除去或调济的。

德国政策是最大的成功，便是我普鲁士邦的组织，以及从这一个组织所养成的国家观念，同时使德国军队的组织，也能够适合了现代化的需要。

因为从个人自卫的观念变成民族自卫的观念，这种改变的思想，实在是从普鲁士邦的组织呼它的新原则而来的。

因为日耳曼民族的个人主义过分的发达了。因之人心涣散，只有在经过了普鲁士军队的组织，才成为有训练的民族而且使民经丧失了组织能力稍稍得到恢复。

凡是其他各民族在努力进得统一的时候所需要的精神，我民族都已经靠了军事训练而获得了。

因了这缘故，对于废除一般的兵役的任务，——这件事对于其它的民族或者不关什么轻重——实在和我们的生死相关。

如果我们德国人有了十世不受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由他们去受本性上涣散的恶影响，那么，我民族在地球早将不会再有独立生存的余地了。

这样日耳曼民族只有在异族的旗帜下而苟延残喘，对于文化贡献，这种精神恐怕是不再会有了。

我国在政治上的真正成功，和那种徒令民族牺牲流血的目标，这两件事我们必须分别清楚，这种的分别，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行动是十分重要的。

民族社会党运动，决不能和那些卑污下贱的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相联合。

要是我们认国我们现在也须为欧战的主张所束缚，那是更为险的事；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在使我们的领土和我国的人口数目能够互相的调和。

从政治上来说，要求恢复一九一四年的国境，这未免太不聪明了。

但是坚持这一种要求的人，反而宣称他们这种要求是他们政治行动的目标，岂知这种的要求反而使敌方的联盟更是巩固。

欧战八年后——参战各国的欲望和目的的原本是十分复杂的——在当时胜利的联盟，现在所以还能团结一致，唯一的理由就是在此。

这些国家，当时都因德国的失败而获得了利益。

因为列强骇惧我国的实力，所以把他们彼此的嫉忌完全置诸脑后，反面暂时的团结一致。

他们以为瓜分我们，就是防止我们复兴的唯一的政策。

这种不良的居心。和对于我国实力的惧怕，实在是为他们团结一致的原动力。

自从维也纳会议以后，世界的局势完全转变了，群主和后妃，已经不再为领土而去作孤注一掷，现的统治世界的，便是那些残酷而不没国籍的犹太人。

一九一四年的疆界，对于国民族的将来，一些也没有什么用处。

因为这种疆界，过去既不能做德国的保障，将来也不能增加了德国的实力。

既不能使日耳曼民族的内部团结，又不能使日耳曼民族的财富满足。

就军事上来论说，这种疆界也是不适宜的，而且也不满人意的，更不能改进了我国在对于世界其他强国的地位。

——与其说对于其它强国，还不如说对于真正的强国——况且，这种疆界不能缩短我国和英国的距离，又不能使我国成为类似美国的一个大国。

再有，就是法国在世界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也并不因了这疆界而受到怎样的实际上的损失。

只有一件事可以断言的，就是要恢复一九一四年疆界的不论那一种计划就算是成功，也徒然叫我民族来再度和流血使有用的国民，完全去为国牺牲了，能决策励行而再造我民族的生命的前途。

况且，“民族的光荣”已经使大家心满意足了，我们必定惑于这种空泛的成功，去放弃一切比较远大的目标，于是开放门户去兴商业，不到事变发生是不止也。

民族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坚持我们外义政策上的目的，保障日耳曼民族在地球上所应得的领土。

万一因了这种行动而流血牺牲，对于上帝以及日耳曼人的子孙，也可以说得出了。

在地球上，不论是那一个国家，都不会凭藉了上帝的赐予而获得了尺寸的领土的占领。一个国家的疆界的决定的变更，完全是由人力造成的。

一个国家，虽然已经获得了很多的领土，然而决不能据此而说他的领土应该永远的占有。

因为领土的获得，不过是证明了征服者的强有力的呼丧失土地者的怯弱无能。

占有的权利，便是寓于这种强力之中。

我们的祖先，对于国土的获得并不是得之于上天的赏赐，实在是从奋斗而得来的，所以将来能够给我民族以土地和生命的，也只有武力而已。

我们虽然明白和法国应该只有妥协的必要，可是，因妥协而牺牲了我国对外政策上的大目标，那也未免不值得。

有意义的妥协，必须能够扩充我民族在欧洲的地域，因殖民地的取得，还不能解决居住问题，能解决这项问题的，实际也只有获得可以移民的领土，以开拓我祖国疆域这样，新移居的人，不但能够获得和原来的地方保持密切的联络，并且还可以保证新领土和祖国结合后全国产生的一切利益。

我民族社会主义的党人，现在已经决心放弃我国的外交政策的倾向。

我们现在是采取了六百年前的外交政策，就是遏止日耳曼人纷纷向欧洲南部和西部去移殖，而使我们的视线向东去。

我们已经结束了战前殖民地和商来的政策，只是注意于未来的领土政策。

我们在现在一谈到欧洲新领土的开辟问题，必须先想到俄国和他的接壤的国家。

好像命运之神是愿意指示我们发的方向。

命运之神使俄国变成布尔雪维克，就是使它丧失了从前俄国所靠以立国而保障其生存的知识阶级。

因为俄国成为有组织国家，并不是为了斯拉夫民族具有怎样的政治能力，而是日耳曼分子能够在劣等的民族中组成国家的证明。

现在俄国的内部，可以说这种日耳曼民族的分子，已经排除净尽，由犹太人取而代之。

俄国人现在决不能用他们自己的力量去摆脱犹太人的束缚，犹太人也不能永久的去统治俄国。

因为俄国人不善组织极易分化的缘故。

这个在东欧的庞大的帝国，现在已经快溃了，犹太人统治的末路，便是俄国国祚的告终。

自然犹太人是反对我们所采取的政策。

他们引毕士麦的主张，作为他们唯一的理由，去拥护一种无聊而有害于日耳曼民族的政策。

他们说毕士麦也极注意和俄国发生亲善的关系，这句话确是不错。

不过还有一层，他们不会提及，就是毕士麦也极注意和意大利发生亲善的关系。

但是毕士麦实行和意大利联盟，为的是易于抵抗奥国。

这种联意的政策，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呢？我知道他们答案必定是：“因为现在的意大利，已经不是从前的意大利了。”好，这句话真是不错。

可是，我说现在的俄国已经不是从前的俄国了，读者诸君也当答允的。

那种能够见机而行的毕士麦，他决不会受联俄政策的拘束的。

所以这一个问题，并不是“毕士麦在当时采取什么政策”，而是“他在现在将采取什么政策”上面。

这一个问题，也是不难答复的。

因为毕士麦的政治手腕，决不致去和那些快要崩溃的国家去联盟的。

还有毕士麦对于殖导和商业的政策，在当时也很踌躇不定，因为他留意于采取极安全的方法。使他的创造的国家，能够安全和巩固。

下篇 十五、紧急防卫权

我们的国家，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停战的时候就采取了一种几乎要自超于灭亡的政策。

我们现在所有的时光，和一八〇六年到一八一三年使惨败后的普鲁士复兴时所需的时光差不多，然而，我们不能来利用这时光，反而使国势一天一天的衰弱，这是人人所共知的。

他的重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签订了辱国的停战条约以后，国人对于敌人屡次所提的压制政策，并没有能力和勇气来给他反对。

他们敌人是很聪明的，不过他的要求一次来提出。

停战的人命令，要我国解除军备，使我国在政治上失去了凭依，成为孤立无助的状态，而经济的掠夺，又是层出不穷的，一一相继而来，这用意，就是要使我们认识道威斯（**General Daroes**）的调停是不幸运，罗加诺条约（**Loearno Treaty**）是胜利。

从一九二二年冬季到二三年，我们知道了和约成立之后，法国仍是实现他的最初的参战的目的。

如果说人口不多的法国，他们参加这次空前的四年半的大战，目的是战后的得到赔偿损失，这种话叫谁肯相信呢？

如果说亚尔隆斯罗边（**Alsace—Lorraine**）将来的政策的一部分，那么，法国的作战，就很容易解释了。

因为他们的政策，就是要把德国分列成许多的小国，这就是法国参战的目的。

然而，法国的参战，实在无异于把他的民族出卖给没有国籍的犹太人而做首他们的奴仆。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的政变，像迅雷闪电样的突如其来。

但是当国内在发生大变的时候，我国的军队还是深入在敌国的腹地。

当时，法国所首先去注意的，并不是把德国来使它分裂，而是在怎样使德国的军队很快地退出法比两国边境，因之，巴黎当局，在战事结束的时候，他的第一任务，便是解除德国军队的武装。并且使他们退回德国去。

不过有待于此事完成之后，他们才能设法把最初参照的目的来实现的。

不过说英国来说，德国既丧失了殖民和商业的势力，因而降成为次要的国家，可是英国的参战，已经获得胜利了。英国也并没有毁灭德国的心思，实际上，他是极希望将来的欧洲有一国能够和法国来对抗。

所以，法国也不得不静待着和平，然后再开始他已经从欧战树立的基础而来工作。

克里蒙梭（Clemenceau）的宣言，称和平不过单是战争的继续，这句话实在有着深长的意义的。

到了一九二二年冬季，法国的用意，便就大家知道了。

我相信，要使法国对于我国的用意变为唯一的方法，便是使我国的政策转变了来对付敌人。

我相信，如果德国能够行使法国陷于孤立的地位，那么第二次的大战，必定不是德国反抗世界的战争，而是德国自卫以对抗法国的战争，因为法国扰乱世界和严的缘故。

如果德法两国，不断发生冲突，而这冲突只是防御法国的侵略，那么。这种冲突，一直继续下去而永远不会发生战争，而德国的国境，也难免世世的被人侵略而不断的有所变更了。

等到德国人完全能够明了到这一点。

日耳曼民族的生气，便不再虚掷于消极防卫，而能起来一致有对付法国，这才能和法国解决了这永久不决的冲突。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德法两国间的情况，又到了十分紧张的时候了。

法国正在打算对德国作大规模的压制，而且在师出有名。

他希望能够占领鲁尔（Rnhr）这地方，去破坏德国的最后的国基，使我们陷入于经济困乏而负债累累。

这鲁尔被占，命运倒又给日耳曼民族以一种振兴的机会。

因为这件事粗看起来，好像是大祸临头了，但是仔细观察反而有使德国脱离苦海的可能。

当是法国确是第一次和英国疏远，就是审慎的想维持这英法联盟的英国的外交家，以及大部分的英国人，大家都认为英法间的关系是已经结束了。

英国商业的团体，对于法国在大陆上势力的一天一天增加，自然地十分愤慨的。

法国占领了鲁尔煤区，实在使英国丧失了他在大战中所的一切的成功，现在的胜利者，已经不是英国灵敏而劳苦的外交家，而为福熙（General Foch）元帅和他所代表的法国。

意大利也对法国有着恶感。

其实，战争在刚结束的时候意法两国的友谊，已经就不大好，现在是竟一变而为仇恨了。

将来终有一天会使昨天的友邦变为明天的仇敌的。

但是这事件终于未生的缘故，就是因为德国的总长，没有恩韦元帅（**Enver Pasha**）的才能，则只是一个库诺（**Cuno**）而已。

当一九二三年的春季，我们还不能因法国占领鲁尔藉口重振军备，我们必须先在德国的民族中灌输一种新的精神，使我民族的意志益趋坚强，而且须将国内最大的恶势力完全除净尽。

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不知道扑灭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便是——九一八年的大流血所以一九二三年春季的可怖惩罚，便是我们坐失良机，不会彻底消灭马克思主义的叛党和暴徒的工作的结果。

那些小资产阶级，他们以为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比从前，且以为主持一九一八年事件之“败类”，曾经牺牲了二百万生命作为夺取的工具而不悔的。到一九二三年便可民族的正义观念而服务，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奇想！瞎希望这班叛徒来做解放德国的战士，那真是愚不可及的傻子了。

这班叛徒也决没有这种想法。

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不能不为叛逆，这等于野狗不能弃死尸而不食是一样的。

一九二三年之情况和一九一八年的情况很是相像，不论我们来决定那一种的抵抗政策，他的要点，都在使我民族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毒气。

我十分的相信，凡是真正的国家主义的国民政府，他的急务就在获得以去灭扑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而且给这种力量以自由处置的权力。

当国外的敌人，对我国施以一种致命的打击的时候，而国内的叛逆，又潜伏在街头巷尾，这时的政府千万不在留变于“安宁秩序”的笨策。

要是最后解决我民族敌人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方法而不能免于混乱，那么，真正的国民政府，应欢迎邀纷扰不安的时局。

我常常恳求民族主义的各党，应该在应使命运的支配，使我党施行对付马克思主义和明确，然而，他们对我的劝告，总是置之不理。

他们（包括了国防军的首领）大家自要聪明，终于忍受了那最可耻的屈服。

当时，我很感觉到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的使命已经完毕，不能使他们再负其他的什么责任了。

在这时候，我坦白的承认，我对于阿尔卑斯山以南（**South of the Alps**）的伟人，发生了热烈的钦慕。

他为了酷爱他的民族。因此不和意大利国内的敌人妥协，而且竭力用各种可能的和段和方法来扑灭敌人。

莫索里尼所以能够列于世界伟人的缘故，就是他决心不和马克思主义平分意大利，而且扑灭国际主义，来拯救他的祖国的缘故。

德国虚伪的政治家得莫索里尼相形下，真是小得很。

我国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和那宽恕马克思主义的办法，一开始就使我们在鲁尔不能采取丁怎样有力的抵抗。

他们让我国的世仇马克思主义的徒党蛰居在国内，我们再要起而去和法国作战，那真是愚妄的傻子。

不难预言的行将发生的事变，就在一九二三年春季发生了，空喊着向法国抵抗，这是徒然的，因为在军事方面，是否可以得到胜利呢？要知道德国对于鲁尔事件的行动，结果如能扑灭德国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就已操胜算了。

如果德国一旦而能够脱离不共戴天的世仇，那日后的发展。自然是不可限量的。

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毁灭的日子，便是加在德国身上，也就粉碎无余。

自从有史以来，我们从来不曾被仇敌所征服过，征服我们的只有我们本身的败德，和那伏在一旁和敌人而已。

然而，上天竟赐德国一个伟人，这伟人的名字叫做柯诺。

据柯诺的推理：“法国占领鲁尔。？”

鲁尔有的是什么？是煤。

法国的占领鲁尔，不就是为了该地的煤？“柯诺的推理既是这样，所以他心深信用罢工的手段，可使法国人丧失了他的煤，而且因无利可图，早晚必定会退出鲁尔的。

这就是我“民族”“杰出”的“政治家”的思想。

要实行罢工，就得要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力量，因为罢工和工人的关系最是密切。

所以，使工人和其他的德国人构成一条联合战线（小资产阶级政治家柯诺把工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看作是一样的东西，）那是十分要紧的.....

而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赞成这种意见，因为马克思派的领袖他需要柯诺的金钱，这不亚于柯诺需要他们的来参加构成一条“联合战线”。

如果在当时，柯诺先生不用金钱来运动总罢工，作为结“联合战线”的基础，而去令德国全国的人民，大家多做两小时的工作。

那么，“联合战线”的骗局，必定在三天内暴露了。

凡是民族，决不能自己不努力而获得自由的，只有牺牲，才能获得自由。

说到消极抵抗。那是断难坚持久远的，除非完全不知道战争是什么东西的人以外，决不会有人去空希望这种荒谬可笑的方法。能够驱逐了霸占领土的敌军的。

像鲁尔的威斯法里亚人（**Wesopha Kians**）知道有了八十师或是一百师的军队，在准备来援助他们，那么，法国的军队，自然要感到困难，像是坐在荆棘丛中一样。

当工会饱受了柯诺的捐功，将要把软弱的消极抵抗，改为而成为积极的攻击的时候，共产党便立刻脱离了民族的战线，回复了他们本来的面目。

到了这时候。柯诺先生也只好默然的辞职。

从这点德国增加一番经验，只是也丧失一个希望。

牺牲了亿兆的金钱，和千万德国青年（他们大都头脑简单，轻易信仰德国统治的人的话的。）终于也不免到那悲惨的崩溃和可耻的屈服的，人民对于这种卖国的举动，真是怒不可遏。

亿兆的人民，大家都认明唯有根本为肃清德国现行的全部制度，那才会有挽救的理。

我在一九二四年春季受到太审判的时候，曾经作演说，现在把这演词的最后一句摘录在这里：“我国的法官，痛斥我们的行为，这虽属正当，然而主持更高真理较好法律的历史女神，必定会来撕碎这种判决；而且还要嫣然微笑，宣布我们尽是一些无辜而受害的可怜人。”